

## 目 录

黃埔学生的政治組織及其演变 .....	黃 雍 ( 1 )
复兴社述略 .....	蕭作霖 ( 21 )
关于国民党官僚資本的見聞 .....	祝世康 ( 72 )
短稿十篇	
徐錫麟槍殺恩銘見聞回憶 .....	王迈常 ( 89 )
浙路收歸国有的内幕 .....	許炳堃 ( 91 )
袁世凱軼事數則 .....	吳弱男 ( 92 )
孙中山先生創辦上海《民国西报》的經過 .....	張祥麟 ( 94 )
民初兵工見聞雜憶 .....	吳承禧 ( 96 )
民初清室向銀行抵押的一批文物的遭遇 .....	胡仲文 ( 97 )
略談中山艦事件 .....	方鼎英 ( 99 )
郭松齡反奉時奉軍和日本的勾結 .....	湯国楨 ( 100 )
皇姑屯炸車案側聞 .....	張联藻 ( 102 )
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回憶 .....	刘翼飛 ( 102 )
回忆川軍反对袁世凱的斗争 .....	但懋辛 ( 105 )
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譯本的来历 .....	王家楨 ( 127 )
北京同仁堂的回顧与展望 .....	乐松生 ( 132 )

## 附 載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一年的工作报告 .....

(155)

## 附注

对《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一文的补充

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二四页

对《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

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三页

对《徐锡麟枪杀恩铭见闻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

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六页

对《袁世凯轶事数则》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

辑》第十八辑二二五、二二八页、第三十一辑

二九七页

对《孙中山先生创办上海〈民国西报〉的经过》一

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

八页

对《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六七页

对《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的补充和订

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二七、二三一页

## 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及其演變

黃 雍

一九二四年一月間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孫中山先生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親手創辦了黃埔軍校，來培養新型的革命幹部。在民主革命運動開始高漲的形勢下，全國各地青年憧憬革命，紛紛投筆從戎，來到黃埔。這個黃埔小島上，當時真是風雲際會，革命的空氣非常濃厚，正如黃埔校歌上所說，“怒潮澎湃，紅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但是這個“革命搖籃”一開始就存在着革命派和反動派的矛盾：一方面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所領導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又有以蔣介石為首的許多革命投機分子和反革命派系（象戴季陶、汪精衛和西山會議派分子謝持、鄒魯等）。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鬥爭也日益尖銳。黃埔左派學生中最初出現進步政治組織——火星社，在與校內的西山會議派及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鬥爭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隨後，在一九二五年底，青年軍人聯合會在共產黨領導下成立以後，同孫文主義學會的鬥爭更加劇烈。蔣介石發動三二〇反革命政變前不久，即借故迫令青年軍人聯合會解散，孫文主義學會亦同時取消，另行組成一個完全由蔣介石自己控制的黃埔同學會。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黃埔同學會就完全被反革命力量所控制，成為蔣介石鎮壓人民和革命勢力的工具。蔣介石竊取了政權，建都南京以後，黃埔學生氣焰

日益囂張，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以至當時有人指為“黃蟲”、“黃禍”。在這種情況下，各舊軍閥部队的軍官人人自危，于是由呂超等發起恢復四校同學會，以謀合力對付黃埔勢力。蔣介石為緩和當時矛盾，消除後患計，又命令取消所有軍事學校的同學會，並將黃埔同學會名義同時取消，另在中央軍校內設一同學調查科，負畢業生登記調查考核之責。此後黃埔學生又走入小宗派的全盛時期，几乎是人人稱霸，个个出頭。蔣介石為了加強對黃埔學生的控制和利用，一面將黃埔同學會組織形式恢復，改稱為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一面效法墨索里尼，籌謀建立法西斯組織，借以統一小宗派紛歧的黃埔力量，並且把它伸展到青年學生和全國其他各个方面中去，實行法西斯統治。所以他首先根據自己的所謂“力行哲學”組織了力行社，作為“中正式的法西斯組織”的中心，然後以合作經濟組織形式組織了厚生消費合作社，以謀建立獨立的經濟組織。為了擴大影響，發展力行社組織，蔣介石又成立了復興社，作為力行社的外圍，並將在二二八上海戰爭時戴笠所建立的特務組織併入復興社。可是這些法西斯組織越發展，內部矛盾也就越多：首先是復興社與CC團的火併，其次是戴笠的特務系統與徐恩曾的特務系統各不相容，鬧得烏煙瘴氣，衝突時起。抗戰開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二次合作，蔣為掩蓋自己的罪惡面目，對中共表示“誠意”起見（更重要的是為了制止自己的內爭），下令解散復興社和CC團，另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团在各地狐假虎威，鬧得民怨沸騰後，一九四六年蔣又把它與國民黨合併。從此，三青团的全体干事、監事搖身一變而為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這一幅新的升官圖的展開，使各派系皆大歡喜，暫時滿足了羣狼爭食的要求，同時也把蔣經國的力量伸展到國民黨中去。

以上所述，是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的變遷以及後來反革命派系演變為特務組織的一個簡單輪廓，下面再逐一加以分述。

## 火 星 社

黃埔軍校成立時，中國共產黨曾先後派了一部分黨員參加校務領導工作和一部分黨員參加受訓，但人數不多，難於適應當時工作發展的需要。這時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下，黨在軍隊和軍校中組織的發展受到嚴格限制，而羣眾革命情緒高漲，又迫切需要組織起來加以團結教育。因此，由一部分共產黨同學和一些同情黨的同學效法列寧在一九〇〇年創辦《火星報》的意義，組織火星社作為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來推行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並為吸收黨員作些準備工作。

火星社是當時黃埔軍校內唯一的革命組織，成立的時間約在一九二四年底，其時周恩來同志已到校擔任領導工作，第一期學生已將屆畢業。它是由第二期學生中的共產黨員李勞工、周逸羣、王伯蒼、吳明（即陳公培）、蕭人鵠、吳振民、陳恭、謝宣渠等倡議組織的。參加這組織的人除當時在校一部分共產黨員學生外，還吸收了一部分接受共產黨影響較深的左派學生。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前後，參加火星社組織的人數，第二期學生有六十餘人，第三期學生約三十人左右，軍官佐中參加的人數甚少。

火星社成立不久，在一九二五年初，國民黨黃埔軍官學校特別黨部進行改選（國民黨在各軍校皆設有特別黨部）。火星社運用自己的組織力量展開了競選運動，結果按照自己的預定計劃獲得完全勝利。當選為特別黨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委員的有周逸羣、王伯蒼、吳明、陳作為、羅振聲（不久脫黨）、黃錦輝（候補執行委員，旋即

加入共产党)等人,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蒋介石仅得六十票,没有当选,后来由党代表廖仲愷推荐,才得当了一名监察委员。

火星社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为全校民主创了一个先例,同时也震惊了蒋介石及校内反动派。后来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把这件事作为反共的借口,说成是“共产党借国民党名义扩张势力”。

同年九月,黄埔第二期学生毕业离校,火星社亦随之解散。参加组织的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均已先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火星社活动的時間总共不到一年,但在对当时校内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 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四年底、一九二五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危,黄埔同学闻讯,人心颇为不安。西山会议派分子乘机造谣煽动右翼分子合谋反共。他们宣扬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反动理论,企图假借孙中山学说思想为号召,组织反共集团。他们以小宗派为中心,以第二期学生作为发展组织的重点。如以谢廷献、谢纯菴、楊引之为首的川籍同学约二十余人,均与西山会议派有关系,反共最激烈,后来都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此外,史宏燾、楊耀唐、謝振邦等以江西同乡为活动目标,李士珍、周兆棠专联络浙江同学。他们彼此串联,互相声援,使一些中间分子慑于反动势力,不敢有所表示。当时左派同学因受《向导》和《中国青年》两个革命刊物的影响,对中国革命已有初步的认识,进而追求革命真理,研究馬列主义,逐渐倾向共产主义,从而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更加团结一致了。在这种情势下,黄埔学生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立就更加鮮明了。

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前数日，蒋介石集合一、二期学生在校本部举行聚餐，说明东征的意义。席间发现了油印文件，内容大意是：为了“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要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文件是由贺衷寒起草的）。他们在校内由贺衷寒、曾扩情、潘佑强、伍翔、杨引之等负责，在校外由甘乃光等出面，上海由戴季陶直接领导，分头进行活动。这是孙文主义学会酝酿和组织的最初阶段。

当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到廖仲愷先生被刺前后，在这一段期间内，孙文主义学会组织已逐渐形成。各军中左右派的磨擦日益尖锐；在黄埔二、三期学生中斗争尤为剧烈，打架冲突，时有所闻。当时二期四川籍同学多与谢持、石青阳等西山会议派保持密切联系，成为极端反动的集团。他们常常气势汹汹，找共产党员周逸群、王伯苍、吴振民等为难。幸周、王等人比较老练，力求避免无原则纠纷，因而没有酿成重大冲突。这些反动分子还常在深夜偷窃共产党人的文件，并用种种卑劣手段对共产党员进行打击。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在潮汕的孙文主义学会组织已趋表面化。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驻潮汕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反共积极分子筹备正式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同时共产党也开始发展组织，于是针锋相对，斗争十分尖锐。当时驻潮汕的第一军全部军官军佐有十分之二参加了共产党，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均居要职，如何应钦、顾祝同、刘峙等皆是（贺衷寒那时不在潮汕）。孙文主义学会主要分子内部因权利之争也有矛盾，如冷欣、孙元良、倪嗣等人反对缪斌、徐锡林，斥缪为“叛徒”，为“共产党奸细”；斥王俊、何玉书、王祿丰等为“动摇分子”。直到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孙文主

义学会在潮汕方面的活动才渐趋沉寂。

### 青年軍人联合会

青年軍人联合会的組織是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要求而成立的。当时在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下的粵、桂、湘、滇各軍为了謀求本身势力的发展,各設有軍官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并抽調自己部队中青年干部加以訓練。上海五卅大惨案发生后,广东工人阶级为声援上海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省港工人的英勇斗争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使广东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莫大的鼓舞。在各个軍校受訓的青年在这种革命形势激盪之下,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表现的高貴革命品质和坚决的斗争意志所感染,革命情緒更加熾烈,要求共产党帮助和教育的愿望也更加迫切。黃埔軍校的革命派同学为了适应这些青年軍人的要求,在一九二五年一月間以軍校特別党部名义派第二期工兵队学生王一飞(后为共产党员)为代表,到广州經常参加广东的工、农、商、学、兵各界的联系會議,还与粵(李福林部)、湘、滇、桂各軍所办的軍事学校学生取得密切联系,同时发刊小型月刊《青年軍人》。这就是青年軍人联合会活动的开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組織形式和具体的活动方針。到是年九月間黃埔軍校第二期学生将屆毕业时,經共产党組織决定,派第二期輜重队学生周逸羣担任青年軍人联合会的工作。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青年軍人联合会的組織規模粗具,开始有綱領、有计划地进行活动。当时活动范围主要在黃埔軍队本身,并兼向駐在广东境内的第二軍(湘軍)、第三軍(滇軍)、第四軍、第五軍(均粵軍)、第六軍(程潛部)各軍中扩大影响,发展組織。至此,青年軍人联合会已成为軍队方面团結革命派軍人的唯



一組織，对各軍中以西山會議派和国民党右派为背景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革命活动，展开了尖銳的斗争。

青年軍人联合会成立以后，在一年多的時間中，其組織已遍于广东各軍，并向国内各軍寄送刊物，扩大影响。由于青年軍人联合会工作深入，当时駐粵各軍风气为之一变。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为了挽回他們的失敗局面，故意在羣众中制造和扩大糾紛，企图借此来加强反革命勢力的内部团结，爭取蔣介石對他們的支持。蔣介石固敌視青年軍人联合会在青年軍人中的組織活动，亟思拔去这一眼中釘，而对孙文主义学会虽賞識其反动活动，但认为这一組織究竟非自己亲手培植，恐将来难于切实掌握。因此，在三二〇事变前不久，蔣介石就借口青年軍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間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訓，迫令青年軍人联合会解散，同时为表示自己的“大公无私”精神，亦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并另行組織黃埔同学会，由他自己直接领导。

### 黃埔同学会

蔣介石在解散了青年軍人联合会并命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以后，为了排除共产党与西山會議派，將黃埔同学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决定另組織“黃埔同学会”。于是他指派蔣先云（共产党员，校长办公室秘书）、曾扩情、賀衷寒、冷欣、余洒度、賈伯涛、伍翔、楊引之、李之龙、潘佑強、田戴龙等为黃埔同学会筹备委員，并自任会长，意在实行“一軍一党，以軍制党”的預謀。黃埔同学会内部組織設有組織、宣传各部，在各軍中設立分会和基层小組，另設撫恤委员会办理伤亡同学优撫事宜。会址設于广州东較場国民党中央党部內。这是蔣介石控制黃埔学生作为一己工具的开始。自

后随着北伐軍事的进展,黃埔学生到达那里,这一組織就发展到那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国共分家,黃埔同学会从此就完全掌握在右派学生手中。当时大江南北,到处皆是“五皮主义者”(五皮指皮带、皮靴、皮鞭、皮包、皮裹腿,是当时黃埔学生最时髦的装束)的天下。这时黃埔同学会的組織已成为蔣介石对付异己、摧殘革命的有力机构了。

蔣介石在背叛革命,篡夺了政权后,由于大量扩充和收編軍隊的結果,在軍隊中形成两大系統:一为他自己的嫡系中央軍,一为收容改編的杂牌部队,而在数量上,中央嫡系又弱于杂牌部队。他就运用以甲倒乙、以丙制丁的手段来操縱駕馭,并决定調整改編杂牌部队,因而使杂牌部队的軍人感到人人自危。这些軍人見到黃埔系統有同学会組織,既能团結发展,又可暢所欲言,于是有四川呂超(以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參軍长)等旧軍事学校出身的軍人,乘机以团結自存为号召,发起恢复北洋时代在北京成立之四校(将弁、陆小、陆中、保定軍官)同学会組織,作为他們自己的政治資本,借謀与蔣抗衡。呂等发起后,响应者大有人在,最积极的莫如江西张岂庸,而广东的陈銘枢和湖南的唐生智亦表同意。当时他們的声势頗盛,大有压倒黃埔軍人之势。蔣介石认为如任其組織成功,将为心腹之患,因而他就来一个先发制人的措施,以总司令名义下令禁止軍隊中有分散团結的同学会、同乡会等組織。他在表面上首先命令取消黃埔同学会,但实际上不过将黃埔同学会改头换面,在中央軍校內設立一科,专司黃埔学生調查登記事宜,名曰中央軍校毕业生調查科。这个科另立門戶于南京的明瓦廊三道高井,設中将主任、少将副主任,受校长的直接指揮,并保留原来的撫恤委员会,由是黃埔同学会“名亡而实存”。

## 中央各軍事学校毕业生調查处

当南京政权初定,蔣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統治,就以統一軍事教育为名大量发展軍事学校,来訓練他所需要的干部。因此,各兵种均設有軍官学校,如中央陸軍軍官学校、空軍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騎兵学校、輜重兵学校、宪兵学校、海軍、魚雷学校、中央警官学校等,各校在各地还設有分校。除此而外,还有因人因事而設的各种短期訓練班等。所有各校校长一职均由蔣介石自兼,另置心腹充教育长主持校务。这一措施表面上是为了統一軍事教育,实則为法西斯教育的雛形。軍事学校漫无限制发展的結果,学校名目繁多,据一九三五年統計,訓練单位就有百余个,而以一小小軍校調查科实难胜任这些川流不息的毕业同学的組織、調查、登記、考核等工作。同时,这个調查科又由于职权范围所限,在各軍校毕业生的分发調度上亦难以应蔣介石运用自如的要求。这时各軍事学校又有組織同学会的情事,如杭州的空軍学校政治部主任蔣坚忍就倡导組織空軍学校同学会。事为蔣介石所悉,即严厉訓斥該校师生不得破坏团結,并传蔣坚忍到南京当面痛加申斥。但此事发生后,更促成了蔣介石改組扩大調查科的决心。不久他即将調查科改組扩充为中央各軍事学校毕业生調查处,名义上改隶于軍事委员会(后又改隶軍政部),在各軍、师单位和各省、市普遍設立調查分处,其經費由各隶属机构列为正式預算,各軍、师、省、市分处負責人由中央处聘任。他又将以前所有各种訓練团、队、班等訓練机构共百余单位的受訓學員,一律加以甄別,按毕业時間之先后,重新編配,并入中央軍校各正式期班,享受正式期別待遇。如在广州的政治訓練班与六期同时,就編入軍校第六期,作为正式

第六期生看待。至此，黃埔同學會實質上不僅重新恢復，而且較前更為發展，只是在名義上有所不同而已。蔣又將撫卹委員會取消，其撫恤業務由調查處辦理，並規定調查處有介紹或呈請分發失業同學工作之權。

九一八後，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的“停止內戰、團結抗敵”的要求，仍然堅持“剿共第一”的方針，並且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共，剿共必先集中各軍意志”的反革命口號。他除自己坐鎮南昌主持“剿共”軍事外，叫鄧文儀在南昌行營中成立調查課搞軍事情報和特務活動，以輔自己耳目所不及。又命陳誠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將全國各軍高級將領分期分批集中輪訓。訓練的目的是：動員全國軍事力量一致“剿共”；訓練的措施是：灌輸“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宗旨。訓練團學員畢業時由中央畢業生調查處依照畢業生登記手續發給同學登記証，証明已取得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的資格。這樣，所有受過訓的高級軍官也就都成為蔣介石的“學生”，同時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又可擴大其控制範圍，深入到各個非嫡系的雜牌部隊進行活動。抗戰時期在重慶浮圖關舉办的中央訓練團，後來選訓人員由單純的軍人擴展到行政各部門人員。這些非軍人的員生，畢業後也均歸口於中央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這樣一來，這個調查處的活動範圍更從軍隊部門擴展到各個行政部門中去了。這個訓練機構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以後。

### 爭權奪利的小宗派

蔣介石為了鞏固他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一貫漫無限制地發展軍事學校，以培植其反動軍事爪牙。中央各軍校除本校外，又在武

汉、长沙、西安、桂林、成都各地設立分校；各分校中除正式期別外，还設立若干短期訓練班。由此，軍校畢業生日益增多，而失業的學生人數也隨之不斷增加。兼之，各部隊貪污吃空之風盛行，每師規定人數約一萬二千人，實則最多不到八千人，甚至只有四、五千人。各部隊長為便于營私舞弊，都各自在部隊中排除異己，形成了封建小集團，所需幹部均由自己隊伍內選拔訓練。因此，中央畢業生調查處呈請軍政部分發到各部隊的同學，每每經年得不到實缺，反而借故被排走。當時以南京一地而論，失業同學動過千人，打架鬧事，時有所聞。斯時的調查處實際上成了失業同學的救濟處，排難解紛成為唯一的業務。這種循環失業狀況已成長期不治之症。直到抗戰勝利後，中央訓練團遷南京孝陵衛時，還演出了一場中央訓練團內的黃埔學生齊集中山陵哭靈的活劇。

雖然蔣介石竭力用種種方法企圖統一黃埔學生的思想，控制黃埔學生的意志，並且在形式上統一和加強了黃埔同學的組織，但其結果仍然是枉費心機。黃埔學生中由於權利之爭，形成了許多小派系：鄧悌（駐德武官）以留德、法、意、比學生為基礎，與唐縱（駐德副武官）、顧希平（留法）、劉璠（留比學警察）、湯武（留意）等人結合，組織留歐集團。他們自以為在德意等國留過學，對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組織懂得較多，就向蔣獻計，仿德、意先例在中國實行法西斯統治。這正暗合蔣介石之意，鄧悌得蔣歡心，獲任復興社書記，實因于此。不甘寂寞的賀衷寒又想重溫孫文主義學會的舊夢，以張鎮（憲兵司令）、蕭贊育、鄧文儀、劉詠堯等為基干結成留俄派。以袁守謙（政訓總處秘書長）為中心的政訓系統也加強了組織。潘佑強、周復、杜心如、彭孟緝、李一民等則結成留日學生小集團。康澤則以北伐時宣傳大隊為基礎，以三期云、貴、川籍學生

韓文煥、毛嘉謀、雷清尘、賀明暄等为中心，成立西南社。戴笠借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机，以調查敌我軍隊内部情况为名，向蔣献策組織十人团，由此发展成为特务組織。刘健羣当时充何应欽秘书，又借何的关系，上书蔣介石建議組織蓝衣社。这一羣乱世妖魔，在互相攻击、相互爭鬭的斗争中，把整个南京城鬧得烏烟瘴气。

## 力 行 社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蔣介石由于自己的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把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奉送給日本，引起全国人民的憤怒和反对，一致要求他改变其卖国政策，积极抗日。与此同时，蔣介石的独裁統治所凭借的黄埔力量，也是問題重重，危机潛伏。他的嫡系軍隊贪污腐化之风盛行，逐漸走上北洋軍閥部队的老路，对他的命令往往阳奉阴违，使他无法貫徹自己一意孤行的意志。而最使他感到切肤之痛的，則是他一手培养起来在政治上活动的一些黄埔学生，派系紛歧，互相磨擦，各不相容。当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蔣介石不但对在淞沪抵抗日軍的十九路軍不予积极支持，甚至当他的嫡系部队八十七师宋希濂率全旅官兵齐集南京尧化門自动开赴上海参战时，也多方留难。最后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派八十七师王敬玖部和八十八师俞济时部組編第五軍，派张治中充軍长，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不料八十八师开抵昆山南翔前綫，与敌一触即潰，調赴后方常熟整訓时，全师官兵不到四千人。蔣介石接戴笠报告后大为震惊，对自己的命运以及自己命运所系的黄埔系統力量的前途不得不从新考虑，以加強控制。于是他除了决定把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把国府主席社与林森，而自己則退居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借图轉移空气、和緩全国輿情而外，又提出“党权高于一切”、

“以党治国”等口号，以防大权旁落。他一面令戴笠加强特务组织，成立特务处于南京鸡鹅巷；一面接受鄧悌的建议，以他自己倡导的“力行哲学”为基础，效法法西斯组织，成立力行社，自任社长。力行社组织形式完全采取集权制。社以下设若干小组，每周在蒋介石的官邸（军官学校内）召集组长联席会议一次，由蒋自己讲解“力行哲学”，并研究德、意法西斯组织形式和发展等问题。力行社参加分子除以黄埔学生中的政治干部为基础外，并吸收一部分文人和留学生，但不吸收在部队服务的黄埔学生参加。他又将驻意公使刘文岛升格为大使，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送德留学，并调回大批留欧学生回国参加法西斯组织工作。当时参加这一核心组织的人有：鄧悌、贺衷寒、桂永清、袁守谦、邓文仪、刘咏尧、萧赞育、黄雍、顾希平、滕杰、冷欣、蒋坚忍、曾扩情、周复、杜心如、陈绍平、易德明、李一民、彭孟緝、康泽、严不严、梁干乔、余洒度、郑介民、戴笠、俞塘、张辅邦、田载龙、唐纵、潘佑强、刘健群、范汉杰、孙元良等约五十余人，并决定这一组织为核心组织，不再发展；另由军校毕业生调查科出面组织厚生消费合作社，作为外围，发展组织。但这个外围组织因政治性不强，发展有限，后又决定成立中国革命同志会，亦即中华复兴社，作为力行社的正式外围组织。

## 复 兴 社

复兴社社长由蒋介石自兼。下设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事会，并各设常务干事若干人，组织常务干事会和常务监事会。设书记长一人，秉承“领袖”意志处理一切日常会务。下设书记处、组织处、宣传处、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各省市设分会，机关团体设支会。支会下分小组，为基层组织。

第一任書記長經蔣介石指定滕杰充任，因能力弱，不久即去職，由鄧悌繼任。鄧為留歐派領袖，本可勝任，但由於他個性強，與各派磨擦日甚，為賀衷寒聯合留日派所反對而下台，先由鄧文儀代理，後由賀衷寒繼任。賀為留俄派和政訓系統領袖，又曾留學日本，在復興社中頗占優勢，但接任書記長後亦因常以黃埔領袖自居，驕傲自滿，有失蔣歡。西安事變時賀主張擁何（應欽）代蔣，對張學良用兵，蔣回京後不得不引咎請辭，由劉健羣繼任。但劉因非黃埔學生（滕、鄧、鄧、賀皆黃埔一期生），不久即被排走，由康澤繼任。復興社存在時間雖暫，而五易負責人，多為小宗派內部鬥爭所致。組織處長周復為黃埔軍校三期生，系留日派中心人物，周調監事會負責後，由第四期學生易德明接充。宣傳處長為鄧文儀；軍事處長為桂永清；特務處處長戴笠，副處長鄭介民，完全是特務原班人馬。原戴笠特務組織雖已具雛形，但經費未固定，純由蔣之特別費中開支，因為數頗巨，頗遭物議。復興社成立後，蔣特令將特務組織併入復興社中加設特務處，並規定它的人事調配和工作進行均歸蔣本人直接處理，不受復興社組織支配。

復興社的主要“使命”有三：第一，對付當時青年運動，打擊共產黨，把組織工作伸展到青年學生中去；第二，企圖將蔣介石的勢力伸入北方，打進雜牌部隊中，對雜牌部隊起分化收買作用；第三，對CC組織和CC的特務組織取監視態度。

劉健羣任復興社書記長時，曾建議收容失業的黃埔學生組織宣傳隊北上宣傳，發展復興社組織。他卸任書記長後，蔣即令其組織華北宣傳總隊（分若干大隊），率領北上，並以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的名義，將宣傳隊分配到華北各軍如宋哲元、馮占海等部中，每軍宣傳隊派有重要復興社分子主其事。鄧悌任



書記長時就集中精力在青年學生中進行組織宣傳工作。他首先利用訓練總監部名義辦理全國中學生暑期集中軍訓，在全國重要省市組織集訓總隊，由當地駐軍高級將領或派專人任總隊長，將全部在校的高中學生集中訓練。另由復興社遴選工作人員于各總隊組織政訓室，并由蔣介石指派力行社幹部充總隊政訓主任，掌握政訓工作。如上海市集訓總隊設無錫，總隊長由駐軍八十七師師長王敬玖兼任，派顧希平任政訓主任。又如在河南開封集中豫、陝兩省高中學生訓練，派曹利生充總隊長，政訓主任調黃雍擔任。每個政訓室均在當地復興社調用大批組訓人員擔任學生中的小組指導員。學生集訓時，政治訓練多于軍事訓練。政治課程有“領袖言行”、“三民主義”、“各國形勢”（著重于德、意法西斯組織和發展），訓練內容特別強調灌輸“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精神，要在全國青年中養成“敬愛領袖”的風氣，任何人只要一提到或者聽到“委員長”，必須即時起立致敬。

訓練總監部內又成立國民軍訓處，由復興社初保潘佑強任處長，後又改為杜心如，李驥騏為副處長（均為黃埔一期學生，日本步兵學校畢業）。各省市亦設國民軍事訓練處，大專學校置軍訓室，派軍訓主任，各中學派軍事教官。從此，復興社組織就伸展到各大、中學校，法西斯毒素也就蔓延到青年學生中。復興社最主要的任務是對付共產黨，破壞共產黨的青年運動，圖謀徹底消滅共產黨組織。他們配合戴笠特務系統，在各校橫行無忌，造成嚴重的白色恐怖，進步青年遭綁架殘殺之事時有所聞。當時 CC 特務組織是著重在搜括民脂民膏，他們勾結大流氓杜月笙販運鴉片煙，在上海設廠製造嗎啡，蔣介石就採用“以毒攻毒”辦法，令戴笠加強特務組織，以與 CC 特務組織互相牽制。戴笠就在南京明瓦廊黃埔同學會

旧址設訓練所，以共产党叛徒顧順章为顧問，加緊訓練特務，并派人打进CC特務組織，將制毒机关破获，以打击CC。戴又利用自己的青紅幫关系，將訓練成熟的爪牙打入青紅幫，自己又与杜月笙結拜为盟兄弟，期在青幫中取得与杜相等的地位。他又以蔣介石为护符，获得各地駐軍將領的协助，运用复兴社和中央軍校調查处組織关系將特務組織伸展到每一个角落，羽毛逐漸丰满，即开始向CC特務进攻。結果弄得CC与复兴社成为势不两立的局面。抗日战争中，CC特務与上海汉奸勾結，在河南界首、浙江金华大批走私，而戴笠对上海工作亦早布置，在明爭暗斗中与CC特務狹路相逢，因而不断地发生武装冲突。

此外，鄧悌还运用国民軍事訓練机会，在机关团体中大量发展复兴社組織。当时仅就南京一地，每周宣誓入社人数多达五、六百，至少亦在三百以上，宣誓仪式均假勵志社礼堂举行，由蔣介石亲临致訓。鄧悌任書記长时为复兴社发展极盛时期。

### 中統、軍統及其他特務系統

蔣介石統治下的特務，有各种不同的組織形式。他控制这些特務組織的主要办法是讓他們在羣狗爭食中起互相牵制作用。CC徐恩曾的特務組織，为时最早，起初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和制裁国民党內的异己分子，采秘密組織形式，其經費由中央党部特別費項下开支。陈立夫接长教育部后，把这个組織帶到知識界中，侵入到大专学校內，逐漸成为陈果夫、陈立夫在政治爭夺中的有力工具。后为掩护其发展，避免外来的攻击，就将組織形式改变，公开改称为中央党部調查統計局，成为中央党部內的一个正式机构，一般人通称之为“中統”。宪兵方面則有由宪兵副司令張鎮主持的宪

兵系統特務組織。先兵各團分布全國各主要城市，每個團皆設有特高組，專門對付共產黨活動和一切不利於蔣政權的組織。警察方面則有由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組織的警察系統特務，亦遍布全國各省市警察機構內，執行所謂“防奸、防諜”任務。康澤之別動隊，原為在敵後服特別勤務的組織，成立後遍駐後方各重要地區作所謂“防奸”活動。以上的特務組織均借公開機關為掩護，進行特務活動；它們的共同任務，主要是對付共產黨，不過因機關業務不同，活動範圍就皆有所局限，只有受蔣直接掌握的戴笠特務系統權力最大，活動範圍最廣。戴能借蔣之權力，運用政府各部門名義對外進行工作，如以軍令部名義與英美特務交換情報，進行特務合作，組織“中美合作所”，在沿海與美特配合活動；於中國駐外各國大使館內選派駐在武官，進行特務活動；在全國師以上的軍事系統機構中設立不同名義的特務組織，例如師部設連絡參謀，軍以上司令部設第二處，警備司令部設稽查处等。總之，凡是他就認為有必要加以控制和利用的單位，均可借蔣之權力，任意設立特務組織。

戴笠本為黃埔六期未畢業的學生，常隨蔣左右作臨時差遣情報工作。當一二八淞滬戰起，蔣介石一籌莫展，戴利用這個時機向蔣獻策組織一個機構研究敵情，分析自己部隊作戰能力，並分赴各地作實地調查研究。組成人員計有戴笠、唐縱、吳乃憲、張炎元、黃雍、徐亮、王天木、馬志超、梁干喬、余洒度共十人。滬戰後特務處成立時，黃雍、梁干喬、余洒度均退出（黃任調查科副主任，梁調復興社掌管訓練，余參加華北宣傳隊），蔣介石另指派鄭介民參加特務處任副處長。以後傳說的特務前身“十人團”，即此組織。戴笠在特務處成立後即採納顧順章之建議，集中精力訓練特務；又在杭州創辦警官學校，訓練所謂“外事警員”。南京失守，國民政府西

迁武汉，戴派刘璠到兰州成立西北特训班，派胡靖安在湖南设衡阳训练班。湖南淪陷后，衡阳训练班迁贵阳息烽，改为息烽训练班。后戴又接受美特建议，在福建建甌设东南训练班。至此，戴笠的特务势力遍及东南与西北。他除以一手抱住美国的大腿之外，又一手伸到汪伪组织内部。他派唐生明到上海投降汪伪，与大汉奸周佛海勾结，把特务组织发展到汪伪的政权中。此为戴笠特务组织发展的全盛时期。

复兴社取消后，戴笠的特务处改隶军事委员会，更名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当时局长为贺耀组（即贺贵严），戴为副局长，掌握一切，贺仅具虚名。此即所谓“军统”。

### 三民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八年夏，国民党政府西迁武汉后，国共开始二次合作，促进了全国上下一致团结抗日。这时国内形势大为好转，而蒋介石又派陈诚（当时政治部长）在武昌积极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他的打算不外是：（一）对共产党始终无合作诚意，一面企图在抗日战场上假日寇之手来歼灭共产党武装，一面又筹组三青团来破坏瓦解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二）企图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借以和缓自己的内部矛盾，并以三青团这个新的组织来培养新的力量；（三）全国各阶层及青年知识界同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思想行动日趋左倾，蒋恐共产党宣传活动深入人心，摇动自己的统治地位，为挽救这一危机，只有用新的组织形式来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网罗一切力量于一己控制之下。三青团的组织仍本法西斯个人独裁的形式，将CC团和复兴社的骨干分子尽行容纳于内。团长由蒋介石自兼，设书记长一人，并指定由陈诚担任（第一届代表大会后，书记长改为

张治中),掌管全团团务。設中央干事会和常务干事会,以容納国民党各派領袖人物,如陈誠、陈立夫、朱家驊、吳鉄城、段錫朋、譚平山、甘乃光、胡宗南、何浩若等。設中央监事会,以大量安置文教界知名人士和各大学校长,如陈果夫、梅貽琦、竺可楨、王世杰、吳有訓、蔣夢麟、胡庶华、黃炎培、王云五等。桂永清、袁守謙亦参加监事会。下設組織、宣传、人事、总务各处。組織处长胡宗南,副处长康泽、白愷;胡始終未到差,由康代处长。宣传处长何浩若,副处长程思远;第一屆代表大会后,处长改郑彥棻,副处长改包华国、李俊龙。人事处长叶溯中,副处长項定榮;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人事归并組織处。另設書記长办公处,处长仍为叶溯中,副处长为項定榮。总务处处长陈良,副处长黃雍。以后添設編审处及法制委员会,編审处处长刘健羣,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員譚平山。又添設副書記长一人,第一任为胡庶华,后为李蒸。各省市設支团,县、区設分团,以下为小組。为了利用原复兴社的旧組織基础来发展三青团組織,各省市支团主任多由所在地較高級的黃埔学生担任。三青团主要工作仍然是打入青年知識界,破坏共产党在青年中的組織活动。抗战胜利后,三青团在庐山召集第二屆代表大会,康泽、項定榮被排除,送美国留学,組織处长易蔣經国。后来三青团实質上完全掌握在蔣經国手中。

抗日胜利后,各地三青团負責人均以胜利者自居,乘机扩展私人势力,漫无限制地发展团员,参加分子日趋复杂,汉奸、流氓也一变而为三青团員。他們明目张胆,朋比为奸,劫收(接收敌伪财产)与搶夺(搶夺淪陷区的机关、学校和文化团体),肆无忌惮,鬧得各地党、政、团三方的斗争很尖銳。当时蔣介石鉴于在抗战中三青团所起作用并不如自己的理想和期望,反而起了不少的副作用,尤

感三青团对外号召还不及国民党这个老招牌，因之又来一个党团合并的新花样，在一九四六年将国民党与三青团实行合并。三青团的干事、监事們均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三青团到此結束。

这篇材料涉及范围甚广，关于火星社和孙文主义学会部分，原材料是謝宜渠提供的，其余部分多凭个人記憶。关于各个小組織的内幕和活动，尙有待于进一步收集資料，分別撰写。由于个人經歷有限，且時間相隔甚久，又无可靠記錄参考，誤錯与遺漏必多，盼望熟悉有关历史情况的讀者予以补充指正。

## 复兴社述略

蕭 作 霖

我是在中华复兴社(以下简称复兴社)成立一年后才加入的,对于这个法西斯組織最初成立的經過所知并不詳細。我加入复兴社以后,曾任过它的公开外围組織“中国文化学会”总会書記长,主編过它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并先后任过它的湖北省分社和河南省分社書記,但未参与过它最上层的核心活动,因而对于其中許多机密大事和内部复杂情况也不甚清楚。我自从大革命失敗以后,即意志消沉,但是因反动的階級本能驅使,后来終于又投入反革命陣营,参加了不少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一段經歷好象一場恶梦,現已事隔二十余年,当时既所知有限,現在又記憶模糊,下面所写的只是一些一鱗半爪之談,其中記錯和遺漏之处,亦必不免,有待补充訂正。

### 复兴社的起因和組織概况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无可遏止。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由大革命失敗后的低潮,又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向高潮发展,并且在全国各阶层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爱国运动汇合之下,声势日益壮大。在这种形势之下,蔣介石感觉到如果仍然繼續反共

而不表示抗日，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自己的主要爪牙黄埔系军人来说，也很难压制得下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这样，他将用什么力量来反共？这是他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因此，他就采取假抗日真反共的手段，一面标榜复兴民族，复兴革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以缓和当前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激气氛和激烈行动；一面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家统一，从而他就用“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来破坏共产党和人民结合的爱国运动。他企图用这种欺骗手段来转移包括黄埔军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使之化为维护国民党政权和他的独裁统治的力量。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也正符合于当时所有地主、官僚、买办资本家等反动统治阶级的自保心理。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当时形势下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玩弄的一个阴谋手段。

蒋介石玩弄的这个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必须要有一批他所认为忠实可靠的骨干来推动，而在他看来，这批忠实骨干便不能不同时也只有利用其最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一方面为了升官发财，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眼见民族国家的灭亡已迫在眉睫，却又不能不激发爱国天良，因而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抗日要求。即如一贯反共最力的复兴社主要骨干桂永清，也有这种倾向。当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举行全国童子军大检阅时，他任评阅长，我也是评阅委员，当我们绕场察阅一周，到最后见了只有稀稀落落几十个人的东北童子军代表队，我们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桂永清竟至痛哭失声，向蒋介石报告时还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抗日与反共，本来在黄埔



学生的思想感情上是一个很难统一起来的矛盾，但是蒋介石却运用这个所谓民族复兴运动的阴险手法，来利用他们这个思想矛盾。果然，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欺骗口号之下，一般黄埔学生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立即尽情发作出来，更加疯狂地集中于进行反共活动，而首先便是法西斯特务组织的建立。

一九三二年初，当时任何应钦秘书的投机政客刘健群，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这是其后复兴社被传称为“蓝衣社”的来由。可是蒋介石当时虽向往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也急切要建立一个法西斯特务组织来作为镇压人民革命力量的工具，但最初毕竟还不敢公开仿效德意的法西斯组织形式，也还不敢公然标榜法西斯主义，因而他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也就没有敢于采用“蓝衣社”这个名称。与此同时，黄埔学生酆悌、滕杰、潘佑强等人也纷纷向他提出建立核心组织的建议书。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首先成立了力行社，然后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又以中国革命同志会为内层，成立了中华复兴社为外围组织；更于中华复兴社之外，还有一个忠义救国会。所有这些组织，都由蒋介石自任社长、会长。力行社的社员很少，据邓文仪说，只发展到七八十人时就停止吸收了。社员除少数人如刘健群等外，大多数都是黄埔各期学生，其中又以第一期的为最多。力行社本身没有什么组织机构，社员分成小组，各人都能直接受到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的领导骨干或省市分会负责人，省市分会书记只有极少数不是力行社的社员。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多数也是黄埔各期学生和各个法西斯组织的各级机构中非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层骨干分子，此外便是上层知识分子如大学教

授及各級政府机关中等以上官員如秘书、科长以至处局厅长之类。

复兴社的社員，多数是中下层知識分子——中小学教員和大中学生，此外便是各級政府机关的中下級職員和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分子以及一些中等阶层的社会人士。

忠义救国会的會員，主要是帮会的骨干分子和某些下层社会的人，实际上絕大多數都是土劣恶棍、流氓地痞。

复兴社各級組織的骨干自小組长以上，絕大多數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的會員，只有极少数例外。忠义救国会各級組織的主要骨干，則絕大多數都是复兴社的社員。忠义救国会的會員也有个别被吸收加入复兴社的，但为数极少。复兴社的社員一般都是由老社員介紹直接入社。中国革命同志会的會員，則一般都必须先經過加入复兴社，但也有不少是被特許直接入会的。忠义救国会的會員一般不知有复兴社，复兴社的社員又一般不知有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国革命同志会的會員則又一般不知有力行社。各层組織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逐层都是秘密的，以便于层层控制。

中国革命同志会，是由力行社社員控制的法西斯特务中心組織，其組織机构是在会长之下設干事会，而由書記长集权，承会长之命总攬会务。書記长之下，設有总务、組織、訓練、宣传、軍事、特务等处，处下分組。各省市設分会，分会干事会也由書記集权，总攬一切，下設总务、組織、訓練、宣传等組。分会之下，按地区及机关学校的會員人数多寡，分設区会或支会，支会以下为小組。小組为基层組織，每星期举行小組會議一次，内容为传达上級的指示、批示和文告，討論总会发下的关于国内外政治动态的提要和宣传要点，彙报和討論小組所在地区或单位范围内的动态，彙报會員的个别活动情况——如对共党嫌疑分子的偵察及对CC 团分子活动

情况的探索等等，討論关于发展組織及某些对外的問題，介紹會員和討論通过新會員。必要时可召开小組临时會議。每次會議后，由小組长逐項詳填小組會議報告表，层报上級組織。关于組織、訓練、宣传的事項及有关对外某些具体問題，經层报到分会，由分会分別予以批答指示；但关于所在地区或单位的政治动态及某些个别人物的活动情况的情报，則分会不作处理，一律轉报总会核办。复兴社自总社至各級組織，都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級組織机构之内，并不另設一套；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級組織机构，兼办复兴社各級組織的一应事宜。事实上，会的各級組織机构，亦即社的各級組織机构；会的各級負責人，亦即社的各級負責人。會員社員虽有所区别，而基层小組一般都是會員和社員混合編組的。但小組只能通过吸收社員，报經分社批准；社員提升入会，則須由會員向上級組織介紹，經分会报請总会批准。在分会所在地及其他會員人数較多的地区，則有會員的小組及区支会，不混合于社的下层組織。會員入会的条件，較严于社員入社的条件。如会章規定會員每月收入在二百元以上者，应将超过二百元的部分繳納給組織（事实上并未办到）；社章則无此規定。繳納会費的規定也高于繳納社費。會員的紀律也比社員严些，如对社員最大的处分只是开除，而对會員最大的处分則是禁閉、監禁，甚至处以极刑（事实上却并未开除过社員，會員被处极刑的虽也有过，但并不多見，我对会章、社章的規定也已記不很清楚了）。入会表和入社表基本上差不多，仅入会表規定更詳細一些。入会和入社的宣誓仪式也差不多，但會員的宣誓仪式要更隆重一些，要指派較高級的負責人監督。宣誓时，須向蔣介石的肖象行最敬礼，然后举手宣讀誓詞。有个別举行的，也有数人或十数人甚至数十人一起举行的。在文件或通訊上，对會員

称“至友”，对社員称“好友”，以为識別。各級組織都有代名，总会（总社）及其各处和分会（分社）的代名，由总会（总社）統一定称，不时更換；分会（分社）以下組織的代名，則由分会（分社）統一定称。下級对上級称“兄”，上級对下級称“弟”，行文通訊一律用代名。总会干事会干事、書記长及各处处长，一律由蔣介石指派，并随时更換。分会干事会干事和書記由总会指派，但書記須报經蔣介石批准。分会助理書記和各組組长，有由总会直接派任的，也可由分会書記提举报經总会批准任用。分会以下各級組織的干事会和書記由分会指派，基层小組长由区、支会指派。各級組織只有縱的关系，沒有橫的联系。除小組會議外，有时也由支会或支社召开會員或社員會議，但这是极少的。区会、分会除有时召集會員講話外，并不举行会、社員的會議或代表會議，一切决定都只有由上而下，絕沒有由下而上的。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复兴社，除了有内外层之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組織，也是完全可以的。社員的人数也比會員多許多倍，會員总数大約不过两万人左右，而社員总数可能至少在十万人以上（我不知确数，这只是根据我任河南省分会書記时的分会会社員概数来估計的）。

忠义救国会的組織不混合于复兴社之內，另有它的支会和小組，但沒有办事机构和专职人員，只有少数办公費，由各級負責人兼办有关事务。中国革命同志会分会在組織內有专人主管关于忠义救国会的組織及一切有关事宜，事实上只作为分会的外围，不是同复兴社一样有其自己的上层組織，虽然复兴社的各級組織也是依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各級組織的。

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設在南京明瓦廊中央軍校毕业生調查处，其高級骨干分子之沒有公开职务者，都以政訓处的設計委員作

为掩护的公开名义。省市分会书记则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門首都悬着通讯处的牌子，职工都佩带通讯处的証章。分会书记、助理书记和组长，还可在当地的高级军政机关（如綏靖公署和省政府）掛上高級參謀或參議、諮議之类的名义，以更便于公开活动。区、支会也以通讯分处的牌子为掩护，其负责人也可在当地军政机关掛个什么名义，以掩护其活动。各级组织的經費，都是由其上级组织发给。总会的全部經費，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費、社費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別費項下拨給，預算也是要經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經費，則不在总会經費預算之內，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預算，直接报經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构的經費，統由特务处拨发。其經費总额，据说較之总会的全部經費，至少約在十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个独立系統，它的总机关也另設在鸡鵝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內。它的一切計劃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請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聞。它在各省市都設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同樣完全不能与聞其任何活动。一九三五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周伟龙連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訴我，而只告訴我他的家在那里，并且他們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一九三六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見面，并且态度傲慢，簡直象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設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

就設在分社的對面，也與分社不通往來。分社的辦事人員乃至書記本人如要到他的機關去，也同樣要經傳達，和一般外人毫無區別。有一次我到鄭州視察，找到了劉藝舟的機關去拜訪他，他的門房竟厲聲說，“這裡不會客。”經隨同我去的秘書告訴他我是什么人之後，他還是說，“不管是誰，這裡不會客。”事實上這個門房也確實可能並不知道我，因他們與分社根本就沒有什麼公事往來。他們只知道他們的上級機關在南京，上司是戴笠，連復興社總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說分社了。特務站無論什麼事都絕不向分社請示彙報，分社來自各基層小組的情報也不直接轉特務站，而是彙寄總社核轉特務處。擔任分社干事的特務站長對分社干事會的會議也極少參加，即使參加也絕不談及特務站的工作情況。某次鄭州有一個在扶輪中學當教員的社員忽被特務站捕去了，鄭州組織報請分社去函請其查復，他們却復函推說不知道。那個教員被釋放後，才說當時就是被拘禁在劉藝舟的那個機關內，是以共產黨嫌疑被捕的。不僅如此，甚至特務站在分社內也竟有他們的人，這是到好幾年後，劉藝舟已經和我有了交情，才親口對我說的。他說：“最初你到開封時，在你的分社職員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一舉一動我都是清楚的。”特務處系統的人都是專職專薪的職業特務，至少也是受津貼的。復興社的社員中，也有不少人受了特務站的津貼，參加了特務系統，但他們絕對不許向復興社組織報告。有些中下級機關職員、中小學教員和大專學生中的復興社分子，因為受了津貼，參加了特務系統，對復興社的一般活動就不大熱心了，甚至小組會議也不常到，同時他們的行動却更鬼鬼祟祟起來。他們的小組長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也就不再去查問他們了。特務處有它自己的組織，在他們所有的人中，有復興社分子，但不是復興社分子的人還

更多,甚至其上层骨干中也有沒参加复兴社的,如曾經任过特务处書記长和上海区站长的王新衡(后来专任戴笠与杜月笙之間的 联系人)就曾对我說过,他並沒有参加过复兴社。从組織形式的表面关系來說,特务处与复兴社簡直是各成系統,但在实际上当然不仅是一体,并且特务处系統是复兴社組織的尖端行动机构,亦即是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实质的具体体现,这却是非常显然的。只是关于特务处系統內部組織的具体情况,則是非曾亲身参加其中的人不能詳知的。外間一般都认为特务处系統即所謂“蓝衣社”,或认为“复兴社”就是特务处系統,从实质上說来也是可以的。

### **“行动即是理論”——复兴社的“理論”**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論”,这是复兴社所依据和奉行的法西斯教条,也就是它的理論基础。法西斯祖师墨索里尼曾說:“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从綠呢桌上先有理論而产生的,它是为出动的必要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身就是去干。”也就是說的这个意思。更簡言之,即“根据需要去行动,就是一切”。

本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它对內主张实行极权的独裁制度,取消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殘酷鎮压工农羣众;对外則推行瘋狂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因此它的行动就是崇尚武力,鼓吹战争,反对議會政治,反对共产党,实行独裁的极权統治。这些也就算是它的理論了,此外实在也是說不出个什么道理来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來說,它的出現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并不是怪;可是中国当时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反动統治政权自保不遑,那里还談得上什么对外侵略。蔣介石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統治,不过是为了巩固他的統治地位和达到他

个人独裁的欲望，从而其行动的主要锋芒，也就只是镇压国内的人民和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不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点。可是镇压人民和共产党的行动，毕竟不好说这就是理论，还得有点什么理论似的東西，才能欺騙羣众。因此除了蒋介石自己有他那一套“礼义廉恥”的理论之外，复兴社还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賀衷寒、邓文仪、刘健羣，他们也制造了一些“理论”。

賀、邓、刘三人，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印出了些小册子，如賀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羣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等等。他们所讲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复去，总之不离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飭军备等等；而要作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而首先是、最后也是“行动”，也就是“硬干、实干、快干”。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他在一九三三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



中,更明确提出:“督促全国軍民羣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統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組織!改革腐敗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勦灭各地赤匪,取締一切反革命运动!剷除貪官污吏与腐惡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動員,扩大青年壯丁的軍事訓練!”等等許多条,就簡直是一个行动綱領。

刘健羣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說:“我們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須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們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須坚决主张勵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必須坚决主张領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統制經濟,发展国家資本,必須剷除貪污,要剷除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黨員的私产。这三个要点連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和講演,也就总不外是連成一套的这三个要点。

賀衷寒一貫以黃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論家和指導者自居,他的著作虽不多,而长篇大論的講演可很不少。他对于“蔣介石教义”的闡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蔣介石的法宝——所謂“礼义廉恥”,作了当时頗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說:“礼者理也,循規蹈矩,謂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謂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謂之廉;恥者疵也,刺激奋发,謂之恥。”这就是說,要人循規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話,就是:不可反抗,只能服从。他不象邓文儀那样的一来就是一大篇口号,除了口号还是口号,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說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如他在所著《国民革命与国家統一》一文中說:“我們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

人主义。”反来反去、最后的結論却是要統一于“服从領袖”。他的理論，大都类此。

他們这些“理論”，就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行动的指导，对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也起了一些蠱惑作用。但对于资产阶级上层知識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和博士碩士者流，这一套“理論”可就沒有什么說服力了，要再講出一些更大更深一点的什么道理出来才好。記得一九三三年南昌行营有一个集“专家学者”于一堂以贊襄“剿共”大計的“設計委员会”，其中有一位設計委員留美博士张舜鼎曾对我說：“我看你們光喊攘外安內和拥护領袖还是不行，應該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我們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对抗共产党。”他还送了我一本书，好象是巴尼斯著的《法西斯蒂精神史观》，要我先研究一下。其后我便和邓文仪、賀衷寒、吳寿彭等及南昌行营設計委员会的一些委員商談，想要开展一个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并且經過一番酝酿筹备以后，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这个組織在筹备期間，曾由吳寿彭起草了一个“緣起”，經大家討論一致通过。这个緣起，基本上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上层反动知識分子的思想，也可以說是較完整地表現了复兴社法西斯理論体系的一个重要“文献”，摘录如下：

（上略）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沒落，无可挽救，惟有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終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蕩而为再一度之发揚。……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尙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惟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的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爭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

成之可能。反之，德国国家社会党的政綱，要求把助成物質主义的法令之废削，将成为世界各处之一新趋势。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經濟为文化的全基础，只有建立新經濟制度而后能建立新文化之意見。更不信其中国所要之經濟制度即俄国列宁所要之經濟制度。我等預料苏俄将可有一度文化之发揚，决不是今日一般逆合其新王朝、崇作工农之頌歌文字匠即自鳴为无产作家者們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頌歌是与旧王朝的頌歌一样不值錢。俄国文化之发揚，乃是旧俄諸作家所显现的那一北极的广漠之国的灵魂之发揚。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义，生而为人就沒有自由。自由之本义为不犯人之自由，此外，这自由两字无所用之。我等以两重意义反对前期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我等提出責任一詞以反自由。……从責任出发，即成道德及其規律。我等志愿結束这前期文化运动，重新做起，确立新的責任与新的規律，团結这破碎了的中国社会。

我等反对自由主义之反民族主义。我們不是原則上反国际主义，我們认为只有坚实的民族可以参加国际，中国正需一坚实的民族运动，以获取国际間之穩固地位。德意志以严格的民族主义来斗争，为自由主义者所菲薄，但攔开一切之粗暴，历史将証見德国这新起的严格之民族运动，乃适合乎当代之需要。……反民族主义，乃真是忘本主义，忘本不可。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唯心論之可为唯物論所破，正如唯物論之可为唯心論所破。……那些小資产者之溫和主义原是十分美丽，但时势正轉入粗暴，溫和主义无能为力。（下略）”

这个“緣起”所揭櫫的这五个論点，显然可以說完全是封建性的，是十足封建統治的反动观点，而又支离破碎，許多地方牽強附会，不能自圓其說。其实除了集中于反共这一点之外，它也并没有說出个什么更深更大的所以然来，說來說去，也还是“行动就是理論”的理論。但是这种极端唯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观点，却还算是較明确地表征了这个畸形的中国“封建法西斯”的思想本質，而这也正是复兴社組織的最高指导思想。

## 法西斯宣传和中国文化学会

复兴社固然只讲行动,但宣传也是行动,并且毕竟还是首要的行动,因此最初就接收了由几个黄埔学生私办的《文化日报》,改组为《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便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期刊——《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到一九三三年一月,又将这两个刊物合并改为《中国革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词说:

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

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巩固革命政权;从现在的生存上的需要,是发展国家资本,充实民生,建设国防,收回失地,报复国仇;从将来的国际形势的演变,是积极备战,准备应战,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力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

但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之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

这个刊物所有各期的内容,也就不外是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撰稿人也大多是复兴社的上层骨干分子。但是它一直并不公开标榜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只是愈来愈多地介绍法西斯的理论和德意法西斯统治的各种情况<sup>①</sup>。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在我主编的时候,我

<sup>①</sup> 《中国革命》周刊各期一些较主要的文章题目摘录如下:复兴中国革命之路、复兴民族方案之商榷、民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政治、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论统制经济、剿匪军事之进展、意国法西斯党组织之概况、德国国社党组织之概况、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党的研究、法西斯主义之思想、国社党的起源及其成因、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义下之世界、新兴土耳其国民文化运动之发展、武士道之史的研究,等等。

还在答讀者問的通訊中說：“我們還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于中國，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三民主義，是完全適合于我國國情的。但是我們應該研究法西斯主義，可以作為借鏡。”這是因為當時我們畢竟還不敢公然承認我們主張實行法西斯主義，還是覺得抱着三民主義這塊招牌較能迷惑視聽；同時我們也實在對於法西斯主義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說也說不出個名堂來。並且蔣介石雖然在實際上把法西斯主義當作三民主義來實行，但是他在口頭上自始至終都不談法西斯這個名詞，開口閉口也還是三民主義，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這個名詞了。

在《中國革命》周刊在南京創刊的同時，由賀衷寒于軍事委員會政訓處出資，在上海創辦了《前途》月刊。這是一個“理論性”的大型刊物，與《中國革命》周刊相呼應，同為復興社的主要喉舌，由復興社骨干分子大學教授劉炳藜主編，復興社分子大學教授孫伯騫、茹春浦、倪文亞、張云伏等共襄其事。最初面目尚不鮮明，在其發刊詞中所表示的態度，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說：“將傳統的个人本位的殘骸，迅速地葬送了去；將集團主義的新興勢力，嚴肅地建立起來；為民族的存亡而鬥爭，為正義的存亡而鬥爭。”因此徐懋庸及其他一些較進步的教授，也在最初幾期中發表了一些文章。創刊號由李石岑、樊仲云、孫伯騫、劉炳藜、武培干、傅東華、梁園東、張云伏、白瑜、倪文亞、包華國、孫恨工、林風眠、李朴園等，分別寫了關於論述世界和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外文、文藝等方面動向的文章。這些撰稿人多數是復興社分子，他們對世界和中國前途的觀察，顯然都是有著一致的看法和傾向的，但都有意識地說得不太露骨，只是從資產階級的一般觀點出發，還沒有明顯地擺出“封建法西斯”的面目來。這是因為上海當時是全國文化的中心，

为上层知识分子汇集之地，他們不能不首先采取試探的态度和漸进的方針。直到該刊第六期，賀衷寒才露面，开始刊載了他的文章，接着，蔣介石的訓話也就老是在該刊占着第一篇的地位了；同时关于法西斯的譯述，也逐期增多<sup>①</sup>。其他关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論著，也逐漸更多地表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傾向。其撰稿人除蔣介石、賀衷寒、邓文儀、蕭作霖等以及前面所举的一些人以外，还有余文伟、区克宜、馮和法、孙慕迦、李金髮、章渊若、徐佩琨、张一凡、庄心在、张彭年、易水寒、卫聚賢、赵演、招勉之、朱通九、汪洪法、俞君适、孙怒潮、陈友生、徐懋庸、茹春浦、刘泮珠、丰子愷、李青崖、黎錦明、譚云山、程拂浪、董任坚、李冰若、姚宝賢、賀玉波、沈琳、殷作幀、楊季、許太空、楊俊等人，絕大多数都是大学教授和作家，其中还有少数是名教授、名作家、名艺术家，并且将近半数是复兴社分子。因此，这个刊物在当时的上海文化界也頗有一定地位。

此外，大型日报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有由賀衷寒主办、初在南昌发行、后迁汉口的《扫蕩报》。期刊有由刘健羣主办、张佛千主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北平創刊的《老实话》。这是一个小报型的周刊，没有什么理論性的論著文章，专门刊登对共产党与其他較进步的党派和人物造謠誹謗、聳人听闻的报道以及一些内幕秘聞之类的社会新聞，借以迎合一般有閒階級和中下层知識分子的趣味，发行量頗大。此外，还有由蔣坚忍主办、

<sup>①</sup> 在該刊第一卷的后几期，即有如下一些文章：“法西斯蒂的国家——协团的國家”、“法西斯國家的概念”、“法西斯主义之政治与社会理論”、“法西斯主义之經濟原理”、“法西斯治下意大利的經濟制度”、“法西斯主义之國家改造論”、“法西斯蒂下之劳动业余訓練”、“法西斯蒂的精神史觀”、“法西斯蒂的軍事組織与軍事訓練”，等等。

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和由我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都是先后创刊的复兴社重要刊物。《青年与战争》周刊最初每期只刊载一些关于“剿共”的宣传鼓动性的短文，其后改为大型的理論指导性刊物，内容与《中国革命》周刊差不多，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合并于《中国革命》周刊。

其他先先后后、直接間接与复兴社有关系的各地报刊，也很不少。有由复兴社分子主办的，如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和开封的《河南晚报》；有由复兴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有由复兴社分子担任編輯的，有为复兴社地方組織所运用的，計有杭州的《国民新聞报》，青島的《新青島报》，汉口的《新中华日报》，南京的《中华周报》、《国际譯报》、《中国与苏俄》月刊、《国际周报》，在上海的《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民族文艺》月刊，天津的《現代社会》周刊，西安的《西北評論》半月刊，长沙的《乐羣》周刊，还有其后我在南京主办的《内外杂志》，等等。各地組織和会社員个人还办了許多小型报刊。各軍校政訓处和各級部队政訓处也办有不少大小型报刊，如中央軍校政訓处发行的《黄埔月刊》，連同各級軍隊特別党部和各省市国民軍訓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在內，估計至少在一百种以上，这里所举的还不及十分之二三。

图书出版机构，有最早由邓文仪主办的拔提书店。这个书店总店在南京，并在汉口、南昌、长沙、貴阳等地設有分店。一九三二年它发行过由汪漫鐸主編的一种文艺月刊和由程拂浪主編的一种关于国际問題譯述的月刊。它所出版的书籍約有二三十种。它的主要业务，是大量出版蔣介石言論集、蔣介石传记及其他为蔣介石个人作宣传的小册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于上海环龙路五十号設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书局，出版了一部国联秘书厅編輯、内外通訊社翻譯的《国际联盟軍备年鑑》（一九三三年的）及《青年丛书》、《軍事丛书》、《名著丛书》等共約二十种，此外还出版了内外通訊社編譯的《内外类編》小册子共四十余种。“内外通訊社”是南昌中国文化学会总会所設立、由吳寿彭主持的一个編譯机构，主要是編譯有关国内外大事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动态的专文专論。这个书局設立仅半年之久，即随着中国文化学会的被取消而停閉了。此外还有刘炳藜在上海筹办的前途书店，也出版了《民族革命文选》及其他几部书，但終于沒有正式办起来。复兴社在出版事业方面，較之CC团是远远不及的。

复兴社的各种报刊，遍布全国各地，对于散布法西斯毒素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是复兴社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論基础可为依据，总社又沒有一套全面的計劃和集中領導，而只任凭各个报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而許多报刊又都是任由主編人胡乱发表言論，而且翻来复去，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內”和“絕對拥护一个党、一个領袖”这一套濫調。因此，这些报刊的宣传效果越来越小，連那些編輯者和撰稿人也都不免有点不大起劲了。到了前面所提到的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以后，复兴社的法西斯宣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經過是这样的：最初是我認為有必要开展一个全面的新的文化运动，以轉移风气，振作人心，而首先应从革新生活作起，并先由复兴社組織的会社員带头作榜样。因此，我写了十几条意見和邓文儀商量，經邓拿去給蔣介石看了，蔣大以为然，說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会社員，并应推行于全国。于是他



就拿去搞起所謂“新生活运动”来了。但是我們仍然决定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学会来搞我們自己的一套。經邓文仪、賀衷寒、吳寿彭和我及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級骨干商討决定，并征得南昌行营設計委员会那些号称“专家学者”的委員张舜鼎、蔣志澄、李毓九、高传珠、白瑜、傅銳等人同意参加发起，便起草通过了緣起，筹备成立。虽然列名发起的几十人中知名之士很少，号召力太弱，但是我們决定先成立起来再說。成立会奉蔣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任理事长，我任書記长，并在南昌戴家巷十四号把牌子掛了起来。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和宣传“我們的主张”。这个“主张”除了标榜“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則，发揚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創設新中国文化”之外，还列举了十几条細目，但是它的中心内容在于“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領袖及革命集团之絕對信仰与拥护”，“根据三民主义指斥共产主义与資本主义之謬誤，辟除階級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分会，大家认为上海最重要，如不能在上海打开一个局面，造成声势，将很难在全国各地吸引文化界人士参加，普遍展开运动，因此决定由我去上海会同刘炳藜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我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上海，即与刘炳藜、孙伯騫、倪文亚等及复兴社上海市組織的負責人共同商討进行，首先征得了上海市长吳鉄城和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恆等参加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設于环龙路七十六号），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員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复兴社分子，广泛展开征求會員的活动。不及一月，即征得約七八百人入会，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学校学生，大学教授也約有百余人，余为中小学校长、教員、机关職員及少数作家和报刊編輯、記者，随即举行了成立

大会，选出吳鉄城、翁之龙、黎照寰、裴复恆、刘炳葵、倪文亚、孙伯竊等二十余人為理事，組織理事会，并推吳鉄城、刘炳葵、萧作霖為常务理事。这样，在上海的局面算是初步打开了。同时我即将《青年与战争》周刊移沪发行，《中国革命》周刊也迁沪由我負責主办；又将我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為《中国文学》月刊移沪发行，撰稿人有赵景深、宗白华、段可情、高植、张天翼、徐仲年、陈梦家、庄心在、汪漫鐸、王一心、陆印泉等，此外，还办了一个《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行的《前途》月刊，我們共有五个刊物集中于上海。我們在上海展开了这样一个局面，对各地文化学会分会的筹备，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杭州就紧接着成立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組織了一个“文化前卫队”，这个組織还举行过宣誓典礼，請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別派員去監督和觀礼。当即由我一人同时代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我买了一把劍、一把大刀带去，劍作为总会授与，刀則作为上海分会的贈礼，用意是以刀和劍象征鉄和血和“文化前卫”的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所謂“文化前卫队”的隊員約有三四百人，都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国立艺专学校的学生，还有部分中央航空学校与浙江警官学校的学生，以及少数高中学生。他們都穿着整齐的学生制服，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他們的队长赵龙文（浙江警官学校校长）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参加觀礼的人大多是大中學生，約共有千余人，围拥在这个营横队的队后和左右两边。典礼开始，首先是举行宣誓，全队肃立，赵龙文領头举着右手宣讀誓詞，他唸一句，全队跟着唸一句，我被請站在主席台正前監督。然后由浙江分会常务理事蔣坚忍（中央航

空学校政訓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长赵龙文按照军队仪节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两手向右前伸举旗正步走回原位置,将旗轉給跑步到前面来的护旗兵接着,照样正步走回营横队的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閱兵式,蔣坚忍等在主席台上的十余人,陪同我下台从营横队的排头走到排尾进行了检閱。接着由我代表总会授劍和代表上海分会贈刀,我和蔣坚忍等講話,最后由赵龙文答詞,于是奏乐礼成。当时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浙江省的一些重要人物,現已記不起了。这一幕活剧,現在想起来,实在不能不觉得啼笑皆非。这个由警官学校校长任队长的所謂“文化前卫队”,这个完全按照陆军仪式进行的所謂“宣誓典礼”,又加上授劍贈刀这一个突出的节目,总合起来,便明明白白是“警察前卫的刀剑文化”,实在是表征法西斯文化运动精神实质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特写镜头。当时中国文化学会和复兴社把这个活剧认为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創举和大事,一时传为“美談”。

上海分会于成立后,除了繼續征求會員和有时开开座談会,并曾举行过几次講演会外,因为要集中力量对CC团的“文化建設协会”进行某些爭夺的活动,还没有計劃到怎样来具体实行“我們的主张”。我和刘炳藜认为首先还得有一个文化統制的思想运动,才能順利展开我們的文化运动。因此,經過分会理事并在會員中进行了一些討論以后,組織了一套专論,于《前途》月刊二卷八期出了一个文化統制专号,有吳鉄城、賀衷寒、刘炳藜、茹春浦、董任坚、李冰若、张云伏、姚宝坚、李朴园、萧作霖、殷作楨、賀玉波、沈琳、楊季、許太空、楊俊等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題目有“統制真詮”、“人类統治思想的演进与三民主义的使命”、“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統制”、“我国文化統制的历史观”、“三民主义的統制阶段”、“文

化統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統制文化以救亡图存”、“統制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統制的目标及方法”、“文化統制与文艺自由”、“中国新文艺运动及其統制政策”、“教育統制的性质和条件”、“文化統制宜先于經濟統制”等等。所有这些文章的“微言大义”，总不出我和刘炳藜这两个主要发起人所举的要旨。我在文中說：“我們要将文化限制于人类共同生活和社会演进的范围内，就是文化統制。文化統制不在成立一个統制机关，要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信念。以复兴民族、夺回民族生存权的抗爭精神，为今日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刘炳藜在他的文章中說：“惟有把自然統制于人力之下，惟有把由人力向自然开辟所得来的文化控制于民族精神之下，以民族精神为最高指揮，民族政治組織及其領袖为最高指揮之执行者或代表，文化为手段或工具，前者統制后者，把人力即民族精神力或精神作用加于自然开辟的过程之上，即自然被統制于文化，文化被統制于民族精神，則国家的一切，无论政治、伦理、道德、学术思想，可上軌道，这就是我們所提倡的文化統制。”这个专号，虽遭到一些进步报刊的抨击，但也是中国化学会活动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各地分会及与复兴社有关的各地报刊，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专号出版以后，我們曾陸續收到数以百計的来函来稿，即我个人也接到好几十封这种来信，以至不暇作答。当时我和刘炳藜都認为这个文化統制的思想运动，是会开展得下去而将收到极大效果的。可是这时中国化学会却因受到CC 团的借故进攻而奉令取消了<sup>①</sup>，从而我們的所謂“中国文化运动”也整个都頓成泡影了。

---

① 中国化学会被取消的原因詳見“对其他派系的斗争”一节。

在中国文化学会存在的短短八九月期間，是复兴社法西斯宣传活动的高潮时期，各地組織的宣传活动都活跃起来，使会社員大大增长了一些“精神作用”，对社会也起了一些較深的恶影响。

### 复兴社特务体系的活动的几个方面

复兴社組織也有一个“政治綱領”，現已記不大清楚了，只記得大意是：絕對拥护蔣介石为全国唯一領袖，实行中央集权制；收复失地，保持領土主权之絕對完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約；实行平均地权，促进农业发展；实行統制經濟，发展国家資本；整頓国防，实行征兵制，勵行国民軍事訓練；彻底澄清吏治；普及平民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安定社会，等等。其实只有“絕對拥护蔣介石”和“彻底消灭共产党”这两条是其真正的根本所在，复兴社的一切活动，都本乎此。

法西斯是对內統制和对外扩张一个总体性的特务行动体系，如德国納粹的間諜机关就有陸軍部偵察司、国外德侨部、盖世太保国外支部、对外政策部、外交部特务司、宣传部国外司、国民經濟国外司、帝国殖民司等等，这些主要都是对外的。蔣介石既不可能有对外扩张的条件，而只有对內統制的野心，因此他的法西斯特务活动的矛头也只是对內的，但也是总体性的，不論在国民党各級党部、各級政府机关、各种經濟机构和文化教育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社会事业机关以及陆海空軍部队中，都有着它的各种不同方式的特务活动。以复兴社組織为核心的这个特务体系，还只是其总体的重要部分之一，而主要范围是被划定于軍事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

关于軍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就是陆海空軍部队。以軍事

委員會政訓處為總機關，於各級部隊和各軍事學校、各軍事機關都設有政訓處，派駐政工人員，中級以上的政工人員多數都是復興社分子。其主要活動除進行反共的宣傳鼓動外，便是偵察、監視各部隊長、各級軍官和學生的思想行動，不僅對於非嫡系部隊和雜牌隊伍如此，即對嫡系部隊的部隊長也不例外。蔣介石不許復興社吸收帶兵官參加組織，黃埔學生出身的帶兵官，尤其是師長以上的非經特許也不能參加，只有少數如胡宗南、黃杰和桂永清等是例外。其他也還有極少數的團旅長參加了組織，則或者是沒有被他知道或者是派在非嫡系部隊負有特殊使命的。他不許掌握實力的部隊長參與政治特務，而使政治特務對掌握實力的部隊長起監視作用，以為牽制，可是事實上却正相反：黃埔學生中掌握實力的部隊長並不愿參加復興社組織，對政訓工作及其人員都很輕視；而政訓人員絕大多數也都不愿干這一行，把政訓工作叫作“賣膏藥”，認為沒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黃埔學生，更認為是倒了霉。他們只是把政訓工作當作橋梁，希圖借此同各部隊長拉上關係，能轉入帶兵。因此，他們在所派駐的各嫡系部隊中，對掌握實力的部隊長非但不去監視，反而趨附逢迎，盡力獻殷勤討歡喜，希望能博取部隊長的信任，轉入帶兵。被派到非嫡系部隊的政工人員也一樣，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殊權勢，作為依附投靠或要挾敲詐的本錢。非嫡系的部隊長對他們不能不有所顧忌，有些也就樂得滿足他們的欲望，給予軍職，以拉攏他們；大多數則是採取送錢收買的办法。一般政工人員都樂意被派到非嫡系部隊去，因為既可得到上級的特別重視，又可有機會撈官撈錢，比派到嫡系部隊去要好得多。一九三六年我在軍事委員會政訓處任設計委員，經常同他們許多人接觸。凡是被派在嫡系部隊的政訓處長，一般都是愁眉苦臉或大發牢騷；而被派在非嫡

系部队的政訓处长,却大都笑逐顏开,非常活跃,請客送禮,大肆活动,甚至狂嫖滥賭,揮霍无度。他們不仅和部队长的关系拉得很好,甚至有已被完全收买过去而跑到南京来为他們的新主子进行活动的。当时派在梁冠英部队的政訓处长王汝泮(其后曾任三青团河南支团干事长)就是这样的,他还拉我和梁冠英認識,并且到处为梁冠英活动。事实上政訓人員对所有各級部队所起的統制作用都非常微弱,甚至还相反地起了一些离間作用。这一点,政訓机构的总头子賀衷寒自己也很清楚。他曾对我說:“部队政治工作要就只有实行党代表制,象現在这个样子就还不如不要,这样干下去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后来到了抗战时期,曾將师政治部主任一律兼任副师长,但是仍然没有什么效果。但在宣传反共和領袖独裁,以及进行对共产党的間諜活动方面,政訓人員的罪恶活动所起的破坏作用則是很大的。

各級部队中的政訓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在駐防所在地,更是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社会实行軍事管制,首先就是清查共产党。他們可以自行制訂各种法令条例付諸实施,而且一律以“軍法从事”。他們的所作所为,往往連他們的部队长也不知道。至于当地政府及其警察司法机关,則更不能不听从他們的命令;只要說是对付共产党,他們就有着无上的威权。各軍事学校政訓处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以偵察和監視学生的思想行动为其中心工作,专司其事的就是派在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員。凡是被他們認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的学生,即由政訓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閉、开除处分,交軍法机关轉送陸軍監獄。当时部队和各軍事机关、各軍事学校的各級軍官和学生,对政訓人員別的一切都不怕,就只怕他們給戴“紅帽子”,而他們却有的就是“紅帽子”,

可以随更加到任何一个人头上去的。因此，一般軍官和学生虽都瞧不起他們，却也不敢得罪他們，因为“紅帽子”是誰也頂当不起的。

政訓系統的首要头子們——賀衷寒居首位，还有曾扩情、刘詠尧、袁守謙、邓文仪、蔣坚忍等，都是复兴社的高級骨干，复兴社組織就是通过他們来掌握指揮这个系統的特务活动的。关于人事行政，也由他們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組織并不过問。政訓系統的各級人員除复兴社分子外，也有不少的人并未参加复兴社，甚至有些軍师政訓处长并不是复兴社組織的会社員。并且賀衷寒等也都是直接承命于蔣介石，不受复兴社組織的节制指揮；复兴社組織只是通过他們个人的作用去貫徹它的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訓系統之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軍隊党务系統。这个系統也是以陆海空部队和軍事机关軍事学校为活动对象。这个系統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組織部的軍隊党务处(最初是个科)为总机关，于陆海空军部队师以上单位和各軍事机关軍事学校成立特別党部，由各該单位首长兼任特派員；所有書記长以下人員，則由軍隊党务处統一調派，当然主要也是以黄埔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为主干，也有由政訓处长兼任書記长的。师以下单位有团党部、营党部、連党部，各有少数专职人員，有些也是由政訓系統人員兼任。国民党各部队所有官佐士兵，虽然大都履行过集体入党的手續，但是并没有什么党的基层組織活动，和不入党没有什么两样。各部队中虽有各級特別党部，也因为沒有党的基层活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党务活动可言。軍隊党务系統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只是利用国民党軍隊特別党部的这块公开招牌和經費，占領这个陣地来进行反共和拥护領袖的宣传活动。而且事实上，属于所謂国民党中央党部組織部下的軍隊党务处，是由复兴社主要骨干分子黃仲翔負責掌握的，并不听



命于中央党部組織部，而是受复兴社組織的指揮的。

复兴社在軍事方面的第二个活动，是普遍实行軍事組織和訓練，将全国青壮年置于軍事控制之下，第一步以厉行高中以上的学生軍訓为主。这个工作的組織系統，是在訓練總監部下設立“国民軍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設“国民軍事訓練委員會”，各县市及各中等以上学校都派駐軍訓教官。省市国民軍事訓練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及各級軍訓教官，絕大多數是黃埔学生，也大都是复兴社分子。各县市成立常备队，輪流調訓青壮年，以三个月为一期，并实行軍事部勒，将全县市青壮年置于軍事管制之下。各县、市长兼任常备队总队长，軍訓教官任副总队长，实际負責。中等以上学校，則按学生人数編成总队或大队，由校长和軍訓教官分任正副总大队长，軍訓教官实际負責。各校除实施軍事訓練外，对学生实行軍事管理。国民党政府所頒布的“中等以上学校軍事訓練实施方案”的第九条規定：“凡受軍事訓練之学生，对于軍事教官之命令須絕對服从，严守軍紀風紀，如有不听命者，得按照陸軍懲罰令及陸軍刑法处罚之。”（这是最初的有关法令之一，見一九三二年广州中等以上学校軍事訓練委員會出版的《軍訓》。）其他还有不少法令規章，目的都在于使学生完全被控制于軍事管制之下。各校軍訓教官更利用这些規定和他們的权力，对学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監視和管束，并从中发展复兴社組織。因此，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复兴社組織，大都是由軍訓教官負責的。除了各校实行的軍事訓練以外，并于每年暑期举行各省市本屆高中毕业学生和大专学校的在学一年級学生的集中軍事訓練三个月。各省市成立暑期学生集训总队，由訓練總監部（实际上是由国民軍事教育处）指派省政府主席、市长或其他軍长以上的高級軍官任总队长，省市国民軍事訓練主任委員

和教育厅长任副总队长,由国民軍訓主任委員实际負責。总队設訓育委員會,其主任委員則由复兴社总社指派省市分社書記或其他高級骨干分子担任,負責进行政治教育和訓育,总副队长不能干預。一九三七年的河南省暑期学生集訓,即由我兼任訓育委员会主任委員,总队长是新五軍軍长鄧子举,副总队长是省国民軍訓主任委員陈春霖和教育厅长魯蕩平,实际上由陈春霖負責。这一期集訓学生約两千人左右,編为几个大队、十几个中队,各級队长都是由各学校及各县市的軍訓教官調充。訓育委員會的秘书干事、政治教官及各大中队的政治指導員,則都由复兴社分社遴調所屬干部以及各大专学校教授和中学校长教員中的复兴社分子分別充任。政治教育的課程很少,照例是三民主义、国内外政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及“領袖言行”等。主要重在“精神教育”,除經常由陈春霖和我集合全总队作些“复兴革命、复兴民族、发揚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之类的“精神講話”之外,还請刘峙、商震、方策、何浩若等軍政长官和各大专学校校长等到总队作些同样的講話。复兴社总社还組織了一批“名流学者”分別巡迴到省市集訓总队来作报告和講演,內容都很空洞,而每次学生听講,一站就得三四个小时,他們都最怕这种“精神講話”。据中队政治指導員报告,他們在背后称之为“蒸人講話”(因天气太热受不了),甚至还有罵之为“瘟神講話”的。政治訓育則是通过各大、中队的政治指導員去施行。他們和学生一起生活,每天在队伍早晚集合时,經常作些簡短的講話,并随时对学生进行个别談話和个别調查。他們每星期将学生的一般活动情况向訓育委員會彙报一次,遇有較突出的个别情况,則随时向訓育委員會报告,而这些学生也就成为他們进行工作的重点对象了。

一九三七年这一期的暑期学生集训正是“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主张之后，同时对日抗战已到了如箭在弦的紧急关头，全国人心愤激，学生的情绪更为激昂。在这个情况之下，“攘外必先安内”的那个老调子不能再弹了，因此不但在政治教育和“精神讲话”中已不得不避免公开的反共宣传，即在政治训育工作方面，也不能再以防制异党活动和侦查异党分子为唯一的重点了。但复兴社在学生中发展组织，却还是照样进行的。在学生编队的同时，训育委员会的复兴社临时支社即将各中队官佐和学生中原有的复兴社社员分别编成小组，由中队长或政治指导员任小组长，开始进行组织活动，主要是侦察学生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并吸收其中条件符合的分子入社。这一期被吸收入社的学生约共二百余人，履行了入社手续以后，即编入其所在中队的小组，开始参加小组活动。集训结束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分别转到所在学校的支社或小组；其无小组可转移的便作为分社的直属通讯社员。其他各省市学生集训的情况，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

关于少年儿童的军事教育和管训，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由戴季陶任会长，刘詠尧兼任主任秘书，负实际责任。复兴社通过童子军各级负责人和教练员中的复兴社分子，对少年儿童实施法西斯教育和军事管训。

此外，在军事方面还有交通警察机关和对陆海空交通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税警机关和部队，以及缉私机关和部队，也都是由特务处直接掌握的。

关于社会方面的法西斯统制，除复兴社本身各级组织所进行的一般活动外，主要便是特务处系统在全国各地所布置的特务行动网和康泽的别动队。其次是宪兵部队、警察机关及各省的保安

处，都是由复兴社組織通过其重要骨干分子和会社員分別掌握使用，对社会各阶层人民实行广泛的統制和殘酷的鎮压。

### 組織內部情况一斑

复兴社的組織原則是書記集权制。总会書記长直接由蔣介石任免，分会書記和区支会書記分別由总会和分会書記提請任免。干事会对于書記的一切决定并无最后否决权。下級对上級只能絕對服从，絕无要求变更任何决定或自作决定之余地。因此权力所在，書記职位便成为組織內部进行爭奪的焦点。一九三五年鄧悌任总会書記长时，因原兼湖北分会書記賀衷寒回南京任軍事委员会政訓处长，經鄧提出以我繼賀任。蔣介石批准还没有下来，我即奉命乘輪西上。一到汉口，邱开基（汉口区緝私处长，黄埔三期，云南人）就告訴我說：“丁柄权和阮齐他們听到你来湖北分会担任書記，都很不服，說你还只二十多岁，年紀太輕，又是六期学生，資历也浅，恐怕担任分会書記难以服众。他們联合了許多人电請总会另行簡选，也要求过我参加列名，我沒答应。現在总会已复电严詞申斥。他們碰了一鼻子灰，恐怕对你还未必肯服，你要注意。”丁柄权是黄埔一期，湖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阮齐是黄埔二期，湖北省国民軍事訓練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員，都是湖北人。从这件事看来，他們在湖北所拥有的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听了邱开基的話后，因年少气盛，决定要給他們一点顏色看看，以为报复。首先，当他們两人不得不来看我时，我即拒不接見；接着在召开首次干事会时，也不和他們打招呼，在會議中对他們的意見也表示不重視。按照慣例，每逢書記召集会社員講話的場合，要由主持会场的人于書記到場时喊立正口令并向書記报告人数；散会后書記离場时，又要喊立正口

令，全体肃立，等书记走后听到解散口令才能自由行动。我那次召集武汉的全体社员讲话，到场后既不请丁、阮等人上台，讲话后也不请他们接着讲，就逕自离场，而他们也只得同大家一样，在台下肃立，等候解散口令。这一来，可把他们平日的威风在社员面前完全扫下来了。可是他们对我这一副威严十足的书记架子，却也奈何不得。丁柄权在干事会的干事分工中是管组织的，他以为只要把组织权掌握在手，就不怕你书记集权。当我把许多会社员告发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刘汉清贪脏枉法的案件交他核办时，他就自作主张，故意袒护刘汉清，久延不办，屡催也不理。我便断然下令将刘汉清禁闭听候查办，改派田亚丹去接任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丁柄权也无可如何。（这个码头管理所是汉口市政府固定分给复兴社的一个小小地盘，主任及其下的人员，都是经由复兴社提出任免的。刘汉清是留俄学生，中共叛徒，其后曾任贵州省的财政厅长。）阮齐更是一个著名的奸险人物，却也迫于组织纪律和书记集权的威力，不敢有所谋为。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平日在湖北的专横把持的威风，也不得不收敛了些。

组织内部的经常工作，并不怎么紧张，甚至可以說，从基层小组到分会，都是显得松弛散漫，没有什么生气。基层小组会议，有许多并不按照规定每星期举行一次，表报也很简单潦草。分会除了无限制发展组织之外，便是照例进行一些形式主义的训练宣传以及对下级请示报告的批答处理，基本上跟衙门式的国民党党部并无多大区别。分会的主要力量都消耗在争权夺利的人事纠纷上，只有在这一点上是显得紧张热烈的。我这个分会书记真是够忙的，整天到晚要接见上百的会社员。他们为了工作的问题来汇报请示的很少，大半都是要求谋取这个或那个位置，或则是为了某些权利

冲突来控告其他会社員，要求支持处理，或則是要求我写介紹信替他們向各軍政机关要位置。諸如此类，实在应接不暇，而又非常难办。即在上层骨干中也是如此，如緝私处长邱开基和特务站长周伟龙为了互相爭权的糾紛，就一直鬧得全省全市皆知，传为談資。緝私处的权限很大，又拥有几个团的緝私部队，实力也不小，这当然是一个权大利大的肥缺。周伟龙看得眼紅，想要邱开基从他的緝私范围内註出一点权限給特务站(这事的具体内容和糾紛經過已記不清楚了)。因邱不答应，周伟龙便多方向邱攻击。邱原是在邓文仪所主持的南昌行營調查課那个特务系統的第二把交椅，又是直接見重于蔣介石的力行社社員和复兴社总社干事会的干事，虽然邓文仪已垮了台，他却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定地位，当然不肯向周低头。周則仗着戴笠的威势，認為非邱低头不可。两人互不退註，爭鬧不休。他們都是湖北分会干事会的干事，也就不断地向我互相控訴，对我用尽种种手段多方包围拉攏，想把我拉到其一边，以壮声势。我当时对組織内部这种情况也很忧虑，曾多次召集武汉的会社員及各地各单位組織的書記干事講話，大談其必須如何“发揚革命精神”和接受“領袖精神感召”的一套“大道理”，并提出“舍己为公、不計名利、坚苦卓絕、埋头实干”之类的一些信条来。他們虽肅然靜听，尤其在当我一提到“領袖”或“委員長”时，便都自动立正，比听到立正口令还更迅速更整齐（这是复兴社組織的一个最大特征，也是普遍推行到陆海空軍部队、軍訓学生及一切为复兴社所控制的組織中一个显著的法西斯标记），但听完以后还是依然如故，并无一点振奋气象。有些人因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滿足，对組織便更消极起来，不但小組會議老是請假，即对集合講話也借故規避，甚至有与組織日益疏远而无形中自动脫离了关系的。

組織對這種人也沒有辦法，只得置之不問。

從復興社內部這種一團糟的情況看來，本來就沒有什麼值得人們特別畏忌的地方。可是外間只要一聽到“復興社”這幾個字，大都談虎色變，即在一些高級軍政官員亦所不免。外間對復興社的恐怖，實際上却是害怕復興社的特務處系統。一般人以為復興社組織就是特務處系統，或以為特務處系統是在復興社指揮之下的。特務處的組織紀律較之復興社的一般組織嚴密得多，對所屬一切人員有掌握控制的絕對權力，它的所有各級人員又都是有職有薪的職業特務，人事管理很容易，也不容許有什麼糾紛，而對外却要殺人就殺人，要對付誰就對付誰，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談虎色變了。

復興社組織的存在及其活動，事實上早已成了半公開的秘密，而作為特務處系統的掩體，這本來也是當然的。但復興社作為一個一般性的組織，畢竟還有其進行迷惑羣眾的基本任務，一旦被入發覺它與特務處系統原來是一個東西，是專門實行暗殺的特務大本營，這樣一來，復興社想以所謂“復興革命、復興民族”那一套自以為冠冕堂皇的宣傳來迷惑羣眾的企圖，就不能不遇到極嚴重的障礙。河南的情況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間，河南分會書記是蕭洒（黃埔一期，河南人，省保安處副處長），陳祺為助理書記，特務站長是吳廣恕，他們的機關都是設在開封東華門兩個相通的大院內。蕭洒不大管事，分會的工作完全聽任陳祺胡作亂為，竟將分會機關變成了特務站的御用工具。陳祺和吳廣恕打成一片，無惡不作，無所不為。陳祺又將忠義救國會漫無限制地大肆發展，招攬了無數流氓地痞，使之成為特務站的獵犬。吳廣恕是個嗜殺成性的大劊子手，在開封及各地大肆搜捕革命愛國青年和進步人士，秘密押入東華門的特務

站机关，施行各种极残酷的刑訊。每至夜深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絕，聞之使人毛骨悚然。他还常在拂晓前将許多被害人装入麻袋，用卡車載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他手上，在东华門这个魔窟不知殘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这就不仅使一般人一听到“东华門”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即在复兴社的会社員中，也有不少人尤其是教育界的一些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員們，也都为之触目惊心，因而对組織起了怀疑，态度消极，想要退社。同时忠义救国会吸收的那些流氓地痞，又仗着特务站的威风，不但看戏进館子不买票付錢，并且公然販毒走私，抗拒检查，只要他們挺起胸部一拍說：“我是东华門的”，誰都不敢阻拦他們。这批恶棍簡直把河南变成了个盜匪橫行无忌的世界。不仅那些中下級的軍政机关不敢得罪他們，甚至他們还敢公然到專員公署和县政府去鬧事。萧洒、陈祺等又經常随便就为会社員写介紹信給各專員、县长要这要那，这些人就拿着介紹信到各專員公署和县政府強行坐索，非要不可，使得一些專員、县长們敢怒而不敢言，安身不了。复兴社在河南鬧得天怒人怨，风声传到了蔣介石耳边，CC 团也乘机向他打小报告，来打击复兴社。蔣介石也不得不表示震怒，要复兴社和特务处分別撤換萧洒和吳廣恕等人。特务处便改派刘艺舟任河南特务站长，并将其机关迁駐郑州；同时复兴社总社也就提出以我去任河南分会書記，負責整頓河南的組織。我到河南以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整頓，情况才改变了些。

### 复兴社和 CC 团的斗争

复兴社不但对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党派一律敌視，对国民党内和蔣介石系統的其他派系也同样敌視，即使对蔣介石直接掌



握的 CC 团和政学系,也是充满着明争暗斗的。复兴社是黄埔系的一个组织,实际上就是黄埔系,而黄埔系一贯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地位自居,而把 CC 团认作是蒋介石的“螟蛉子”,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对于政学系,他们认为不过是雇佣性质的一伙人,算不得什么,有些人在背后就称杨永泰为“杨师爷”,称张羣为“张总管”。但是黄埔系对政学系还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矛盾,只采取监视的态度,有时对于他们操纵得太过火也表示不满,但也不过在背后骂骂就算了。可是对于 CC 团这个蒋介石的“螟蛉子”,从“嫡子”的身份地位看来,自然必须坚决加以排斥。因此,复兴社对 CC 团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会社员一般对所谓“异党活动”的防制,倒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只有对 CC 团的明争暗斗,才是真正“劲头十足”,“斗志昂扬”,而且几乎都是自发的,组织领导还得加以适当的控制才行。蒋介石使用黄埔系,主要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则概不给与,在各省市也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而且还是逐步分给的。因此复兴社对 CC 团的斗争,主要也只在于争活动场所、争群众和争声势、争表现,还谈不上是政权的争夺。实在说,CC 团对复兴社的斗争是被动的,因为蒋介石划给复兴社的范围,CC 团绝对打不进,也未必想打进;而复兴社则硬要打进 CC 团的范围,这样,就迫使 CC 团不得不起而抵抗了。

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对 CC 团是有意逐步加以培植的,但初步划给他们的活动范围,则主要还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也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总体系的另一系统。可是黄埔系却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自己的天下,从而自然不能坐视 CC 团这个“螟蛉子”来分夺这份嫡传的家业;尽管“老头子”(指蒋介石)

石，黃埔學生在背後都稱蔣介石為“老頭子”)暫時沒有让这个“螟蛉子”去管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事，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能讓他們去獨霸。同時復興社在文化界和教育界也吸收了不少會社員，不能不替這些人找出路，從而也就必須在文化教育機關方面與CC團爭奪地盤，雙方便不能不經常發生磨擦。一九三三年我們在南昌成立了中國文化學會，CC團認為這是復興社的一個攻勢，就趕忙組織一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來抵制。一九三四年我到上海籌備成立文化學會上海分會時，陳立夫曾親到上海主持文化建設協會的發起人會，雙方都在大學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學者”中展開了爭奪戰。市長吳鐵城不得不兩面都參加，有些大學校長和教授也是兩面都參加了。但是文化學會的鑼鼓却打得更響，活動更積極，特別是文化學會擁有大批大專學校的學生為會員，比文化建設協會搞得熱鬧得多，聲勢竟超過了他們。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為此還受了陳立夫的嚴厲斥責。當時暨南大學的復興社分子與CC團分子也發生了一場爭奪學校實權的嚴重爭奪戰(事實經過已記不起了)，竟至發展到雙方都動起武來。學生中的復興社分子人數較多，勢力較大；特別是復興社所指派領導這個鬥爭的人又是黃埔學生，他將自己的力量進行了軍事編組，公然在學校按照作戰部署進行戰鬥行動，使得CC團分子抵擋不住，甚至被包圍封鎖得無法出校。吳醒亞(上海市社會局長，CC團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和潘公展急得沒有辦法，只得找復興社的負責人直接談判，而復興社的負責人又故意避不見面。他們給逼得實在無法可想，最後只得請吳鐵城出來轉圜，復興社的負責人才答應與吳、潘直接進行談判。吳鐵城約集雙方，連續談判了兩次，才息兵言和，當時我也是參加了這個談判的。復興社上海組織由于這次

爭奪戰的勝利，聲勢更壯，氣焰也更高起來，簡直把CC團不放在眼里，到處對他們找事生非，進行挑戰，使陳立夫恨之入骨。因此，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間鄧文儀因徹查南昌機場縱火案不實獲咎時，陳立夫便乘機向蔣介石控訴，說鄧文儀以中國文化學會名義大肆招搖撞騙，在文化界引起了許多不良影響。於是，蔣介石一方面撤銷了鄧文儀個人的一切職務，同時下令解散中國文化學會。在河南的情況也是一樣，復興社與CC團在各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所進行的爭奪活動，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即在小學方面也同樣不免。但CC團在河南的勢力非常微弱，簡直與復興社不能相比。在河南，所有各軍政機關方面的高級人員中大多數都是復興社的社員。如綏靖公署的各處處長，省政府的建設廳長張靜愚及商邱專員朱玖瑩、洛陽專員王澤民、新乡專員王尹西等，以及所有保安團長和各專區保安副司令，都是復興社的骨幹分子。各縣縣長中的社員也有半數以上。總之，河南省的實權，可說基本上掌握在復興社之手。即照例為CC團控制、由魯蕩平任廳長的教育廳，其主管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兩個主要科長王公度和簡貫三也都是復興社的骨幹分子，復興社在教育廳的小組人數最多。河南大學的醫學院長閻仲彝和法學院長及許多教授都是復興社的社員，在學生中人數更多，有一個很龐大的支社。此外，全省的中小學校長也幾乎半數都是復興社的社員，文化教育界以外的其他各方面就更不必說了。CC團在河南實際上只占有一個空空洞洞的國民黨省黨部以及等於虛設的各县县黨部，他們在文化教育機關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都是渺乎其小的，根本不是復興社的對手。可是，儘管如此，復興社却還是要向他們進攻，一點也不放鬆，即對他們所掌握的一個完全沒有什麼重要作用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也硬要從他們手

中夺了过来作为自己的活动场所。凡为CC团分子所掌握的学校，便一定不免要发生争夺，而结果CC团总是很少能获得胜利的。

复兴社与CC团在其他各省市各个方面的角斗情况，强弱胜负各有不同，也有许多地方是CC团占优势，但凡是CC团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就要跟着伸手去进行争夺。

### 所謂“十三太保”

外間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組織而其后又始終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出是那十三个人。有人說这十三人是刘健羣、賀衷寒、潘佑強、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葛武槩、梁干乔、萧贊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說曾扩情、鄧梯也在內；还有人說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十三太保”总不外是这么些人，却是事实。其中滕杰、賀衷寒、刘健羣、鄧梯、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繼任过書記长，刘健羣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輔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輪任过总务、組織、訓練、宣传、軍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則始終固定任特务处长。其中也有些人任过省市分会書記。

复兴社的真正台柱，还是賀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这四个人。关于这四个真正台柱，将在后面分別介紹，現在先交待一下其他一些“太保”。

刘健羣因不是黃埔学生，在这个組織中只能算是一个“螟蛉子”。他不可能受到蔣介石的真正信任，也不可能受到黃埔学生的真正信賴，更不可能取得以黃埔学生为骨干的各級組織和羣众的

信仰，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是黄埔学生。他没有获得过掌握实权实力的职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即在他两度任书记长期间，“书记集权制”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作用，因为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他很会说，也很会活动，自以为有一套，也确实不是无能之徒。他也很象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过一场，但这却只能表明他不过是这组织中一个插科打诨的重要丑角，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黄埔学生对一切非黄埔出身的人都视为异己分子或雇佣性质的人，而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即如自称是黄埔四期学生的蒋坚忍，以蒋介石的同乡同宗而特受知遇，历任至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职位，而且对复兴社非常热心，但也因其姓名不见于黄埔四期同学录，便被认为是冒充黄埔学生而受到排斥，在组织中始终钻不进领导层来。刘健群所具有的条件，还远不如蒋坚忍，自然也就更无所为了。

至于酆梯，是黄埔学生中较有才能的特出人物之一，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他的个性乖僻，以特立独行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他也就被孤立起来而在组织领导层受到排挤，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其次是曾扩情和萧赞育。这两人都在黄埔学生中颇有资望，但都没有什么特出才能，在组织中只能起点药引子的作用。萧赞育还有点个性，算是一味生薑，曾扩情则无可无不可，只能算一味甘草。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教啥就啥，有奶便是娘，不过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潘佐强和葛武桀是一对活宝，同样乖僻暴戾，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其本来的奴才面目。并且这两人的外貌，也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和戏台上的蒋干或汤老爷差不多，面目可憎，令人噁心，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睬理他们，在组织

中便更成了两个“狗不理”。滕杰、周复和杜心如这三人，又是一个类型。他们都装得温文尔雅、克己奉公、埋头实干的样子，倒象是“贤良方正”一类人物，而其实则可一言以蔽之，同样也只是戏台上某些“副末”之类的角色。

郑介民和梁干乔这两个人，蒋介石对他们都有戒心，不予重用，只让他们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居于不上不下的地位，掌若有若无之权，使得他们不可能有所施展。因此，郑介民只得投靠戴笠。但郑后来终于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替蒋起着监视戴笠的作用。梁干乔托身于胡宗南，终至郁郁而死。至于胡宗南因为他并不参加组织的实际活动，而自居为幕后人物，又当别论（后面还要有所介绍）。

从以上所有这些人的情况看来，他们之于复兴社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虽然他们对复兴社的组织活动还不能说是全无作用，但都远不能与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这四人相提并论。

贺衷寒原先曾参加过C.Y.，后来叛变。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而在他看来，这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象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一九二七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总队长，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

可是蔣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駕馭，偏不許他插足到部隊中去，而只要他搞政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贛勦匪总司令部”的“勦匪宣传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訓处长、訓練总监部国民軍事教育处长、軍事委员会政訓处长等职务，成了法西斯政訓系統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資本，儼然以黃埔系的政治領袖自居。他最初和陈誠深相結納，互相标榜，私許陈誠为未来的軍事領袖。可是陈誠越爬越高，对他竟日益疏远，甚至不再把他放在眼中了。他只得又与胡宗南相互表示推重，一个以黃埔系的軍事領袖自居，一个以黃埔系的政治領袖自許。他对于黃埔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將領，則以政治指導者和老大哥的身份，用各种方式方法因人制宜地普遍进行結納，借以巩固其自封为黃埔系政治領袖的聲望和地位。他对于复兴社組織，同样自居于第一把交椅，不但对刘健羣視如无物，即对所有其余那些“太保”們，也一律視为應該听話的小兄弟。他以为胡宗南既管軍隊，他就該管复兴社，这是“当仁不讓”的事。他和蕭贊育、邓文儀、刘詠尧、袁守謙、張鎮（宪兵司令）的关系特別密切，潘佑強、杜心如也对他們很靠攏。这些人都是湖南人，而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与这些湖南人也很亲近。因此，实际上便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湖南派”的小集团。这个“湖南派”以賀衷寒为当然首領，蕭贊育也被推居于第二把交椅，势力实在不小。（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絕大多数都是留俄或留日的，蕭贊育曾留俄又留日，他的关系就更重要。）

按照常情來說，象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小集团，在复兴社的領導层，就理应居于操縱把持的垄断地位，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了。无奈复兴社是蔣介石亲自直接掌握的，鄧悌、康泽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于蔣介石的，特別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握有各成独立系

統的實權實力，這就使得賀衷寒無法實現其把持操縱的野心。并且蔣介石早已看透了賀衷寒的個人野心，因而僅給他在復興社組織任過一次書記長。不仅如此，即對其他的人，蔣介石也同樣不放心，所以書記長這個位置總是不時換人，很少有任滿一年以上的。賀既然無法跳出蔣的手心，他便集中全力搞他的政訓系統，積極搞反共的政治特務活動。同時他又以復興社和黃埔系的唯一理論家自居，不斷撰文，到處演講，並利用他主辦的《掃蕩報》和《前途》月刊大肆進行法西斯反共宣傳，以圖一面向蔣介石表功，一面擴大他的力量 and 個人聲望，作為向蔣介石要挾的資本。蔣對於這個反共急先鋒的種種表現，還表示滿意，因為這正是他所要利用賀衷寒的所在。蔣的算盤沒有錯，賀自己的打算也是打對了的。由於他擁有幾萬政工人員的這個力量和宣傳影響，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封建法西斯理論，也就在復興社和整個黃埔系以至一切反動勢力中，居然樹立了一定的聲望和威信，被認為是復興社和黃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而與胡宗南并駕齊驅。在復興社的头目之中他的發言和一切行動表示，都終始是居于權威地位的。因此，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復興社和黃埔系內部人心惶惶，象一羣熱鍋上的螞蟥時，他便成了活動中心人物。他與何應欽秘密勾結，發動黃埔系將領聯名通電“討逆”，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和襲炸西安。他以為如蔣萬一得釋，他便有發動“勤王”之功；如蔣一死，則又成為拥戴何應欽繼位的元勳。這是他的如意算盤和真正目的。不料蔣竟然得釋，何以竊篡嫌疑，險遭不測，而他也便以居心叵測獲咎，大受冷落，從此一蹶不振，與何應欽同樣成為僅有虛位的幕外人物了。一九四〇年後，他曾被棄置閑居了兩年，到一九四二年才被任為無足輕重的社會部勞動局局長，置之於谷正



網之下。

賀衷寒落到这个下場，固由于蔣介石的阴狠猜忌，而戴笠的告密和傾陷，也更是其主要的禍由。一九四一年我自西北調回重慶，也因投閑置散，无所事事，与賀衷寒往还較多。記得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李子坝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騷，痛罵蔣介石昏暴。賀衷寒大約也有点醉了，竟也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他說：“你那里知道，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他的統馭术的絕頂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軍隊、特务和財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弟兄；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无所顧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連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說，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他对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象复兴社这样的組織，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絕對的独裁領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組織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会发展到一旦难于駕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組織的高級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罵他昏！可見你还是年輕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他的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可見他对蔣也正和蔣之对他一样，是看透了。但是，尽管如此，賀衷寒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

和維護反動統治階級利益上，是與蔣完全一致的。正因為這樣，蔣雖疑忌他，也還是用他；他雖怨恨蔣，也還是服從蔣。從他在蔣介石的整個法西斯運動和在復興社這個組織中所起的極端反動作用來看，他實在是黃埔系和復興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反共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甚至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的地步。他對於擁蔣和反共，一直都象發瘋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亂蹦亂跳，卻又張口結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的文章和講演，都只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糟的口號，簡直使人無法懂得他到底是說的些什麼。但是他無休無止的活動，亂沖亂撞的勁頭，却是他的最大特點。他滿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這兩句話倒也的確是他自己的真實寫照。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他從蘇聯回國，即與賀衷寒、蕭贊育等向蔣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張，蔣因而派他到黃埔軍校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後的黃埔軍校“清黨”期間，他是“清黨”的積極主謀者和執行者之一。其後他即任蔣的侍從秘書，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是非浙江籍的黃埔學生中侍從歷時最久也最被親信的一人。雖然蔣喜怒無常，時而揮之使去，又時而呼之使來，他却總是搖着尾巴，毫無怨色怨言，還老是厚顏無恥地向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因此蔣對他倒也不象對賀衷寒那樣的有所疑忌，而對他親信的程度几如其對浙江籍的其他侍從一樣。

一九三〇年他利用侍從秘書的地位，在黃埔學生中糾資創辦了拔提書店，並親自主持，專門發行蔣介石言論集和他自己所編的為蔣個人作宣傳的什麼“領袖言行”以及他與黃杰等所寫的幾本蔣介石傳記之類的東西，此外便是什麼《勦匪手冊》、《勦匪主要文獻》

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之谋利敛财。这笔收入很不小，有一半入了他的私囊。同时他还收罗了留俄学生中一些中共叛党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汪开文、陆梦衣等人，着手研究和准备进行反共间谍组织，并由王新衡、陆梦衣译述了几本关于“格柏乌”、“切卡”之类的书，以耸动视听，并为其组织反共间谍活动的借口。一九三二年初，他的献策和计划经蒋介石批准，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三科”名称出现的谍报机构，而以南昌行营的调查课为总机关。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进行反共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并在各“剿共”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在地进行搜捕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特务活动，同时还对“剿共”部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这些特务机构的血腥罪恶活动，曾经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广泛的恐怖气氛。这是复兴社的又一特务机构，到了一九三四年邓文仪被撤免一切职务后，便归并统一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一九三三年他还向蒋介石建议在南昌行营内设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罗致了一些留学德、日、美等国的所谓博士硕士之类的反动文人政客为设计委员，协助策划进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这批人之中，不少是复兴社分子，也有后来参加复兴社的。他们企图逐步渗透到杨永泰和熊式辉把持的政治垄断圈里去，以扩大复兴社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可是杨、熊对这些人并不重视，其后这些设计委员也就被分别遣散了，但也有些人如蒋志澄、李毓九等凭借这种关系而在各省当了厅长的。

邓文仪虽然自己写不通一篇文章，也说不清任何一个什么道

理，較之刘健羣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可是他却居然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許。他曾对我說：“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萊只有雨农(戴笠的別号)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們大家都可以作的，我們組織里就正少一个戈培尔。”因此，他不但到处找机会講演，老是东扯西拉、长篇大論地不断大量写文章硬交給复兴社的各种报刊发表，自己还印了不少小册子四处散发，又办书店、办出版社、通訊社和办报办杂志，甚至居然主持文化学会而搞起文化运动来。一九三四年他被撤免一切公开职务后，随即被派任复兴社助理書記，到一九三六年又被派任書記长。在他任助理書記的期間，書記长虽屢經更換，而他这个助理書記，却一直在“勤慎从公”，成了組織的看家人，并且能“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在調解內部糾紛方面出了不少力量，因此才得被任为書記长。“西安事变”后，他也同样以有貳心之嫌見疏于蔣介石，不再被重用。抗日战争后，仅得任軍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訓練团第一团的政治部主任，后調任成都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才得任国防部新聞局(即复兴社政訓系統的后身)局长，又恢复了他进行反共特务活动的老本行。他曾在任蔣介石的侍从秘书期間，凭借这个近侍的地位，对黄埔系的將領广行結納，在黄埔系中也頗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对复兴社組織的一个“承肩官”，負有上承下达之責(他被撤后，由萧贊育接替)，因而在复兴社的領導层中不能不特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权威。

至于康泽和戴笠这两个人，真可以称作两个活生生的法西斯特务典型；可以說，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沒有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蔣介石，他們也是不会变成第二个样子的。康泽曾当过蔣介石的侍从副官，因而特受蔣介石的信任。在复兴社組織成立之初，他主办

《中国日报》，負責文化宣传的时候，即已突出表现其热中于法西斯特务活动的特性。其后他在星子主办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培养特务骨干，同时組織“別动队”，在进行“剿共”軍事的前方和后方广大地区，大肆活动，对人民所施鎮压和屠杀之殘酷慘毒，与戴笠的特务处系統互为表里而有过之无不及，特別是在江西、湖北及四川为尤甚。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任复兴社書記长，还大量布置他的爪牙于各省市分会，并更換了許多分会書記。到复兴社解散归并于三青团后，他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組織处处长，还繼續进行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活动。一九四一年他和我同在重庆浮图关分別主持中央訓練团的青年干部和兵役干部这两个訓練班时，他还对我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还远不如复兴社时代的有活力，可見秘密組織要比公开組織有力量，更能发挥作用些。如果复兴社当时不改成三青团或不归并过来，現在的情况一定要好得多。对付共产党必得使用特殊的組織力量，因为共产党非一般性的政党組織可比。”从这段話里，可見他如何念念不忘于他那个充滿血腥气的別动队了。

远在一九三〇年，戴笠即自动以搞特务为专业了。据毛庆祥（蔣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和我談，最初戴笠經常亲自跑腿，自动搞些情报，送到他那里請求轉呈于蔣介石，每隔两三天就亲自送一次，每次都从后門送到廚房交給廚師或勤务兵，也不問有没有什么反应。毛庆祥起初并未加以注意，也就懶得为其轉呈，后来看到那些情报中有些也还有点意思，便开始轉呈給蔣介石看。蔣看了几次，便交給戴一点錢作活动費。从此以后，戴便开始雇人进行活动，情报也就多了起来，内容也更充实了些。蔣看了很滿意，便亲自召見表示嘉勉，并按月发給較大数量的活动費。戴便进一步組織起秘密

机构,大肆活动起来,并直接向蔣报告请示了。到一九三二年春天复兴社組織成立时,戴便成了当然的特务处处长,因为他的特务机构早就存在,已有了相当基础,并且久已为蔣所直接使用的了。其后直到他死为止,他搞了十五年的特务活动,他身上殘害人民的所有的罪案和血債,实已无法估計。

最后,还必须介紹一下胡宗南这个人,胡宗南在复兴社組織中沒有負实际責任,并且从不輕易与人談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象他是并不热中于任何政治活动似的。其实他正是一个有极大政治野心、极热中于政治活动的人。早在一九三〇年,他駐防开封时,即与冷欣、萧洒、馬志超、陈質平、王天木等,秘密組織过所謂“三民主义大俠团”,这是在“西安事变”时萧洒向我說的。我和胡宗南直到一九三六年才相識于开封。当时他任第一軍軍长,駐防徐州,某次因事过开封,特來訪我,談得很投机,大有相見恨晚之概。不久我去南京,事先并未通知他,他竟于我車过徐州时,亲到車站接我下車,強留我在他的軍部住了一天,又談得很欢洽,从此便交往漸密。在屢次深談中,我才发觉他有意圖取中原作为基地,并有意于謀取統制复兴社整个組織,他的野心是正不下于蔣介石的。他在黃埔系將領中,由于受到蔣的特意培植,由第一師長而第一軍長,升擢总在入前,部隊編制也特別大,軍餉特別多,而保舉人員又无不照准(蔣介石对各部隊團長以上軍官都必直接遴派或核委,仅胡宗南、陈誠和湯恩伯得自行遴選保舉軍師長)。因此,他的實力日增,聲望日隆,成为黃埔軍人中无人可与并肩的第一位紅人,他也隱然以黃埔系的天字第一号人物自居。同时,因为蔣介石特別把他提名为复兴社領導骨干之一,大家以为蔣必有其特殊用意所在,所以都对他特別表示尊重,凡有大事,无不征求他的意見,他的然否

往往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因此，他便也隱然以复兴社組織的幕后人自居。黄埔学生一般都自命为蔣介石的嫡子，而胡宗南則更以“太子”自許。一九三九年他和我在西安有一次縱論历史人物，他故意特別推崇李靖而以之許我，最后却說：“李卫公提三尺劍周游天下，意在謀隋而代之，但他自見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而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爭。今天你却如何？”弦外之音，他竟然以李世民自况。他于一九三七年即奉令率軍入陝，駐屯西北历十二年之久，統兵至五六十萬，控制陝、甘、寧、青各省，成为实际上的西北最高統治者，被称为“西北王”。而其唯一的任务与企图，就是包围封鎖陝甘寧边区这个革命根据地和鎮压西北各省的人民起义。他除了強征民工圍繞陝甘寧边区筑成一道綿延數千里、縱橫层疊的防禦工事并以庞大兵力构成一道严密的封鎖綫外，还对邻近边区地帶的居民实行严酷的軍事管制和堅壁清野等种种殘暴措施。他还在陝、甘、寧、青全面施行联保連坐以及在“勦共”省份所采取的种种法西斯統治法令。凡复兴社在西北各省的地方組織和軍隊、政訓、国民軍訓各个系統，都直接控制在他掌握之下而唯命是从，一任其驅使利用；即便是絕對独立的戴笠特务系統，其派駐在西北各省的机构，也同样不能不听从他的指揮。所有复兴社内外系統在西北进行的种种法西斯特务活动，在其直接发縱指使之下，較之其他各省尤为猖獗。胡宗南的封建統治思想极其強烈，他的全部言行都貫串着封建統治这一条黑綫。他在复兴社这个封建法西斯組織中，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发蹤指使的幕后人物，实际上成为所有那些“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

### 复兴社被解散以后的名亡实存

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被迫承认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这就不得不宣布将这个专门以进行反共特务活动为唯一任务的复兴社法西斯秘密组织解散，而并入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于是复兴社整个组织则变成了三青团，复兴社的会社员中除了极少数人从此脱离了组织关系，并未转入三青团去的以外（我即是其中之一），绝大多数一律变成三青团员。原有各省市分社也一律改成了三青团支团部，并立即都挂上了这块新招牌。原任书记也都一律成了三青团支团干事长。复兴社总社的全体干事、监事及其他一些高级骨干分子，都成为三青团的筹备委员和三青团成立以后的中央干事、监事。康泽则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处长，掌握组织实权。三青团虽说基本上是由CC团和复兴社合并而成的，实际上却只能算是复兴社组织的后身，也就仍然是为黄埔系操纵运用的一个政治工具。因此，复兴社在并入三青团以后，只是改了一个名称，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而且比以前更变本加厉地进行公开的恐怖活动了。其原有之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也完全原封不动地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更成为有着一块堂堂皇皇的公开招牌作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关于军事谍报部分则划入国防部，称为第二厅。到抗战结束后，“军统”又改为“保密局”，当然也还是一个东西。原有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这个政工特务系统，则改隶于政治部，称为第一厅，仍由贺衷寒任厅长，其原有的整个系统和全班人马也同样完全原封未动；抗战结束后又改为国防部新闻局，由邓文仪任局长。原有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这个军训特务系统，则并入政治部第二厅，其各省市的国民军训委员会，一律改并于各省军管区



司令部为軍訓处,也都是全班人馬照旧。其他一切有关部門,也都同样只是改換个名称,实际上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原有的机构和人員,仍然照常进行原有的活动,絲毫未改,也沒有一天停頓过。因此,复兴社組織在宣布解散以后,在形式上是虽然分解了,但由于各个系統依然由原有的复兴社骨干分子分別掌握,仍然集中于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从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

## 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見聞

祝 世 康

### 一、蔣介石与叶琢堂的关系

凡是熟悉蔣介石历史的人，誰都知道他同浙江財閥虞洽卿关系密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同另一个浙江財閥叶琢堂的关系比虞洽卿更为密切，对他的影响更大。

叶琢堂又名叶瑜，浙江奉化人。据说，他早年到了上海以后，取得一个周姓富翁的信任，經管财产。周姓临終前，因儿子尚在襁褓，写了一张遺囑将全部遺產交叶代管。叶就侵蝕一大半，同时还利用这笔橫財作为保証金，充当瑞和洋行买办和交易所的經紀人，后来又勾結法国流氓创办万国儲蓄会，大賺其錢。因此，叶琢堂的名声虽不象虞洽卿那么大，却腰纏万貫，比虞殷实得多。远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就把财产换成外汇，存在外国銀行。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却装得簡單朴素。他最初住在外白渡桥北面的洪德里，是一幢小屋子；后来迁到南昌路陝西路口，也并不豪华闊綽，仅是一幢小洋房。他平时头上戴着一顶搭拉着边沿的銅盆帽，身上穿一件陈旧变色的旧大褂，經常堆着一臉虛伪笑容，嘴里用英語“哈囉，哈囉”地向人打招呼。看他一副癩三样子，如果不知他的底細，誰都想不到他是发了几千万橫財的一个浙江財閥。

叶琢堂不仅是蔣介石的奉化同乡，蔣在上海交易所里跑进跑

出，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蔣在交易所里失敗时，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常常向叶琢堂告貸。每当交易所散場后，总可在叶家看到蔣。叶同朋友打牌时，蔣老是毕恭毕敬地站在背后，有时还替叶端茶拿烟，侍候客人。叶也以对待学徒的态度对蔣，使喚蔣时就叫“阿瑞”（蔣的乳名）。蔣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时，叶还贈送了三百元旅費。由于蔣叶有这一段历史，蔣就把叶看成一个生死患难的恩人。后来蔣背叛革命，对人民实行血腥統治，还与叶密切往还；只要叶有所要求，一切都唯命是从。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回到上海时，叶琢堂同虞洽卿曾向他献計走帝国主义的門路。这年九月，蔣到日本去向日本帝国主义勾結献媚时，叶派了他的女婿李叔明随同前往<sup>①</sup>。李叔明曾向我說过，凡遇蔣介石咆哮如雷、大发脾气时，只要他的丈人一到，蔣的脸色顿时就会改变；不論叶讲什么話，蔣总是和顏悅色地順从。

蔣同叶的这种特殊关系，还可以用以下几件具体事实来作証明。

一九三六年秋天，当李叔明任中央儲蓄会經理时，我有一次同他談天，瞥見他案头有一张花旗銀行送来的外汇月結单，上面注明他所存的款子是美金，数目字多至六七个圈圈。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六个圈圈的美金就在一百万元以上，这是我生平所見到的最大的一笔美金帳。当时心里暗自忖度李叔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美金？是不是我眼花繚乱，一时看錯了呢？这个疑問一直未解决。有一天我为好奇心驅使，暗地里問李叔明手下一个姓郑的出納。他迟疑了一回，低声答道：“您还不知李先生来头大，他的錢多得很。

<sup>①</sup> 李叔明在那次跟着蔣介石到日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李叔明与笔者談及此事时，洋洋自得，显示蔣介石对他亲信，他对蔣介石有一番功績。

单单我一个人給他經手解送到花旗、汇丰等几家外国銀行的美金已有几百万元。你要知道他的丈人叶琢堂是蔣介石的恩人，叶琢堂的钱也是李叔明經營。此外，叶琢堂是中国农民銀行的總經理，外界傳說中国农民銀行是蔣介石的私人銀行。李叔明的来头这么大，你想他怎么会沒有这許多美金呢？”我听了他这一番話，才恍然大悟。后来叶琢堂死去，虽由政学系的顧翊羣一度任农民銀行總經理，但隔了不久，蔣就把顧調走，派李叔明接替。直到解放前夕，李叔明席卷了巨額美金，逃到美国去了。

在宋子文任財政部长时，曾向美国购买了許多軍火，派美国西点軍校出身的曾錫珪訓練稅警团。后来蔣介石发觉此事，认为宋子文有夺取政权的野心，便蓄意将他撤換，并征求叶琢堂的意见，要他接任財政部长。当时叶向蔣表示：“我只会經商，不会做官。”这才由孔祥熙作了財政部长。（这一段話也是李叔明亲口說的。）但叶在农民銀行總經理任內，又于一九三五年冬天兼任中央信託局局长。这个局长在名义上仿佛不象財政部长那么重要，而实际上蔣是通过这个局向帝国主义国家购办軍火，因此，非蔣的亲信决不能作局长。

从一九三五年底，政学系的吳鼎昌任經濟部长，声势烜赫，炙手可热。他利用职权和他所操縱的北四行（即与北洋軍閥和政学系官僚有关的金城、盐业、大陆和中南銀行），在紗布交易所买空卖空，大做其紗布投机。不料在一場掀风作浪的投机交易中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那就是孔祥熙的妻子宋藹齡。两人暗中各显神通，大斗其法。这场投机风波鬧了几个月，无法解决，后来宋藹齡在六月初赶到庐山，到蔣介石面前告发吳鼎昌。可是吳鼎昌是政学系的中坚人物，当然不甘示弱。他同詭計多端的張羣商量以

后,就向叶琢堂求救。叶虽非政学系分子,但作为一个浙江财阀,与北方财阀吴鼎昌是一邱之貉,对于吴的要求,一口答应,立刻带了李叔明上牯岭。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看见这场风波闹到蒋介石面前,也就赶到庐山去听候处理。在叶到达牯岭的第二天,蒋即以盛宴款待,听说在席间谈不到数分钟,这场风波便平息下去。吴鼎昌仍旧安然作经济部长,宋蔼龄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地位。这件事是一九三七年我在牯岭遇到叶琢堂、穆藕初和李叔明时,他们三人在谈话中流露出来的。

一九四〇年,叶琢堂患胃癌到美国去开刀,蒋介石要李叔明护送前往。叶到达纽约不久,即在医院病死。

## 二、操纵公债的“三不公司”

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掠夺人民财富,除了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以外,还经常以发行和操纵公债为手段来向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公债四十五种之多,总计法币三十九亿元;此外还有英金公债一百五十万镑。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发行内债十二种,共值法币六十八亿三千万元。抗日战争结束,政学系分子登台以后,更变本加厉,除了从恶性通货膨胀方面掠夺大量的人民财富之外,因当时反动统治信用扫地,人民不愿承购法币公债,便用美金做幌子来发行公债,欺骗人民。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发行的“三十六年短期库券”美金三亿元和美金公债美金一亿元。估计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时期,合并起来,国民党反动派在二十年的统治期间一共发行了五十九种内债,共计法币一百零七亿三千万元,美金六亿元,英金二千一百五十万镑和美金一亿单位。

国民党反动統治集团一面巧立名目,发行各种各样的公債,一面又操縱公債市場,凭借特权,肆无忌惮地进行投机倒把的勾当。一九三六年財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銀行副总裁陈行、国貨銀行董事长宋子良組織了一个秘密的投机公司在市場活动,同时由財政部放出整理公債的空气,揚言打算发行一种新公債来掉換各种旧公債,重新訂定利息,以免市場混乱等等。后来他們又向市場散播烟幕說:这次政府整理公債是因財政困难,对旧公債要停止付息。人民本来对国民党政府的公債不信任,市場中的小戶一听到这种傳說便着了慌,紛紛把手里的公債在市場拋售,使各种旧公債的价格在几天之内一落千丈。徐堪、陈行和宋子良却乘机大量吸收。隔了几天,他們又利用中央銀行的雄厚資力,压倒一切小戶,在市場上哄抬,使公債行情又重新暴涨,在短短的几天中弄得許許多多人傾家蕩产,甚至自杀。徐堪、陈行和宋子良耍了几次投机倒把的把戏,賺到三千多万元的暴利。

在那次公債投机的大风大浪中,不仅許多小戶破产,有些銀行錢庄也受到影响。后来市場上发觉这个秘密公司的内幕,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全上海的工商界都知道有一个“三不公司”。所謂“三不”,是指徐堪的“不堪”,陈行的“不行”,和宋子良的“不良”,用来表示对官僚資本的切齿痛恨。这个“三不公司”是以孔祥熙为后台,由徐堪主持其事。徐堪在公債大涨大跌的时候,常由南京赶到上海,在外滩十五号三楼陈行的办公室内,手里拿起桌上的对誚電話,不停地发号施令,兴风作浪。陈行在旁协助,参与机密;宋子良經常用電話向国貨銀行拨头寸。徐堪本来是宋子文做財政部长时的錢币司长,孔祥熙做了財政部长后,因他詭計多端,会想办法,把他升做次长。由于他用心险、手段辣,很多吃过他苦头的人都說:“此人不

堪。”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时，财政部虽公布限制銀行提存办法，徐堪却用几百万法币到汇丰銀行换取英鎊，向国外輸送。后来徐堪見政学系声势烜赫，又投靠了张羣，从而升为粮食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徐更利用职权套取巨額外汇，由粮食部用派員赴美国考察的名义派了总务司长楊錫志将他的几房家眷送往加拿大。徐堪本人也在解放前夕逃到加拿大去做白华了。

宋子良是孔祥熙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文与孔祥熙之間本来由于爭权夺利，存在着矛盾，宋子良却可以从中調停。因此，孔祥熙給他作国貨銀行的董事长，宋子文也安插他在建設銀公司作总經理。陈行同宋子文在圣約翰大学是亲密的同班同学。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勾結美帝在华的垄断資本集团，作了中华懋业銀行經理，并任中央銀行副总裁。他平时常常同美国顧問楊格勾勾搭搭，狼狽为奸。孔祥熙因他与徐堪串通一气，就让他参与投机倒把的秘密。

到了抗日战争結束，孔祥熙虽垮了台，繼任行政院长的是宋子文，接替財政部长的是政学系分子俞鴻鈞。“三不公司”投机倒把的法門也就由政学系承袭下来，由俞鴻鈞和刘攻芸等在上海市場散播烟幕，传出財政部将对战前統一公債“优惠还本”的消息，同时財政部对于这种謠传却故意保持緘默，不加否認。結果使一百元票面的統一公債两种涨到三百余元，到一九四六年四月曾达八千四百元的最高峯，即高出票面价值达八十余倍。到了六月初，由俞鴻鈞秘密組織的投机公司以六千元的价格拋出大量現貨。隔了不久，財政部宣布“按票面价值偿还战前公債”。这样一来，公債价格便一泻如注，使上海十几家做公債投机的証券字号关門大吉，宣告倒閉。另有一家銀行——大亚銀行从此歇业。据人估計，这次

公債風波影響很大，使公債持有人遭到一千五百億元巨大損失。參與這次投機的俞鴻鈞等却腰纏萬貫，滿載而歸。

### 三、張嘉璈同宋子文的鬥法

張嘉璈本來是北洋安福系政府中的一個封建官僚，對於趨炎附勢、營私舞弊的本領極為嫺熟。在曹汝霖因親日賣國在五四運動中被學生趕走以後，張嘉璈便經他的哥哥張君勱（國社黨頭子）的介紹，結識了梁啟超得其支持，以後作了十多年的中國銀行總經理。他平時身上穿的是和服，腳上着的是木屐，嘴裡滿口流利的日語，低首下心，卑躬屈膝，向日本主子獻媚。當安福系政府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借債時，張嘉璈就步曹汝霖的後塵，做掮客，賺回佣，成為一個親日派的中堅分子。由於日本壟斷資本集團的撐腰，他在中国財政金融界的地位，也就穩如泰山。

到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蔣介石所走的帝國主義路線，不象段祺瑞政府那樣單純，除了利用張羣和黃郛拉攏日本以外，還通過王正廷、宋子文、孔祥熙等買辦資產階級與英美暗送秋波。結果，儘管張羣與黃郛是蔣介石一刻不離的幕僚，言聽計從的智囊，可是第一任財政部長還是託舅子宋子文去當。宋子文嘴裡所講的，筆下所寫的乃至閱讀的書報都離不開英文，一副十足的洋奴派頭。他看見張嘉璈搖頭擺尾，講話吞吞吐吐，心裡就不開胃。加以兩人攬奪地位，便發生了磨擦。當時張嘉璈以老牌銀行家自命，並不買宋子文的賬，因而就成為宋的眼中釘。到了一九三四年，宋借口改組中國銀行，加入官股，將張嘉璈撤換，由宋自己接任董事長，宋漢章任總經理。中國銀行本來是張嘉璈政治活動的根據地，一旦失掉，弄得他痛哭流涕，寢不成寐。尤其是他耽心着亏空中國銀行的一



笔三十万元的宕賬，如果宋子文追查起来，一定搞得声名狼藉。

张嘉璈同张羣、黄郛密商以后，就打定了联孔倒宋的主意。张嘉璈通过郭秉文的拉攏，經常与孔祥熙密切来往。就連孔祥熙的亲信秘书李青选(山东博山人，又名李毓万)，张都千方百计地籠絡，常常送給他許多隆重的礼物。李青选便向孔祥熙进言：“中央銀行是銀行之銀行，任务煩重。张嘉璈是金融界巨子，在銀行界里的潛势力很大。他被宋子文挤出来以后，潦倒得很。您如果拉他一把，他一定会帮您很多忙。”(这几句話是李青选亲口向我說的。)当时孔祥熙点了头，表示同意。隔了几天，孔便在中央銀行的理事会上提出张嘉璈为副总裁。从此张嘉璈对孔祥熙亦步亦趋，百般逢迎。当中央信託局成立时，孔推张兼任局长，同时张推荐他的亲信刘攻芸任副局长。到一九三五年底，孔又在蔣介石面前推荐张为鐵道部长。张嘉璈听从黄郛、张羣的策划，心滿意足地作到了特任官。

到苏联把希特勒打垮以后，軸心国家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形势，张嘉璈便搖身一变，由亲日轉为亲美。他到美国去住了一年，勾結美国的壟断資本集团；回到重庆后，轉任交通部长。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快要結束时，孔因黄金案被政学系和CC系搞垮，蔣介石又叫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那时张嘉璈又碰到宋子文，冤家路窄，无法活动。正巧隔了不久，日本投降，张嘉璈便被派去接收东北。他在东北混水捞魚，掠夺了大量的人民財富，派他的弟弟张嘉鑄(又名张禹九)以植物油公司總經理的名义将东北大豆出口貿易壟断独占。张嘉璈单从这一笔出口貿易中就攫取了巨額外汇。一九四七年二月，宋子文被张羣搞垮，由张羣繼任行政院长，反动政权大部分落在政学系手里。张嘉璈对垂涎已久的中央銀行也就到手。他于三月二十六日发行了美金公債一亿元，美金庫券三亿元。事实

上这是张嘉璈布置的一套騙局,并没有絲毫美金作保証,不过在白紙上印了几个美金的数目字来騙取人民手里最后一点积蓄罢了。

张嘉璈登台以后,因走了亲美路綫,不仅敲骨吸髓搜刮人民財富,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除了张嘉璈垄断了东北的大豆以外,还把他的年青外甥沈熙瑞任为中央信託局局长,并調刘攻芸任中央銀行副总裁。

#### 四、轰动重庆的黄金舞弊案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发生了一件滿城风雨的黄金加价舞弊案。那时正值孔祥熙跟宋美龄一起到美国,他的財政部长和中央銀行总裁都由俞鴻鈞代理。在此案爆发后两个多月,孔祥熙回到重庆,适逢其会,成为众矢之的,参政会向他猛烈攻击,他便因此而垮台,由宋子女接替行政院长。政学系的俞鴻鈞因有张羣、吳鉄城、熊式輝为靠山,从此青云直上,官运亨通,一跃而为首要的官僚資本家,正式作了財政部长和中央銀行总裁。

C C系眼見政学系从孔祥熙手里搶去財政金融大权,这块肥肉落在人家手里,自己分不到脏物,便改变策略,反过来勾結孔祥熙。最后由孔将中国农民銀行註給C C系,由陈果夫接替董事长。

至于黄金案爭执的焦点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数十两黄金,案中牽涉到的也是一些名不見經传的小人物。官僚資本集团从所謂“黄金政策”中捞得腰纏万貫的首要分子却优哉游哉,置身事外。那时財政部采用这种“黄金政策”的目的,在名义上是出售黄金,收縮通貨。出售黄金的方式計分黄金期貨和黄金存款二种。在三月二十八日那天,由中国国貨銀行售出的黄金期貨三十余两,四行两局(即中央銀行、中国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国农民銀行;中央信託局和邮

政儲金匯業局)售出黃金存款三萬四千餘兩,其中重慶市占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兩,外埠占一萬餘兩。在重慶售出的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兩中,中央銀行占五千五百十四兩,交通銀行占六千二百五十九兩,中信局占四千九百九十四兩,中國銀行占二千一百八十六兩,農民銀行占一千六百五十五兩,郵政儲金匯業局占八百三十九兩。外埠在那天售出黃金的數字大致與平時相同。黃金的價格在那天晚上由財政部宣布由每兩二萬元加到三萬五千元,就在無形中將法幣的幣值貶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但外埠的行局却並未在事前得到加價的消息,因而出售黃金的數字無什麼變動。可是重慶的各行局因近水樓台,訊息靈通,事前得到財政部決議加價的消息,在二十八日那天黃金出售的數字上突然增加了一萬兩左右(二十六日售出一萬二千〇四十四兩,二十七日售出一萬〇八百十五兩)。這顯然是走漏消息,即內部主管舞弊的結果,從而構成了襄助一時的黃金加價舞弊案。

在這件舞弊案爆發以後,不論CC系的中央日報和政學系的大公報乃至其他大小報紙都紛紛轉載,成為全國萬目睽睽的重大案件。財政部不得不裝模作樣,會同四聯總處到經售黃金的各行局去查賬。最初有人主張將二十八日購存的黃金全部作廢,後來有人反對,認為購存黃金是一種商業契約行為,不能象封建時代的縣太爺問案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對罪人各打三十棍。因此,將黃金存款的單據一張張地加以審查,結果查出有二種舞弊嫌疑的存單;其一是轉賬申請書購存的,其二是以一張支票或本票化作幾個月名存儲的。用這種標準剔出來的存戶計有黃金一萬一千〇八十五兩。這個數目恰恰與二十八日那天突然增加的數目大致相符,這就有了蛛絲馬迹可尋。因為所謂轉賬申請書是各銀行在每天

下午三时票据交换后划拨头寸的工具，不准在参加交换的行庄以外流通，也不准作为购买货物或储蓄之用。个人使用轉賬申請書去买黄金儲蓄当然违法，应当予以取消。至于用一张巨額支票化作几个戶名的大戶，躲躲閃閃，显然另有蹊蹺。尤其是从这类大戶中查出有大业公司的李祖永等集中在中央銀行和中央信託局二家购买。当时財政部虽查出嫌疑戶名，仅仅退款了事，并不追究走漏消息的人。当时向法院提起公訴，糾纏在黄金舞弊案中的人却是一些渺小的人物。除了中央銀行业务局长郭景琨牽連辞职以外，案中的主角是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戴仁文，不过是一个中央信託局儲蓄处建儲科經办黄金儲蓄的主任。在三月二十日財政部宣布黄金加价以后，适值二十九日是黄花岗紀念日，不办手續，戴仁文利欲熏心，見有机可乘，在三十日早晨一到办公处，便向他的助手朱治廉詢問有无暫記存款，当时在賬上查出二十八日有一笔社会局存入的乡鎮公益儲蓄一百万元。戴仁文拿过传票用李子琦等七个戶名存了五十两黄金，囑咐朱治廉另外写一张新的传票，戴仁文自己动手造了表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在一轉瞬之間白白賺了七十五万元。

想不到黄金案鬧得很大，在財政部和四联总处查賬以后，監察院審計部也到中央信託局去查賬。不打老虎、只拍蒼蠅的監察院居然将戴仁文张冠李戴的毛病查出来，并且在朱治廉的抽屜內发现了一个小紙团，打开一看正是戴仁文改动过的传票。鉄証如山，事情就此败露。沒有靠山而妄想发财的戴仁文便做了官僚資本的替死鬼，被送进法院中去了。戴仁文和朱治廉在法院互相推諉，一审再审，糾纏在主犯和从犯問題上面。到了后来，法院开庭时竟不准旁听。此案鬧了几个月，对走漏加价消息的責任始終是一个謎。对化名购存三千三百两的大戶李祖永根本不去追查綫索，只以退

款取消了事。对事先知情并于二十八日参加抢购黄金的王紹斋也不追究责任。\* 因为那天李祖永一个人购存黄金三千三百两时,还有大业公司的經理张星联也购存了很多。而中央銀行业务局副局长张悦联就是张星联的弟弟。可是李祖永是一个大腹便便的軍火商,平时在汇丰銀行的存款数以亿計,同时他又是大业公司的大股东,多財善賈,經常与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的人“官商合作”;购买几千两黄金,在李祖永看来并不是希奇的事。至于王紹斋虽經法院一度传訊,但是他的来头也不小。他是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徒弟,財政部长俞鴻鈞的亲信秘书;在俞鴻鈞兼任中央信託局理事长时,他以理事长秘书的名义主持全局事务;財政部會議討論黄金加价时他也列席参加。法院看見这些人来头大,当然“刑不上大夫”,只可用秘密审讯方式来开脫,为官僚資本遮羞。

## 五、孔祥熙与通货膨胀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中滋生的官僚資产阶级騎在人民头上橫征暴斂,巧取豪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們最初还只利用苛捐杂稅和摊派公債的方法弥补財政赤字,到了后来因財政赤字愈来愈大,便从膨胀通貨上打主意。当孔祥熙任財政部长时,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宣布所謂“法币政策”,实質上就是沒收人民白銀的政策,为通货膨胀作好了准备。它的内容不外以下四点:(一)中央銀行、中国銀行、交通銀行三行发行的紙币,以后又加上中国农民銀行的紙币,作为“法币”在全国各地流通;(二)凡持有現貨者应向“国家”掉換这种法币;(三)法币的发行仍以白銀为准备

\* 編者按:本选輯第八輯戴立庵所撰《抗战后期重庆的黄金风潮》一文中謂王紹斋被法院判徒刑,与此說不同;两存待考。

金，但所謂准备金只是一句空話；（四）“法幣”的對外匯價，最初是與英鎊聯系，到抗日戰爭以後又與美元聯系。

這種“法幣政策”規定的本位，顯然是放棄銀本位而改用外匯作本位的一套把戲。在進行所謂幣制改革以前，孔祥熙曾與詭計多端的財政部次長徐堪密商多次，由徐堪獻計把白銀集中在自己的手裡，趁美國收大量白銀時送到美國去賣。當時孔因害怕英國與日本出來反對，又同英國大使賈德干商量邀請英國財政部顧問李滋羅斯(Laitz Ross)。李滋羅斯為了征求日本意見，曾繞道日本，然後訪問中國。孔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晚十一時發表“金融改革令”以前，還同賈德干和李滋羅斯會晤了一次。法幣的對外匯率規定為一先令兩便士半，與英鎊聯系起來，法幣對其他國家的匯率都是通過英國電匯匯價套算出來。這就說明法幣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是一種英匯本位制。孔在英王加冕時還率領了一批購買軍火的隨員到倫敦去活動，在英國訂購了許多軍火。在施行所謂“法幣政策”後，他們把中國人民數千年來血汗的結晶品——白銀，以每盎斯六角五分的价格輸送給美國。因此，法幣就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控制中國金融的一根繩子。

在法幣剛剛發行的時候，發行總額還不過十四億元，因而當時人民對它還有一定的信任。在抗日戰爭初期，孔祥熙還用發行救國公債和施行直接稅等手段來彌補財政收支。可是從一九三九年以後，財政赤字愈來愈大，新增的直接稅既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公債又因民窮財盡，發不出去，孔便利用中央銀行所控制的發行權，無止境地增加發行紙幣，在全國範圍內對廣大人民進行掠奪。因而從一九四〇年以後物價逐步上漲，造成通貨膨脹的局面。到了後來，物價變動的間隔愈來愈縮短，最初半年一次，繼而數月一次。物

价上涨本来就是币值下降，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工商界都乘机将商品囤积居奇，形成“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局面。对外汇率也就随着币值低落而急剧变动。最初由一先令二便士半跌至八便士，与法币的法定汇率相差六便士半。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虽与英国订立平准基金协定，企图把黑市价格稳定于八便士又四分之一，但中英双方提出的一千万英镑不到三个月已用完，无法维持。孔一再向英国求救，遭到拒绝后更捉襟见肘，到了六月初财政部不得不宣布暂停出售外汇。孔采用英汇本位制的纸老虎，从此戳穿，黑市汇率也就暴跌到六便士。到了一九四一年，孔的亲英路线改变了，开始依靠美帝。因为那时美帝利用购银政策的这张王牌，在国际市场上压倒了英帝。于是财政部宣布法币的汇率与美金联系，五元换一元美金。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发行了美金券的巨额大钞，同时规定法币对美汇的价格为二十元。这样，法币又显然成为美汇本位制。

可是由于不断增发法币，不管英汇本位制，或者美汇本位制，都阻止不了通货的膨胀。物价飞涨使法币的购买力一天天地降低，与法定汇率的距离愈来愈远。美帝人员在中国使用的美钞都不肯向中央银行照法定汇率兑换，而直接大量流入市场，在国内形成美钞的黑市买卖，成为投机的对象。到抗日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法币的发行额增加到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亿元。通货继续膨胀，即促使物价不断高涨。如以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六月为一〇〇，一九四五年九月即抗日战争结束时重庆二十二种基要商品躉售物价指数为一二二，六〇〇。可见在通货膨胀的后期，物价上涨比通货膨胀的速度更快。因为通货膨胀结果，游资趋向于商业与投机方面，工业生产反因资金短絀而萎缩，造成“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形势。孔

祥熙在一九四四年虽曾利用美軍墊款結算的五亿美元，发行了美金公債和美金儲蓄券，同时抛售黄金，收回了一部分的法币，把商品投机对象轉移到黄金方面，使物价比較穩定了一些。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出以后，囤积商品的投机商人着了慌，官僚資本家又忙着到上海等处去刮收，对商品投机失却了兴趣，因而物价回跌。例如布匹、百貨与顏料跌了百分之四十，五金、电料、油类、食糖跌百分之二十左右。凡可以囤积居奇的东西都跌得很多。至于黄金也由十七万元一两跌到十二万元。美鈔由三千元以上跌至一千八百元。这种暴跌使工业生产更加陷于停頓。那时孔虽因黄金案而垮台，可是广大人民羣众都因通貨膨脹，生活更加艰困。在官僚資本与全国人民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提到孔祥熙的名字，大家都感到痛定思痛。因为孔祥熙除了利用法币来搜刮人民手里的白銀以外，还利用紙币发行权的控制，对人民进行殘酷的掠夺。

## 六、政学系上台后的殘酷掠夺

一九四五年七月，俞鴻鈞接任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刘攻芸任“四联总处”秘书长和中央信託局局长。八月十三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不論黄金、美鈔和一般物价，都跌落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使法币的币值一度回升。俞鴻鈞和刘攻芸等政学系分子利用所掌握的財政金融大权，由重庆回到上海和南京，以“刮收”代替“接收”，大肆掠夺。另由张嘉璈到东北，孙越崎到北京。他們发了“国难財”以后，又发了一批“胜利財”。隔了短短的三个月，到今年年底，法币的发行額竟由原来的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五亿元突然增至八万二千余亿元。在这三个月期間，通貨不但沒有收縮，而且法币的发行总額差不多达到抗战八年中的四倍。政学系当权



以后,不但在通貨方面以天文学的数字来发行紙币,甚至掌握了許多垄断的企业,使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同时他們对淪陷区的敌伪产业,更穷兇极恶,大肆掠夺,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愈益走向飢餓的边沿。到了一九四七年二月,张嘉璈在东北敲骨吸髓地刮光了人民財富,更以“老牌銀行家”的姿态出現,作了中央銀行的总裁。他在登台以后拿出的“法宝”,便是在三月二十日发行美金公債一亿元和美金庫券三亿元,从人民手里騙取了最后一点美金。其他便是抄袭俞鴻鈞恶性通貨膨胀的老办法,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底,法币的发行总額竟突破了四百万亿元大关。到了八月十九日財政部公布所謂“币制改革”时,竟达到六百万亿元的发行总額。如以一九三七年的物价指数为一〇〇,上海基要商品躉售物价指数达到六,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之多,即涨到六百万倍以上,当时的五金器材竟涨到一千一百万倍。那时正当的工商业已极端凋敝,只有在投机买卖中出現一片日落西山的假繁荣,由抗日战争时的“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变成“囤不如金,金不如汇”,使广大劳动人民啼飢号寒,奄奄一息。

政学系到了这个穷途末路,便图穷匕見,孤注一擲,布置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騙局,即:用“币制改革”动人听聞的名詞,发行所謂“金圓券”来代替法币,規定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圓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圓券”一元。当时財政部长王云五(原任商务印书館总經理,后来参加了政学系,因而作了財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向众宣布,所有已发行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全部可以“金圓券”二亿元收回。在金圓券的发行办法中还規定每元含金量为純金 0.22217 公分,并規定凡持有黄金、白銀、銀币或外国币券者应于当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向中央銀行或委托的銀行兌換“金

圓券”。事實上，所謂“金圓券”只是在印刷廠中印上“金圓”兩個字，與黃金根本沒有絲毫關係，不過是用來欺騙人民，打算把人民手中所有的金、銀和外幣，乃至最後一點財富，一網打盡罷了。

政學系實行這個辦法的目的顯然是在反人民的內戰中作垂死的掙扎，因而在發行金圓券后仍繼續沿用法幣的膨脹辦法不斷增加發行。由於三百萬元法幣才折合金圓券一元，它膨脹的速度比法幣當然快得多。比起孔祥熙時期的通貨膨脹，更加顯得排山倒海之勢，使中國的通貨急速地奔向不可救藥的崩潰末路。在金圓券的發行辦法中雖規定發行額以二十億元為限，事實上隔了不到四個月，在那年十一月底，金圓券的發行額即達三十三億九千四百萬元，超過規定的限度將近一倍。到年底不過隔了一個月，又增加到八十三億二千萬元。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急劇增加到二百零八億二千二百萬元。隔了三個月，到四月份的發行總額又一躍而至五萬一千六百十二億四千萬萬元。截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時，金圓券的總發行數字達到八十萬億元。金圓券的貶值程度在不到十個月的期間內，竟超過法幣在十四年內貶值速度的一百倍。比起孔祥熙時期法幣的發行額由十四億元增至一萬六千五百六十億元（這還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前的發行總額），真是變本加厲，吮吸人民血汗的辦法愈來愈殘酷。貪婪無厭的張嘉璈在搜刮了巨額外匯以後，便逃之夭夭，中央銀行總裁由他一手提拔的劉攻芸接任。現在回憶起來，舊中國的通貨，雖從孔祥熙時期開始膨脹，但惡性通貨膨脹卻由政學系分子俞鴻鈞、張嘉璈和王雲五三個官僚資本家一手造成。從而說明，在四大家族之外，政學系也是一個重要的官僚資本集團，掠奪了不少人民的財富。

（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史料辦公室供稿）  
上海市文史館

## 短稿十篇

### 徐錫麟槍杀恩銘見聞回憶

王 迈 常

徐錫麟字伯蓀，紹興人，以試用道需次安徽，短小精悍，言不妄发，顧眉目清秀，善气迎人，喜結交，非崖岸自高者（其时安徽省候補道姓徐者有二，伯蓀之外有徐幼农，名元英，吳兴人）。余原随沈寐叟师在南昌，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之秋，寐师任安徽提学使，余亦来皖。寐师以安徽学务公所图书課課长一职囑余承乏。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春，浙人之官于安徽者創立浙江旅皖公学，公推伯蓀为校长，余因公学事数数与伯蓀商談。余对于校事有所貢獻或推荐教員，伯蓀未尝不欣然接受焉。惜乎納交未及半年，而伯蓀大去矣。

恩銘字新甫，旗籍，数十年順流平进，撫皖时年事已高，嗜好亦深，以是怠于治理，顧尚少誤事，对于伯蓀极其信任，故畀以警察学堂总办之要差，尝呼之为小徐而不名，蓋別于徐幼农之大徐也。

是年（一九〇六年）四月，警察学堂有甲乙两班学生同时毕业，伯蓀定期呈請撫台并束邀藩、学、臬三司及安庐滁和道蒞堂检閱，发給毕业文凭，昭郑重也。恩銘年老多病，屢屢愆期；延至五月間已不能再延，恩銘始决計于某日亲自来堂发給文凭。是为五月何日，

已記憶不清，惟確記為星期日。學務公所會計課副課長錢佩弢前往觀禮。佩弢衣冠濟楚，乘藍呢肩輿從容而去，去時余凭閣下瞰而目送之。公所後門臨街，隔街十余步，余寓在焉。圖書課即在樓上，余朝夕往來，極為便利。是日所中無公事，十一時左右余方擬回寓午餐，正在樓上走廊徘徊之際，忽見佩弢衣冠不整，氣色灰敗，從後門急奔而入，似未嘗乘輿者。余揣知必有大故驟發，急下樓至會計課尋佩弢。佩弢神色稍定，為余言之如下：

佩弢之言曰：“余至學堂，為時尚早，嗣後各長官陸續來，撫台最後到，均坐于台堂之正廳。前設公案，恩撫台中坐，左首為馮藩台，右首為沈學台，馮藩台之左為臬台，沈學台之右為安廬滌和道，再右是本堂徐總辦坐位。是日徐總辦着黑色制服，往來招待，似甚忙碌。少頃，開始点名發給文憑矣。甲班畢業生手執文憑，齊齊后退，訖乙班上前受憑。正一退一進之際，忽聞廳上槍聲驟發兩响。即有人云撫台身受槍傷者。大家奔逃出門，一闕而散，究竟如何，不得而知。”語畢氣喘，蓋余恐猶未已也。余急往學使署告以此事，并遣人急往學堂尋覓學台踪跡。少頃偵者歸，知撫台身受重傷，似已無救，已昇歸撫台衙門矣。又得消息，知徐錫麟槍傷恩撫台後即率其密友陳伯平、馬某某奔赴軍械局有所舉動，現在已奉當道命令發兵圍困軍械局矣。又未幾，有人來告，知徐等已牽赴撫轅矣。傍晚得確息，知伯蓀已從容就義矣。哀哉伯蓀，以有用之身而與尸居余氣之恩銘性命相搏，真不值得，哀哉伯蓀！余今日寫此一篇，事隔五十多年，尚為之黯然泫然，況當日目覩其種種者乎！此外尚有必須記載者一一筆之如下。

先是，兩江總督端午橋（方）密函恩銘，內附革命黨人名单一紙，囑其一体緝拿。恩銘以為小徐方能助我一臂之力，于是召伯蓀而切

託之。殊不知伯蓀密友陳伯平、馬某某兩人之名赫然在上，恩銘不知也。伯蓀以為此是取瑟而歌之意，疑慮叢生，而禍機不可遏抑矣。

當發給文憑之前夕，伯蓀手寫一函，交學堂庶務員顧某囑其急送駐紮城外炮隊營之熊成基管帶，蓋有所聯絡也。次日事發，而城外寂然，伯蓀知外援已絕，詢之顧庶務，方知此函忘未送去，猶在顧某身上。伯蓀恨極，又一槍而顧某傾倒矣。伯蓀在軍械局負嵎數小時，與陳、馬兩人手槍彈盡，從容被執。有人問：“恩撫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蓀說：“恩待我是私交，我對他是公義，私交何得勝過公義？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伯蓀以排滿為職志也。

當恩銘受傷傾倒時，事起倉卒，咸以為槍自外來，堂上諸公紛紛向內室躲避。沈學使走至後邊廊下遇見伯蓀匆匆出外，告以撫台受傷，急須查拿凶手。伯蓀揮之以手曰：“不關你的事。”沈學使似有所悟。其時另有一人引沈公向外走，走至學堂大門左近，知恩撫台尚困臥號房，呻吟未絕。亟入內看視，見恩銘血污滿身，臥一小榻上。恩銘一見沈公，只說得“徐錫麟”三字，目已瞑矣。

（政協浙江省委員會秘書處供稿）

## 浙路收歸國有的內幕

許 炳 堃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那拉氏以建築滬杭甬鐵路為名，向英商借款，事為江浙兩省人民得知，羣起反對。清廷懾於民憤，允許改歸江浙兩省自辦。全綫上海到楓涇一段，地屬江蘇；楓涇到寧波一段，地屬浙江。當時區域觀念嚴重，乃協議分立公司，各自辦理。浙江成立浙江鐵路公司，公推湯壽潛負責，在全省七十五縣募集股款，宣傳直到窮鄉僻壤。於是老人移素蓄之壽衣棺材費者

有之，孤儿寡妇挪生活儲金者有之，股款共集得一千一百余万元。总工程师濮登云秉承湯的意旨，竭力节省，每华里铁路仅合建筑費二万元，破当时记录，其缺点在未顾及农田水利。嘉兴、嘉善屬境，港汊紛歧，是平原河网地带，乃筑路时将小河堵塞，未設沟管涵洞；同时大河河面亦受路基約束，縮小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无洩水措施。以致铁路东西向地段之路南农田，跌价百分之五十；铁路南北向地段之路西农田，也同样跌价。

湯寿潛左右文人居多，竞相介紹筑路物資，湯未加慎重考虑，致路成之日，积余物資达七、八百万元之巨。因之，公司資金周轉困难，仅一千七百万元債務之利息，已不胜負担。此时适湯氏之弟在上海以湯合股名义所開設的錢庄倒閉，存欠相抵，亏空三十余万元。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要逮捕湯氏，益使湯难于应付；而湯因系浙路總經理，又势难长期迴避，不到上海。于是湯子拙存与其戚浙江兴业銀行（該行初由鐵路公司資金創立）董事蔣抑卮商同董事长叶揆初向北京財政部疏通，将公司債務改归該部負担，由該部发还公司股款；另奖励湯寿潛二十万元，实际上以此便利其偿付錢庄債務。通过股东会議，此案遂定。而全省人民奮斗經年得以保存的路权，仍因湯氏一家之故，虽名为国有，依然落入英商手中。我从蔣抑卮得知此内幕，并曾在股东会上发言，托詞为股东中的老人孤寡着想，贊成此举，及今思之，汗顏无地。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資料工作組供稿）

## 袁世凱軼事数則

吳 弱 男

袁世凱系我祖父（长庆）义子，庶出，其嫡母生子三，世凱行四，

我七八岁时曾見之，称之为四伯。因袁童年不好学，为父所不喜，我祖父則賞識之，謂可以习武，因乞为义子，移居我家多年。值南通张季直在我祖幕府中，即延其課袁讀書。袁有胆識，敢于担当，我祖病重，由朝鮮任所以遺摺向清廷保荐，因获任用，由此騰达。

那拉后死后，袁謫返河南不久，回京家居，防卫甚严，門窗张鉄絲网。良弼知袁終不保清，遣客行刺，已破网，卒为袁之卫士所擒。袁亲加訊問，刺客即以良弼主謀对。袁不杀刺客，且資遣之。不久，袁即遣人于石駙馬大街良弼寓前刺杀良，行凶时在当日下午二时許。我以后入京，有人曾指出其行刺地点，为我述彼时情况。袁所采策略，系先杀宗社党，后杀民党，其桀驁狡黠，于此可見一斑。

袁有妾十二人，在京时入夜悬灯为号，示所宿处。又袁称帝前，准备登极衣履，仅綉花白袜一双，即費三万元，其狂妄又如此。

袁任总統时，张謇曾一任工商总长。张入京，袁曾三次致书而三易称谓，初称夫子，繼称先生，后称总长，愈后愈傲，称总长时直以业师作僚属矣。

我伯父有鴉片烟癖，不为袁所見重。袁遇余父較亲切，以二弟称之。袁尝函余父干涉余姊妹入教会学校，謂将“学坏”，并劝余父入京，謂当月致千元。余父却之。余父作詩曾有“丈夫餓死尋常事，何必千金卖自由”語，即指此而言。其后若干年余父病半身不遂，袁曾寄贈医药費二千元，款到时我父已垂危，既而又汇奠仪一千元，后即以此三千元料理葬事。袁所以有此两次汇款，另具政治目的，緣彼方有所图謀，忌行严有所活动，不愿其去日，乃借此結好。但我夫妇終于东渡，盖其时袁之爪牙密布各地，我等只有两条路可走，非逃即降，降則为帝制派，走則为民党，势不可以复留。

余童年以后未再見袁，迨以后入京，已在黎任总統时期，袁早

死亡。惟余妹亚男曾于袁任总统时入京见袁，为其夫（前夫梁元）有所干求，到京时居东交民巷，尝数度入总统府，袁卒为电粤省长龙覲光予以照拂。亚男幼时貌与余极相似，时人误认我姊妹孪生，及长，体态犹相若，讹传或由于此。

袁称帝后，西南起兵声讨，川督陈宦乃袁亲信，陈妹为袁宠妾，鍾爱最挚。袁不虞陈为大势所逼，终于附和民党，迫得陈反对帝制，怒不可遏，立时昏厥倒地。陈妹侍侧，急扶之起。詎袁甦，竟尔迁怒，立拔佩刀斩之。不数日袁亦病死。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供稿）

## 孙中山先生创办上海《民国西报》的经过

張 祥 麟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为团结南北起见，将临时大总统驻位于袁世凯，退居铁路督办之职，从事发展全国铁道计划之拟订。但第一任的唐绍仪内閣迅即被袁阴谋破坏。中山先生看出了袁的野心，想从唤起舆论，发动民意着手，来制止袁破坏民主制度的阴谋。

当时，老同盟会已准备改组为国民党，在全国多数大城市中已办有华文报纸可资宣传之用，上海的《民立报》尤其有声有色。但宣传网中，独缺对外宣传的洋文报纸。而当时的所谓“列强”，对于中国政治不但影响巨大，而且常有干涉我内政的举动。故必须有一洋文报纸，对外宣扬我民主力量向封建余孽作斗争的伟大意义。中山先生乃于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创办英文《民国西报》。

《民国西报》是英文夜报，每天下午出版，星期日休刊。主笔（即总编辑）兼发行人是馬素先生，负报社全责。聘有英籍副主笔两人，连同译员、访员及业务人员在內，不到十人。有自备排印机



器，設備完全。一九一三年，每天加法文社論一篇，添聘韋玉為副主筆，專写法文社論，作用在向當時的法租界當局宣傳。

報館館址在當時英租界的博物院路（即今虎丘路）五十號門牌。博物院路有一條小石路通到圓明園路，在這條小石路上原有一排西洋式二層樓的小花園洋房。報館用的是沿虎丘路口的第一座洋房，面南朝西，大門由小石路出入。多年以來已改建為舊猶太教堂（即現在的公私合營工商會堂）。

中山先生創辦《民國西報》有兩大目標，一是聲討袁世凱，二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一九一三年，在所謂第二次革命的討袁戰役以前，《民國西報》被英國鴉片煙商集團在中外會審公廨以誹謗誣蔑罪名提起刑事訴訟案，幸得輿論的支持，未曾敗訴。當時這是一件震動中外的訟案，因事關英國商人集團在華販賣鴉片煙毒藥的前途。上海租界不久實行禁煙，同這個案件的結果不無關係。這也說明中山先生創辦《民國西報》，當時在反對帝國主義方面是發揮了作用的。《民國西報》這次訟案所聘的辯護人是美國前駐滬按察使佑尼干老律師。

中山先生創辦英文報的主要作用，本在對外宣傳袁的不軌行動。故湖口戰役一起，《民國西報》即全力從事於討袁宣傳，大聲疾呼，再接再厲，在國際上起了一定影響。且因事先派董顯光為駐北京訪員（董是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畢業生，由美國駐滬總領事淮爾德介紹而來），通過北京美國使館刺探消息，故在討袁戰役期間，《民國西報》關於袁的陰謀活動消息亦異常豐富。

二次革命失敗，中山先生不得不離滬赴日暫避，而《民國西報》亦於一九一三年冬自行停刊。

中山先生創辦《民國西報》的經費是由張靜江和龐青臣資助

的。代表中山先生常来报館联系的人是邓家彥和宋鶴齡。邓当时是《中华新报》主笔，宋是鐵路督办处的女秘书。

(政协上海市委員会文史資料工作組供稿)

## 民初兵工見聞雜憶

吳承禧

### 民國初年陸軍部所轄之兵工机构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兵工主管机构为陸軍部軍械司，下設兵器科和保管科。由軍械司領導的的各兵工机构如下：长辛店枪炮試驗場；南苑附近的团河工兵器材庫，内有整列的架桥縱列和洋鋸、洋銑等；德县兵工厂，专造枪弹；上海兵工厂，原名上海制造局，专造山炮、野炮和炮弹；汉阳兵工厂，专造步枪、馬枪、机关枪；巩县兵工厂，专造重炮和炮弹。此外在广州和济南，均設有軍械修理所。以后軍閥割据，紛紛自行設立兵工厂，均不归軍械司領導，如奉天督軍張作霖、山西督軍閻錫山，在沈阳、太原分別設立的兵工厂等。至于上海的江南造船所、馬尾造船所等，則划归海軍部管轄。

### 中国自制的第一枝自动步枪

一九一五年秋，全国兵工督办署咨送汉阳兵工厂总办刘庆恩制出的自动枪，請陸軍部試用，經部长批交軍械司司长翁之麟試驗。翁派兵器科科員吳承禧办理。吳乃会同兵工督办署会办蔣廷梓前往保定陸軍軍官学校打靶場，将自动步枪固定在三脚架上，依次在二百米、四百米、六百米、八百米等的距离，对准环靶，以站

式、跪式、臥式等姿勢，用右手的食指扳一次扳机，即可連續射出五发子彈，命中尚佳，距靶的中心尚近。當場有陸軍第三師參謀長吳佩孚及該師的高級軍官多員和軍官學校校長等參觀試驗，均加贊許。吳將每個距離及每種姿勢所命中的環靶，一一標明，帶回北京陸軍部，轉報總統袁世凱，經袁頒給劉庆恩為勳五位。

### 中國自制的第一批黃色炸藥

一九一五年秋，陸軍部軍械司技正徐尙武繼承其父鉗研化學之成果，制出了黃色炸藥，送請陸軍部試用，經部長批交軍械司司長翁之麟試驗。翁指派兵器科科員吳承禧辦理。吳乃會同徐尙武前往長辛店槍炮試驗場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打靶場，以此項黃色炸藥包，對樹木、磚石牆、混凝土牆、鋼軌、鐵柵欄等，分別按照日本及法國爆破教範中應用的公式，計算出用藥的數量，作了爆破試驗。結果，按日本公式算出的數量做試驗時，都能爆炸粉碎；再按法國公式算出的數量做試驗時，就未能爆炸粉碎。試驗證明徐之黃色炸藥威力比日本制者為大，但較法國制者稍弱。試驗報告經陸軍部轉報總統袁世凱，經袁頒給徐尙武為勳五位。

（政協北京市東城區委員會供稿）

### 民初清室向銀行抵押的一批文物的遭遇

胡 仲 文

民國初年，清皇室內務大臣紹英、耆齡等和北京鹽業銀行經理岳乾齋、副經理朱虞生等秘密接洽，以宮中所藏文物作抵押向銀行借款，計先後以金鈔<sup>①</sup>、玉製品、磁器等共四千餘件，分批借得現銀四十萬兩。文物數量之大，押款之多，是頗足以驚人的。此項借款經

过若干年之后,本息合计起来,为数甚巨,清皇室无力偿还借款,赎回押品。大约到了一九二一年,由清皇室经手人和盐业银行商妥,把押品全部作价,除偿还借款本息外,并由银行找补了若干现款。从此,这一大批宝贵文物就为盐业银行所有。到了一九二九年吴鼎昌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的时候,我以天津四行储蓄会会计领组资格奉命参加该行改革会计制度,发现这笔借款数字在当时该行帐上早已全部打销,所有押品也就成为该行私有的帐外物资,除吴鼎昌等几个人而外,就没有人知其底蕴了。

盐业银行先把部分玉制品和磁器装了八大箱密运天津四行储蓄会保管,一九三二年又把金钟十六件装了八个木箱,由京秘密以汽车先运交天津法租界盐业银行保存,后来又转送英租界四行储蓄会保管。一九三一年,该行曾选出玉制品和磁器精品二、三十件派行员李肃然押运到美国出售,除卖去一部分外,其余由李代表盐业银行租用纽约花旗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N. Y.)保管箱存放起来。李及所保管的文物至今尚存在美国,下落不明。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日寇进入天津旧租界后,敌伪大肆搜括金银财物,盐业银行存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这批文物也在日寇窥伺之中。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曾设法密向吴鼎昌(时在后方任贵州省主席)请示处理办法。吴复电嘱“毁”,但陈未执行,幸获保全。

解放以后,除了天津所有金钟和部分玉制品、磁器等都由政府接收以外,其余的全无下落,这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就这样在金融资本家手里散失了。

① 金钟即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所陈列的编钟,是一种古乐器,公元一七九〇年(乾隆十五年)所制。古代编钟本系铜制,清乾隆皇帝为了表示豪富,故用黄金铸成。这套金钟共十六只,重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两二钱。

## 略談中山艦事件

方 鼎 英

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愷先生被刺后，蔣介石即借查办廖案为名，排除异己，凡是为他所不快的人，便以嫌疑犯罪名加以逮捕，弄得人心惶惶。蔣本人此时出入也戒备甚严。他每日往返黄埔軍校和省城，經常备有中山艦、大南洋和一小汽艇作为随时渡江之用。他由軍校渡江，离开軍校大門后就直向碼頭走去，事前絕不宣布乘那一只船。他在省城东山碼頭、大沙头碼頭、长堤办事处碼頭都随时有汽車听候使用，渡船快到时他才通知停靠什么碼頭。他乘車絕对不准司机先問行駛路綫；有时行至中途，他忘記告知司机行車方向，司机又不敢問，只好把車停下来，等候他指点。

当中山艦事件发生以前，广州反蔣声浪甚高，提出了“打倒新軍閥”、“打倒段祺瑞第二”等等口号。据聞事变之前，蔣偕陈立夫（当时陈任蔣随从洋文秘书）乘汽車赴沙面，本想购外輪船票走港轉沪，暫避风头。陈立夫在車上提醒他說：“不走就沒有办法了嗎？”蔣頓有所悟，始中止离粵，隨即策划了中山艦事件。陈立夫之特受蔣賞識，亦自此始。

中山艦事件发生时，我方由第二軍（即湘軍）調到黄埔軍校任入伍生部部长不久。事件发生后，二軍將領又憤填膺，欲謀联合三、四各軍共同討蔣，軍长譚延闓已准备上火車返曲江防地正式发劲。适我进城，与譚相晤，談及此事。我認为不可一誤而再誤，主张对蔣先礼后兵，請譚馬上出来調处，首先責蔣不該如此妄劲，并提出調处条件，劝蔣顧全大局，接受調处；如蔣不接受，再打不迟。結果，

汪精卫迫于形势，不得不走，而蒋介石攘夺政权之阴谋终以得逞。

后来在第一軍任政治指导员的黄埔学生约七八十人（多半是青年軍人联合会的成员）齐集軍校向蔣說：“我們的汪党代表那里去了？”蔣說：“汪党代表是安全在那里的。这回的事我现在不说，将来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便可明白的。”

## 郭松齡反奉时奉軍和日本的勾結

湯 國 楨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役以后，张学良任京榆一带駐軍軍长，兼第四师师长、东北航空处总办和东北讲武堂监督；郭松齡任京榆一带駐軍副軍长兼第六师师长。张时常往来于京、津、奉天之間，軍部事务大都由郭处理。当时經常随张来往办公的，有軍部上校軍需处长魯穆庭、中校軍械官周濂、第四师中校參謀鮑文樾、少校副官黄显声（黄被派为营长后，其职务先后由王某及第六师少校參謀姜化南接替）、少校軍法官朱光沐、东北航空处上尉处員湯国楨等人。

当郭松齡举兵反奉之前不久，約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旬，我們随张学良由奉天来津，二十二日傍晚又匆匆乘車返奉。专車开动后，姜化南和朱光沐对我们說：“今天少帅和郭軍长談話时，好象有些异样，几个高級将领的态度有点傲慢，不似往昔，怕有什么变化。”但我们当时对郭松齡决心叛变尚茫无所知，嗣后才听说郭已于当日发出要求张作霖下野的通电。

我們到达山海关外前所車站时，駐軍工兵营长吳树滋已在車站迎候，张探身窗外，面諭吳营长率队开赴山海关，简单告訴他一

些情况,并命他通知驻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团(好象是第十九团,团长为张廷枢)迅速布防。专车继续东开,由于前面情形混乱,开到連山車站即停。当时連山車站还停留由东往西的客車一列,姜化南听说客車中有奉天官銀号的人押运現款赴津,他因临行时未带現款,經請示张学良后将款接收下来。随后,张叫专车轉到連葫支綫,开抵葫芦島。我們在东北海軍学校进晚餐后,又去到鎮海軍艦上。記得軍艦先往东开又折回西行,大約在海里游蕩了一两天的時間,还听说艦长凌霄有通郭之嫌。接着軍艦开到秦皇島,当地有一个炮兵連駐扎,姜化南去找連长刘多荃說明郭松齡反奉情况。刘表示唯张之命是听。姜回艦报告后,又上岸叫刘等待后命。一次,张立在甲板上,看見一列一列的兵車經過秦皇島的鉄桥往东行駛,有一个青年中尉炮长向张說,軍艦上的主炮可以有效的射击鉄桥和兵車,請示是否发炮。张搖搖手說,“都是我的部下。”有一天晚上,张問我:“你新来不久,要是我們上山,你去不去?”我答应說去。这几天张不断用无綫电同奉天通电报,等到楊宇霆与日本方面接洽好后,軍艦就开往大連。到达大連后,张帶同鮑文樾、朱光沐、姜化南和譚海先回奉天省城,旋前往兴隆店。隔了一夜,我們也回到省城,并急忙赶到兴隆店,在张临时設立的司令部内办公。

这时,由省城开来的部队,有戢翼翹和朱繼先两个旅。张学良临时委派陈深为炮兵司令,并将后方各种类型的炮和兵工厂所有的炮全部調到前綫来。嗣后,騎兵旅长于芷山率部由关內繞道冷口到达兴隆店,吳俊陞亦率黑龙江騎兵前来。时值严冬,我們随张到前綫視察时,雪深沒膝。在餐車上,見有日本兵五、六人,穿戴中国士兵的皮袄皮帽,正在吃飯,据說是日本炮兵,前来帮同瞄准射击的。

不久，郭松齡的團長富雙英、劉振東等陸續來歸；郭兵敗出走後，他的參謀長鄒作華也由白旗堡車站來電話，說他已能控制一切，請張放心。郭松齡反奉事件至此即告結束。

## 皇姑屯炸車案側聞

張 聯 蓀

我最好的朋友靳雲鵬，是張作霖的兒女親家。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張作霖由北京回奉天，靳雲鵬也同車出發，準備同張作霖一起出關。可是當專車開到天津站停下來的时候，忽然靳宅（靳當時家住天津）來了一個副官，上車報告靳雲鵬說，日本領事館派人送信，今晚九點鐘，有靳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同他商量關於山東魯大公司的重要問題（靳是山東魯大公司的董事長），請他即刻回宅。靳雲鵬听了，只好下了火車，隨他的副官回家。他到了家裏，靜候一夜，並沒有這回事，心里非常納悶。

第二天早晨，靳接到電報，才知道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死，很是驚異。他細加思索，心中才明白過來，原來日本領事館送的是個假信，分明是把他騙下車來，免得隨張作霖一同被炸死。

這一件事是靳雲鵬親口對我說的，由此也可以證明，一九二八年皇姑屯炸車案乃是日本人預定的陰謀。

## 關於中東路事件的回憶

劉 翼 飛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間張學良在北戴河避暑時，哈爾濱特區長



官張景惠、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教育廳長張國忱等紛紛電張，要求進兵吉黑，強制接收中東鐵路，將蘇聯的鐵路局長及蘇聯籍的全部工作人員一律解職送出國境，白俄人員則留用不動，並且說蘇聯一定不能抵抗云云。

張學良乃找我說：“張輔帥（張作相）對於這事還猶豫不決，你可偕同張廷樞明日去吉林見輔帥，告以根據各方面報告，蘇聯決不能打仗，以堅其信心。”隨後他又約王樹翰、王樹常、鄒作華和我四人開會研究。張說：“我擬派十個旅開赴東鐵沿綫，維宙（王樹翰）你們仔細研究研究，我一會再來。”張說完即進里屋注射毒品去了。我們四人相向而坐，皆默不作聲。我問王樹常：“怎不討論呢？”大家緘默如故。少頃，張由里屋回到客廳，首先向我說：“翼飛，你們研究得怎麼樣？”我乃直率回答說：“我們如果僅僅出十個步兵旅就能擊敗蘇聯的話，那我們就不致退回關外，老將也不致遇害了。”張說：“根據各方情報，蘇聯決不能打。”我說：“從軍事學來看，打仗有沒有把握，不在於敵人能不能打，而在於我們怕不怕和行不行。”張當時沒有說什麼，但第二天就不許我去吉林了。據別人說：“張長官說，‘怎麼翼飛這次也氣餒了呢？’”這大概就是他中止派我赴吉，說服張作相的原因。後來聽說呂榮寰曾攜帶所謂情報和接收中東路的計劃到沈陽和張學良商談，張遂派王樹常為第一軍長，率劉翼飛、張廷樞、孫星五等旅進駐哈長、哈綏沿綫各要隘；胡毓坤為第二軍長，率領奉軍董英斌、徐永和、黃師嶽三個旅進駐昂昂溪支援黑龍江方面對蘇作戰。當時駐防于滿州里、海拉爾中東路沿綫的部隊還有黑龍江萬福麟所屬的張鳴九、梁忠甲韓光第等旅。騎兵軍長鄭澤生率白鳳翔、李福成、柴三點（綽號，忘其名）等騎兵旅進駐密山，與邊防第七旅趙紹武部統歸丁超指揮。

战事发生后,奉軍遭到苏联紅軍的反击,各軍情况均很不利。滿洲里方面,旅长韓光第陣亡,梁忠甲被俘,旅副魏长林陣亡。哈綏密山方面,荣三点在张三沟作战不利,被郑泽生枪决。丁超也枪毙一营长。松花江下游的富錦县失守后,据情报說,苏联兵艦数艘并带拖船若干,滿載兵士,溯江而上,将直取哈尔滨云云。王树常令我率領本旅由双城、阿城、一面坡等地星夜开赴滨江县构筑陣地,拒止苏軍。我抵滨县后,探知苏联軍隊并未前进。不久即由蔡运升与苏方代表协商停战,訂立奉苏协定,战事遂告結束。

据說中东路每岁鉄路盈余,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設,修筑鉄路;而呂崇震等則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漁利,乃慫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鉄路,以致酿成战事。

## 回忆川軍反对袁世凱的斗争

但 懋 辛

### 第一部分：一九一三年討袁之役

#### 一

四川自辛亥光复后，都督尹昌衡以师生关系，派委胡景伊为四川軍团长。一九一二年五六月間，西藏出兵进占巴塘里塘。七月，尹昌衡以都督兼川边經略使統兵亲征，而以胡景伊护理都督。自胡接任后，即派干員与袁世凱及其亲信联络，表示拥护，并参加共和党，在四川成立了共和党支部。其时四川新成立的軍隊共有陸軍五个师，其中一、二、三、四四个师自师长以下几乎都是胡的学生和旧属，惟有第五师系同盟会革命时所組織，沒有胡的任何私人插足。辛亥前胡从广西逃到上海时，四川同盟会正組織蜀軍北伐軍，胡即欲插足领导，当时被熊克武和同志們把他赶走了。而今胡作了都督，熊克武是他手下的师长，不消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只是寻找机会，如何下手而已。熊亦深知此中微妙，以此极端表示恭順，沉靜以待，不愿在軍制上被上級拈过拿錯，并希望以此稍舒胡之怨气。然而即使如此，胡对熊仍然白眼相加，动辄駁斥。据都督府某秘书說：自胡到任后，只有第五师最守紀律，凡事都遵胡督命令而行，

事后必具呈报,但胡督对别师的公文可以不看,而对第五师的则非亲阅不可,且不论正确与否,总是批“駁斥”,有时甚至批明如何斥責之意。那时第五师司令部自师长以次,几乎是清一色的同盟会的同志,每逢星期日,师长熊克武和我及李蔚如(一等参謀)、吳秉鈞(軍需处长)差不多都要聚餐聊天,有时关于胡对我们的仇視,也提出研究,寻求对策。经过几次討論,都无好办法,大家觉得只有把兵練好,提高警惕,到那个山头再唱那个歌吧。我那时是参謀长,年青不够沉着。我說,只有两条路,不是受宰割,就是造反。吳秉鈞說我太粗疏,其实我内心打算,若被胡改編,我决心不干,落得再去求学,造反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过說說大話而已。我根本没有想到袁世凱会变天下,因为他有过“扫除专制之瑕秽,發揮共和之精神”的宣言,我还以为同我們为难的只是胡景伊。

## 二

三月,宋教仁被暗杀,事后知为袁世凱所指使。我們认为袁必有阴谋,革命党未可乐观。六月,袁世凱免江西李烈鈞、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湖南譚延闓四都督职,我們认为南方必将有事,后来听说他們一一交代而去,并无任何行动。因我师同志們早已商定同南方各省同志对于袁世凱采取一致的态度,从而想到胡景伊必将乘此机会整我們了。此时同学老友王右瑜从北京到了重庆,說是到成都与尹昌衡送勳章。当晚熊克武設宴为之洗尘时,他說:袁世凱撤消南方四督后,四川旅京同乡中在袁政府任职的人漏出消息說,袁世凱决心剷除革命党的一切力量,胡景伊乘机密电袁商洽編遣第五师的办法。在京的周道刚、徐孝刚等反对胡的日本陸軍士官学校同学們,知道确实消息后,作了协商。大家认为第五师兵精械

利,干部多半是保定軍官生,軍風紀又好,比川軍各師的實力都強,目前明知第五師很難立腳,註給胡任意處理,實在可惜。經進步黨人計議,如第五師同志們認清環境不容干下去,而又期望保全實力不被胡所宰割的話,那只有熊師長搶先密電陸軍部請辭職,同時由有關方面與陸軍部商妥,根據熊電批准其辭職,并委周道剛繼任為師長,直屬中央陸軍部,使胡無法反對。這樣,周可利用第五師的力量為將來反對胡之用,我們也可利用周來保全實力為他日之用。

當時在座的同志,為我和吳秉鈞、李蔚如,對王右瑜所談都未加可否,几雙眼睛只望着熊克武。熊說,暫不決定,容再與同人考慮考慮,一俟商妥,即行作答。王去後,我們四人又研究,覺得如不造反,只好遷就,但大家認為第五師是同盟會的同志們建立起來的,還須約同盟紀念會主要同志事先商量,把理由說清楚,以免後來扯皮,但事先又宜秘密,不可先註很多人知道。於是擬約朱叔痴、楊滄白兩人。有人說,“朱三爺名‘三吵吵’,約他來談就會向你吵開,不如只約滄白吧。”次日約楊談後,取得同意,熊即面請楊代擬辭職電稿。時天氣炎熱,為慎密起見,表面上說師長偕師部同志們到南岸老君洞避暑。七月二十一日,滄白到師部一同上山,并約右瑜同往。不意楊上山前已將此事密告了朱叔痴。我們上山後的次日晚,師部副官張某即來密報熊克武說,“同盟會同志們和五師旅團級的官長在將軍祠開會,朱三爺報告熊師長要辭職,理由是因胡都督電袁世凱要取消第五師。大家聽說,羣情忿怒,決議力阻熊師長事先辭職;如胡下令撤熊師長職,全師官兵一定反抗,不惜犧牲。他們并提出此事是王某由北京來引起的,屆時還要殺王以洩憤,并且認為主張熊師長辭職的是但懋辛、李蔚如、吳秉鈞、張亞光,發動時也要將這幾人殺掉。他們還擬了出兵計劃,北路由團長范蓁率部經遂寧

攻成都，中路由旅长龙光率部由永川攻隆昌，第一师吴团另分两支攻泸州，然后再攻成都。他们还說，如师长贊成反抗就沒話說，否則將师长关起，仍打出熊字旗，以資号召。”

熊于次日早率一行人回到司令部，当晚即召开軍官會議。熊說，“声討袁、胡，我与大家主张是一致的。我拟事先辞职，本是想准备伺机而动，并不是不干了。不过見南方四督被撤，竟无反响，我师孤处重庆，一向被胡仇視，这师部队是革命党的結晶，被胡宰割，实不甘心；而反抗吧，以一頂四，前途实难逆料。我不忍我师官兵吃眼前亏。右瑜兄是在京同乡，为了爱护我师，不耻胡氏掌握，受托而来同我商量，完全出于善意，不能怪他。現在同志們既都宁为玉碎，不愿瓦全，我責无旁貸，决心与同志們一道干下去，即時起速作紧急准备，將所部集中待命。事先务須秘密进行，我們先开战而后宣布。”并問大家有无异議。大家說，只要干就沒話說了。

散后我留龙光旅长、范蓁团长、呂超副团长和有关同志們商討作战計劃。他們依照在將軍祠協議的原則分两路进兵。中路因要先攻泸州第一师周駿所部(該师在隆昌駐了一团兵)，故配备兵力較多，拟由龙旅进住永川后分三支进攻：一、东大路以呂超率部由榮昌进攻隆昌；二、由永川經来苏、土坪直攻立石站之敌后，向泸州进攻；三、水路方面由江防司令余际唐和川东观察使黃金鰲所部警备队及五师第二十团长邹有章率兵一营經合江攻泸州，师部派炮兵一排，由副官长率領随同前往。当时他們提出这样的計劃，师部自师长和參謀处都認為是經過全面考虑的，唯独我一个人不同意。我說，“大家想想，就本省而言，我师以一个师当四个师之众，只有利于速战，宜不顧后方，集中全力用突击的战术，先把較有战斗力的第一师打垮，隨即进占成都。因二、三、四各师皆是新組合，很复杂，

无战斗能力,胡所靠者亦只第一师,我全力把泸州打破了,先声夺人,敌胆已虚,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成都,我敢说,各师非观望即投降。万一不成,四川周围皆山,选择险要,安营扎寨,四处打游击战,以待时机,亦无所不可。如把自己有限的力量分割使用,稍事持久,虽胜亦败,我认为这是不知彼己的失败计划。”我虽如此说,并没有一人同意我的主张,还有人批评我是冒险家。我说,革命就不怕冒险。一时争吵起来,我把笔一甩就往外跑。熊克武把我拦住,我想弄僵了不好,就说:“你们多数人同意,我还是服从师长的命令,照样尽我的能力,但这个计划我不出主意,请同志们和李蔚如同志草拟好了。”

### 三

七月底以前(日期已记不起),关于战时的兵力集中及后勤所需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适电报局送一个电报到师部,是江西李烈鈞、欧阳武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的文日通电,同志们皆大欢喜,都觉得这一下就可以正式通电起义,不会让胡景翼整我们了。师部派副官通知报馆不忙登报,等出兵后再披露,但报馆已经出了号外了。

八月一日,命龙光为第一支队长,先行率部进驻永川;一面组织讨袁军总司令部,熊克武为总司令,下设民政部与军政部,民政部长杨庶堪,军政部长刘植藩,并兼参谋长,我作副参谋长。四日,宣布讨袁。龙支队到永川后分兵两支:一支由吕超率领,进攻隆昌;一支是龙直接指挥,命李遐章营长为前卫,从王坪向立石站、寒坡场两处之敌进攻。据报四日拂晓已开战,但以后接连几天都无捷报,总司令于七日命我前去督战。我在模范营拨兵一班作队伍,兼程于八日到了永川,与龙光支队长说明后,次日即向王坪前进。到

了来苏場附近高坡,听見前綫枪声甚密,我馳馬到了王坪,看見陣脚已經不穩。李司令拟入夜撤守来苏,見了我去,大家兴奋起来。我当晚同李商談,問他这几天作战經過,何以不能取胜,敌情如何。他說是乱打一气。我不好再問,只好命他令前綫固守陣地,不要乱打,待我明日了解敌我情况,再下令共同作战。次日拂晓,我偕炮兵营长伪装农民到前綫巡視,把敌我双方地形及两軍兵力駐紮和前哨的配置繪成略图,然后去找李討論,并告知他要如何作战才可能取得胜利。他說,这里沒有团长,大家都是营长,他不便于下命令,要求我作临时指揮。我当即草拟作战命令,交李写好分送各营长,令各营今晚照令行事,明日拂晓攻击,不半日可以取胜,还可以夺得大炮一門。次日战事果一如所料,把敌据点寒坡場占領了。当晚召各营长开一临时會議,告以立石站敌军情况,要他們共同研究如何作战,并推一临时指揮,步伐一致,以軍令从事,才可操胜算。次日我回永川,龙光接总司令密电,命我作該支队前敌指揮,并要我仍回王坪,进攻立石站之敌,直搗泸州。第二日早膳后正离支队部出发,却見李司令由担架抬进营門来了。我忙回轉支队部。李說,我去后他們会攻立石站受伤,吃了敗仗,敌人把寒坡場夺回去了。我立即馳赴王坪,尙未到达,見各营一些散兵紛紛后退,我馬上督令折返原地。前綫聞我到了,一鼓作气夺回了五里店陣地,相持入夜。当晚召集各营长會議并宣布我已正式奉命为前敌指揮官,随与各营商談以后如何作战。听取各营长报告几日来的敌情后,我根据所报,加以分析判断,提出战术方針。因寒坡場之敌已明了我上次攻取該地之战术,故我此次改变方針,以少数兵力佯攻寒坡場,敌誤为我必須取得該場以后,方敢于进攻立石站,从而敌军必置重兵于寒坡場。因此,我拟出敌不意,直取立石站。有一位营长不同意,誤



为側敌行軍，犯兵家之大忌。我說，“正因为敌人料我不敢做，而我才这样做的。我們对立石站正面之敌，仍如往常一样，表面上取守势，而另用輕兵从右翼于拂晓前进入立石站后場口，待拂晓猛力向場內进扑，敌必从正面抽兵回救，陣脚一动，我軍加速猛攻，前后夹击，敌軍垮矣。”各营长无异議。正草拟命令中，忽报敌人向我进攻，并放排枪，全陣綫皆然，似向我夜袭。我立命各营长返回陣地，沈着应付待命。但我判断敌人如果真进攻，不会全綫放枪，作决战姿态，或許是为了掩护退却而故作进攻模样。我乃命各营长細听枪声，如只在原地发出，或其声距离渐远，甚至突减少一大半，必有撤退之举，即派一小部作威力偵察，如确是撤退，立即跟追。及后果如所料。龙支队追敌至石洞鎮时即与我軍呂超所部会合了，正向小市追击。我次日到立石站，正在檢閱敌軍遺下的一些文件，适永川送来一封急电，总司令命我抽兵四营回救重庆，因黔軍黃毓成到了南岸，胡軍王陵基先头已到磁器口。我看抽兵已不及，即专函呂超，告以鎮靜相机处理。我先回永川，在电机上問話，总部无人接电，我立即加快回渝。行至白市驛，遇着营长邱延薰从重庆回来，說重庆已失守。我們折回来凤驛，以待前方部队撤回时同龙支队长会商办法。我問邱重庆失守的情况，据他說，初拟守城待援，因南岸和磁器口之敌均逼近，重庆总商会邀各国領事出面婉商总司令，說前方回援不及，全城人烟稠密，經不起炮火之災，望憫念无辜的人民。时陈泽霈与向传义自省外归，商会推陈为临时司令維持治安，因而熊总司令召集商会首事，当面交代与陈而去。一、二日間，前方部队紛紛到了（大約九月十四日晚間），我約龙支队邀請已到的軍官率队繞道下游万县过江，进入西秀山区游击待机，但自支队长以次，无一人敢干。此时滿街皆兵，秩序漸見混乱，很多眼睛向支队

部扫来扫去。我急向龙光說，赶快把队部的餉銀尽数分发与各营支配，遣官兵回家。这一支第五师队伍就此星散了。

我同合江退回来的邹有章团长及其副官賴某从璧山到磁器口，住老友淡春谷家中。当时黄毓成、王陵基在城内打起来了，淡在南岸御敌受伤，住在医院，派专人回家要我即在他家等候，待其出院一同出省。邹、賴去了之后，不久来凤驛传来消息（淡之母舅赵某所談），說江防軍退到来凤驛后，队伍中有人在場口坟垸内集合，打算搶劫白市驛后，拖上山做土匪。參謀长陈先元聞知，立即到場向他們演說劝阻，而領導者极端反对，必欲为所欲为。陈痛哭流涕，跪地婉求，仍制止不住。陈眼見譚变在即，乃拔出手枪自杀。部队士兵感动，有一人随即将倡首者打死，各自散去。市民感陈之德，大放火炮，将陈厚葬于郊外，有很多居民男女去坟前烧香焚帛叩头礼拜，接連数日不絕。

## 第二部分：一九一六年护国之役

### 一

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帝制自为的阴谋逐步暴露，举国反对。我当时正在上海，内心預計，要反对帝制，起义发难根据地最好是云南，并于夏間（大約六月末）找周官和、郭昌明到昆明去探察軍政界动态及一般輿論。随后得他們的报告說，云南方面贊成帝制的很少，尤其是軍界的中下层十之八九都表示反对。八月間，云南軍隊已派有一团长董干臣到上海来打听革命党人对帝制的反应，听說还到日本去見了孙中山先生，其时楊度等已发起了筹安会。九月，熊克武自南洋回到上海，談及在南洋的同志們极注意帝制問題，所

以返上海来想了解一些情况,以便准备届时发难,声罪致讨。我把起义发难必须在云南及找周官和去云南联络所得的反应等情况,一一告知他。我们商定几天后一路折回南洋,向同志们商量办法。随后我们买好了船票,三天后就要起身到新加坡去。有一天我出去访友,路经老靶子路遂初精舍门前,恰巧遇着郑孝胥正送客出门口。郑回头见着我,就把我拉进他屋内,说有要紧的话向我谈(因中国公学成立时他曾当校长,所以认识我)。他问我,“方才送出去的那位客你认得否?”我答不认。他说,“那是孙洪伊,才从南京回来,特向我说袁世凯急于要做皇帝,已令各省于今年十二月以前召集省会代表会议,以投票方式强迫赞成君主立宪,一俟大多数省分投票之后,就先期成立大典筹备处,决定于明年元旦改元登基。我要告诉你的,是孙洪伊说冯国璋不赞成,而且王士珍、段祺瑞等内心也都是反对的。你们革命党是根本反对帝制的,南京不久要开会投票,你何不联络你们的同志,届时去打炸弹破坏会场,使冯国璋有所借口,劝袁终止称帝。”我答,“袁做皇帝,我们一定要把他打倒,不仅事先打炸弹破坏而已。”我告辞后立去向熊克武谈,以郑某所说的情形来判断,时间迫切,应及时行动,我们不可再转新加坡去了,并写信通知那里的同志们如何分别进行。随后我们就把船票退了,去找李根源商量,说明我们认为必须从云南发难的理由。李详细研究之后非常赞同,并由其通知在南洋的同志从速回国,共谋进行。他并说李烈鈞与唐继尧友好,一定要约其同去,而且还说要派钮永建到广西联络陆荣廷,要他在云南讨袁时起而响应。

十一月初旬,熊克武得李烈鈞电约去香港一同去昆明,熊即偕李蔚如、张冲、余际唐、刘国佐,另有陕西井勿幕和其友郭唯一、郝达庭、严敬斋等(井是拟从四川到陕南策动革命的)同去。我留在

上海組織一部分同志由長江潛回四川，準備策動軍隊和組織義軍響應起義（那時如劉伯承元帥及呂超等一行都是由長江回川的）。十二月初我安排好了，正要動身，劉國佐從河內轉回上海了，說熊等均阻于河內，因唐繼堯派人來說，不許他們就到昆明。我知劉是個膽小鬼，仍按期出發。臨行前去找李根源晤談，據他所得的消息是：梁啟超等有布置，要蔡鍔逃出北京，到雲南聯唐倒袁，所以唐要等蔡出險後，才許熊等到昆明。李希望我到河內後一人單獨到昆明，或不會被阻，先去見唐，要他不待蔡到，先通電反對帝制；蔡到後再通電出兵。李說，“這樣方足以表示雲南和革命黨反對帝制是早就有聯絡的，何必許進步黨專美而掠奪革命的果實呢？我知道唐有點怕我，你告訴他，叫他儘管干，我李根源不會回雲南同他爭政權的。”我同鄒有章、王維綱、彭遠耀、傅常等到河內時，熊等已到河口；我到河口，聞昆明已派唐繼虞、鄧泰中來歡迎。

十二月中旬抵昆明後，熊一人住鄧泰中家，唐繼堯曾到鄧家與熊晤談，並約我去一同見面。唐問及各方面反對帝制的情况，熊特別給唐打氣說，“輿論上几乎是普遍反對的。照軍事上看，只要雲南出兵，把袁軍能戰部隊牽制在四川，兩廣一動，各地搖旗吶喊，袁世凱就垮了。”唐說，“蔡松公已由神戶向香港出發，不日可到昆明。”我趁此就把李根源勸唐先通電宣布反對袁氏稱帝、俟蔡公到後再聯名通電出兵的意見轉達，問唐以為如何。他說，“不行，因與松公早有計劃，必待他來，才能知道一切情况，才便于發動。”唐隨即說，“我打算先出兵而後宣布，已命和卿（鄧泰中別號）預備好，待松公到時，開了會議，請你們四川的朋友即隨同鄧團出發，進占叙府，不許後來北方增援部隊與四川的陳宦軍隊結合；我們大部隊伍，隨後向瀘州、重慶進擊。”並說，“出發時有所需要，儘管告知和卿。”

十九日，蔡同戴、王伯羣等到昆，当日晚唐即設筵宴請到昆的重要來客和他的重要將領，宴前先開會洽商討袁問題。在座的除蔡、戴、王三人及熊克武、李烈鈞、但懋辛、周官和外，其他是省長任可澄及滇軍將領共二三十人，其中我能記憶的有羅佩金、黃毓成、張子貞、劉祖武、楊蓁、鄧泰中，余皆不能記憶了。會議時先由唐介紹參加會議的人員，並說袁氏背叛民國，帝制自為，雲南有聲罪致討之責，是以早與蔡公有計劃，今蔡公已到，請蔡公將外邊的情形談談。蔡即談袁氏陰謀稱帝的經過，並說，他在北京統率辦事處供職時，各省一些督理軍務長官上表稱臣請袁做皇帝的文件，王士珍看了都遞給他看，每遞一件時，都以鄙薄的口吻說“這又是一個，”大家都是抱心非的態度，都懷疑這個皇帝是否做得成，至於一般的人則更沒有不反對的；所以只要雲南起義，聞風響應者必多，袁世凱一定被打倒，我們必先出其不意，從速發動，現在即商洽如何出兵的問題。隨即請戴戴將梁啟超所擬的討袁通電稿拿出來念了一遍，大家都說好，只有目前的情況與擬電時稍有不同，須略加修改。戴戴說，任公的文章，旁人何敢改他一字，須電請他自己改。有人說，這不是改文意，而是因情形有變動，只改一點名詞，時間迫促，無須如此周折。戴仍堅持。李烈鈞說，“可以不必，在坐的任可澄先生就是大手筆，請他改幾個字，恐怕任公也不會不滿吧？”大家都同意。次即提出出兵方略問題：定名為護國軍；設總司令一員，下設兩個軍，蔡鐸任第一軍總司令，出四川；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出廣西。唐要求出川作戰，留蔡坐鎮，總理一切，但滇軍內部將領反對。蔡說，“當然應由我出外作戰，此次戰爭最重要的是四川，只要北洋兵不能取勝，成相持之局，風聲所至，四方響應，袁政權就倒了。第一軍方面組織較大，擬分三路進攻：正面由我親率兩個梯

团从永宁进攻泸州；右翼由循若（戴戡字）回贵阳联络刘如舟（刘显世字）驱逐巡按使龙建章后，以第一軍右翼总司令名义率黔軍由綦江向重庆进攻；左翼总司令暫不設，先由第一梯团先行出发，迅速占领叙府后再定。”大家同意蔡鐸的提議。唐就說，“入川軍隊事先已有准备，以刘云峯为第一梯团长，下設两个支队，以邓泰中为第一支队长，以楊蓁为第二支队长，邓支队已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會議就此結束，举行宴会而散。

十二月二十日，邓泰中說，“唐总司令希望熊师长一行的同志們与第一支队同时出发，以便进入川境时召集旧属帮助作战。”我們一路先行的，有李蔚如、余际唐、邹有章、傅常、周官和、张冲、王維綱、彭竹軒、邓奠莖等，还有井勿幕等四人及四川其他一些同志随后跟进。另外楊森、向传义、张煦、刘光烈等則預定跟同蔡总司令到永宁。我們于十二月廿六日过东川时，得知昆明已宣布討袁了；到了昭通，已知第二支队和梯团部已出发跟进，并催促第一支队飞速前进，如遇敌抵抗，可相机进攻，无須俟梯团部的命令，但必須随时报告。我們到达盐津（老鴉滩）后，再过滩头新場即交四川界，据报四川界上燕子坡和我軍右側馬耳朵梁子两处險要均有敌人。我們四川籍的一行人就分头去和当地居民联系，一面了解敌情、地形及道路，一面向他們宣传云南起义討袁的意义，并且告訴他們說，前四川第五师长熊克武和我們都随同滇軍一路来四川，希望四川的父老子弟們都帮助滇軍打倒这个卖国贼。登时羣众欢欣鼓舞，有些就自告奋勇，愿当向导引队伍抄小路袭击敌人。我們了解敌情之后，即向敌进攻，因有人带路，出敌不意，不半日就把敌人据守的第一道險关突破了。从此跟追，在捧印村、橫江等地都沒有打仗，敵軍已退过金沙江，在对岸安边隔河而陣。我們到了橫江，有些沿途

的地方土紳如李乐伦、曾峻生、曾益周等也跟着跑来,指手划脚,要如何如何打敌人,李乐伦并介绍了一个巡防军的连长曾一清反正,带所部投效熊师长共同讨贼。我们在昆明动身时,唐继尧送了一支七响手枪与熊,黄毓成送一支同样的与我,这一下又有一连九子毛瑟枪的兵,我们这一支甩手五子队伍<sup>①</sup>,这时也感到威武起来了。

在横江时,杨慕率第二支队到了,就商量进攻安边的计划。那时渡船已被敌人收往彼岸去了,杨支队长自以为后到,愿率部在金江上游的蒹东一带选择地方渡河,从敌背面袭击敌人,要一支队隔江佯攻,牵制敌军。我们照此计划会同一支队向对岸敌人打了一天炮战之后,入夜我睡不着觉,便起来找新来的曾连长商量,问他的士兵中有没有本地人。他说原来奉命来防御滇军时,就在横江一带募集了十多名补了缺额。我说,“你去问问有无弄过船的船夫。他问后转来报告说有四五个,并且据他们说,下游十多里有一个渡口,有一只小船,但不知被敌人搞去没有。我说,“你去选三四个人,要他们到渡口去看。对岸如有敌人则船必不在;如船在,对岸必无敌人,就可乘夜渡江,避开敌人的哨兵警戒线,从小路绕过安边场后,侦察敌人跑了没有,务要拂晓前到达,并要派一有军事知识的排长同去。”过后我刚睡到天亮,忽闻河边上人声鼎沸,原来是那几个兵把对岸的船都撑过来了,连声大嚷“敌人已经跑了,赶快过河!”我们渡江后,因为大部队伍还需要经过一些时间才能渡完,而且还要等二支队和梯团部到达后才决定进攻叙府的计划,我们这一羣四川地头神就赶紧研究敌情,并考虑如何侦察敌军的实情。我说,“敌人如坚守叙府的话,安边这样的据点就不该轻易丢掉,因此我料敌不会坚守叙府。现在我们可分作两路:一路化装土

<sup>①</sup> 四川土语,“甩手”即空手“五子”即五子枪弹,意指空手编成的队伍。

人搭攬載船沿江而下，相機行動；一路從陸路偵察前進，如有敵情，專人回報。”大家同意照我的意見行事，地方上的士紳們，同叙府城內的人相識的很多，願意一同前往，李樂倫、張沖、王維綱、楊君良等就同他們一路去了。但等到第二天只收到陸路從柏樹溪送來的回報說，那里已無敵人，跟即向叙府偵察前進；但水路方面，毫無消息。第三天早，第二支隊陸續到達，一支隊第一營長李文漢和我們就向柏樹溪出發，剛到場口，王維綱等迎頭跑來，說敵人早就跑了，因不見我們的隊伍的動靜，才趕到轉來歡迎。我們就同李營進占叙府，其時系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八日（農曆乙卯年臘月十四日）。我們在叙了解情況，得知當面之敵初為伍祥禎混成旅，另配一部分漢軍（系巡防軍改編的，統領張占鴻，後為張鵬舞），當我軍開始作戰之際，伍部未大抵抗就節節退却，竟放棄叙府而不守。叙府與昆明的里程，大小二十四站，光是走路也要走二十四天，而我們一路作戰，只有二十六天就進占了叙府，直等於行軍而已，那里象作戰呢？聞當雲南出兵之際，四川軍務督理長官陳宦命伍旅前來迎戰，伍祥禎因系雲南人，不願對故鄉子弟兵作戰，所以他一直退到自流井去了。

## 二

第一梯團全部到達叙府休整之後，即在吊黃樓架起浮橋，預備向自流井進攻。據報一月中旬戴戡已聯合劉顯世把巡按使龍建章驅逐了，但到下句劉顯世才宣布獨立，出兵討袁，除王文華率一部向湖南進攻外，戴戡以護國軍第一軍右翼總司令的名義率領黔軍熊其勛混成旅向重慶進攻。蔡總司令到永寧後，二月一日，四川第二師師長劉存厚起義，隨蔡進攻瀘州。此時各地有些與原第五師熊克武師長有關係的地方團隊，如江安縣的蔡時敏、熊綬勳，況場的



倪煥文，安岳的藍大猷及呂超收編的陳華封等，都來請熊收編。關於這一部分軍隊的名義及如何組織成軍的問題，初擬稱為護國軍四川義勇軍，向劉梯團長商洽，劉雖同意，但楊綏支隊長持異議，認為如稱護國軍就應當用雲南的名義。而四川本省的團隊用外省的名義，大家認為也不妥當，況經費是我們自理，並未起餉，只支伙食費，於是暫且保留原來各地名義，分成兩部分，分別由周官和及呂超帶領，以便使用。不久，據探報自流井之敵軍大部已由白花場、打鐵壩一帶集中向宗場前進，意在攻占叙府。梯團長當命部隊迎擊，第一仗只打了一天就把敵人打退了，我軍未深追，就在宗場後方紮下。隔幾天敵人又來攻，又把他打退了。那時我隨時都同鄧支隊長一路，等於作他的參謀，當第二次打了勝仗後，我向鄧建議率領全部追擊，占領白花場，進窺自流井，但我們到打鐵壩之後，梯團部來命令，不許孤軍深入，仍令折回宗場就原陣地作戰，從此長了敵軍的威風。大約從二月中旬以後，敵軍完全採取攻勢，我軍採取守勢，完全變成了陣地戰，但我軍每戰則必勝，每次少則戰一日夜，多則戰三日夜，總在宗場打拉鋸戰。敵人隨後分三路來攻，人數越打越多。我軍只有一梯團，初只四營，過後加了一營，共五營。所幸敵軍三路並沒有同一天來攻，而是相差兩三天，所以我軍能利用時機，把敵軍各個擊破。此時劉梯團長以為我軍雖然每戰必勝，但戰鬥兵越戰越少，如由雲南募兵補充是困難的，同時他見川軍在配合滇軍襲擊敵人及輸送後勤等任務方面也還可用，因而他就請命于唐，委熊為護國軍四川招討軍司令。至此，我們才正式成立司令部，以但懋辛為參謀長，李蔚如以參謀兼軍法長，鄧奠瑩為秘書長，余際唐為軍需處長，張沖為副官長，另設一籌餉處，處長為吳適君。其餘人員都分各處安置，大体上都是機動使用，見啥做

啥，不一定拘守本位。熊司令并召集大家开会宣布，因处于非常时期，无所谓薪餉，官兵一样开大鍋飯，只医药由公家支付。下編两个支队，第一支队长周官和，第二支队长吕超，司令部直属两个独立連，其中是清一色的洋台枪，大約有六七十支，这就等于是炮队了。

約在二月底，敌军三路来攻，時間仅差一天，上游牛屎壩是朱敦五統領的巡防軍若干营，下游白塔山是北軍，正面是北軍和川軍鍾志鴻旅。先接触的是上游，那里是我們招討軍担任防御，滇軍仅派一营人加入作战，就把朱部敌军击潰了。第二天正面之敌大肆进攻，从朝至夜，均极猛烈。是夜二更后，梯团长来命令說，昨天下午白塔山方面之敌向我进攻，我軍只有一营兵力，万难支持，要我們退守南岸。其时邓支队长正在酣睡，呼之不应。我想那时敌军正在夜袭中，如我突然撤退，被敌跟追，則損失必大。当即代邓拟一回报，請梯团长令楊支队长率警卫排立即馳来前綫，于拂晓前到达，立即反攻，将敌击潰，然后撤退。嗣后邓睡醒起来，我将命令給他看，他說快下令照办。我說，“快天亮了，不能撤，”并将回梯团长的报告向他說明。不久楊素到了，立即传令全綫反攻，出敌不意，不到二十分鍾，敌军即全部潰退。当即派一营跟追，楊率两营向右侧馳援白塔山，然后把正面队伍撤回南岸。傍晚，白塔山之敌亦已被我击潰。我軍徐徐撤回南岸后数日，敌军尙无进攻消息。

三月初旬左右，泸州方面因进攻到兰田坝失利，已失掉了納溪。蔡总司令亲到大洲驛督战，因而在棉花坡一带打成了陣地战，忽来令要第一梯团派兵二营下去增援。梯团长馬上召集邓、楊两支队长和熊与我去秘商。大家认为叙府正面之敌虽已有六七天未来进攻，但如我調走两营，以后敌来攻时如何应付。两支队长虽然认为要服从总司令的命令，但經過一个多月的战斗，各营伤亡都

大，补充亦不够，不说抽两营走，即使不抽，如遇敌进攻，恐亦难于支持。因此，两支队长不作决定，推由梯团长解决。梯团部参谋长张璧主张遵令派两营下去。刘梯团长就问我，“但先生有什么意见？”我说，“泸州是蔡总司令亲自对敌，那里的战事的得失比叙府重要。如要去稳定阵线，打破敌人，不如只要留一营在叙，其余四营都下去，使那边速获胜利，如此则叙府不足虑。我们沿江而守，敌来进攻时，我们能守多久就守多久，以待下面打胜仗。万一不守，我们退到横江，仍可与敌隔河而阵，亦可多熬时日，以观变化。”我发言后，杨慕大为不悦，连说“那我就不管。”刘梯团长又找各营营长面谈，营长们都愿下去，但两支队长都不愿去。此四营下去之后，蔡总司令命令反攻，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抽兵回叙，势已不可能。而敌人方面又加了冯玉祥旅来攻取叙府，隔河炮战了一日。入夜之后，城内派人来说：两支队长已经负气而去，梯团部亦随即撤退，叫我们自己相机决定进止。此时招讨军士气已馁，那能单独支持，即下令沿江守兵陆续撤退，但规定必须以少数兵力支持至夜半十二时。叙府从此陷入敌手。我们到了横江之后，第二支队的田鍾谷营长向我说，“杨映波（杨慕的别号）大怪你们吹牛皮，说什么反对帝制冯国璋都赞成，陆荣廷一定会响应起义。今云南打了两个多月的仗，而广西不但不响应，而且放龙覲光攻入了云南的剥隘，开化、临安一带都震动了。他要回昆明向唐建议，取消独立，把你们这批吹牛的乱党杀了来立功赎罪。”我说，“那末何以对蔡总司令呢？这样配作革命军人吗？”田说，“我也是这样想，所以不跟他一路走。”我问他打算如何，他说，将同梯团部驻盐津县，听候蔡总司令的命令。我们带着队伍，向筠连、庆符一带择地驻紮，司令部驻建武城。三月底以后，得知蔡与陈宦协议停战一周，袁世凯已

取消帝制，仍做總統。三月中旬我退入建武的途中時，聞陸榮廷已起義響應護國軍，還聽說楊、鄧兩支隊長在回昆明途中走到昭通大關時，被唐去電阻止，挨了一頓臭罵，正在進退兩難中。我們在建武駐下後，井勿幕要到大洲驛見蔡，我們派了兩個差遣同他一道去，並將我軍退出叙府後一切情形，寫了一份報告請他代呈總司令，有何情形亦望他寫信速交差遣帶回。四月初旬，井勿幕來信說他要回陝西策動陳樹藩獨立，並說陳官已與蔡協議，停戰期限現又延長一個月，陳將派代表劉一清、雷飈來與蔡面商一切。我們得到這個消息之後，熊克武就同司令部的同人商談。我們估計目前的局勢，戰爭可能不致再打，要打亦不必久駐建武城，于是就移駐庆符縣的沙河驛，整理隊伍，籌劃餉糈。到了五月初旬，據報陳的代表與蔡會商後，停戰期限又延長一個月。熊司令派我到沙河驛謁蔡總司令報告經過，並探詢省外對袁的態度。蔡面問我軍編制情況，我說仍只兩個支隊，我們主張充實，而不願虛張，蔡點頭稱善。他因喉結核病失音，即命秘書長李子暢來把省外一切消息告知我。過後我還去見了劉存厚。

我回沙河驛後，見繼任我的參謀長職務的盧師締不在。我問熊克武，熊說挽留不住，只好聽他去。盧是叙府將失陷前幾天到的，他到後我非常歡迎，並建議熊委他作參謀長。我向盧表示，我們為了革命，必須團結合作。盧原是老五師的第十八團團長，民二討袁失敗之後，他參加了中華革命黨，又是謝持領導的小團體中的人。他們不滿意熊參加歐事研究會，說熊是小黃興。他本是中山先生委的四川革命軍總司令，所以他到了叙府，我們就歡迎他，以為可以合作。那知當時他不過是借路過的，他與熊鬧分歧，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 三

五月二十二日陈宦宣布独立后不久，我們得左翼总司令罗佩金通知，說袁世凱委周駿为崇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务，四川陸軍第一师改編为中央陸軍第十五师，以王陵基为师長兼重慶鎮守使，周、王將進兵成都攻击陈宦，要我軍到自流井集中待命。我們立即移动，当經過南溪时，刘存厚的司令部送了一通唐繼堯与滇軍將領的密电与熊，除說努力打倒周駿外，还表示四川軍政权無論属于蔡公或属他人，滇軍必須駐在四川，不能撤回云南。刘所以抄此电与熊，其意是要我們了解唐之用心，也就隱伏了他于周駿打陈宦时坐在新津不动以及周敗后他先入省城，后来又打罗佩金及戴戡的綫索。六月中旬，我們到了自流井，已知袁世凱已于本月六日斃命，同时奉罗佩金的命令，說周駿、王陵基奉袁世凱的伪命率兵进攻陈宦，陈不战而逃，現在非驅逐周、王不可，决定以顧品珍梯团攻資中，以雷飈梯团攻內江，以招討軍攻隆昌，并即分头出发，三路互相聯絡，互相支援。熊命我作临时指揮，当我受到这个任务时，探得隆昌之敌，系刘湘旅所属的陈允彝团及一部汉軍。陈号称陈蛮子，是刘旅的精銳，武器好，又能战，我軍实力与之比較，当然很差。既然要我作临时指揮，就必须鼓动士气。我說，第一，周、王奉的是袁賊的死命；第二，敌人是一字长蛇陣；第三，我們的友軍都在分段拦腰袭击敌人；因此，敌必敗潰无疑。从我軍当面之敌說，在战术上我不敢打保票必胜，却敢說只要能稳，敌即敗矣。当战争开始时，敌軍边打边退，我軍节节胜利，到了隆昌不远，敌軍固守一个陣地，有两挺机关枪、一門山炮。我軍攻至下午五、六时，不能得手。我把我的总預备队两个独立連帶上前綫，将六七十支洋台枪向敌人的机关枪

陣地一齐发射,不久就把敌人打垮了。追至隆昌附近已入夜,相持至晚十时左右,敌人突然反攻,大炮、机枪齐发,火力甚猛。周官和來說,我們的队伍已經垮下来了。我說,“不行,赶紧堵住,就原地布防,深夜敌人必不敢追,而且乱放大炮,一定是欲退佯进之意,并速派人与左翼呂支队取联系。”拂晓,敌人果全部向榮昌、永川退去,我立命周支队向榮昌跟踪追击。次日得內江消息,內江已下,有一汉軍营陈营长經我們的同志謝思九的策动,开城投降。雷梯团已去助攻資中,要我軍赶紧跟进。我們的任务是从沱江东岸拊敌之背,但我們到达时,資中之敌已敗潰,敌旅长黃鵠举陣亡。我們到了簡阳时,罗佩金率顧、雷两梯团已到成都,周、王从北路潰逃。

#### 四

七月中旬,我們在簡阳得到成都消息說,刘存厚有迎蔡拒罗之意,同时蔡鐸已发表为四川軍务督办,罗已急电泸州催蔡从速晉省。我同熊商量就駐在簡阳,等蔡到时再决定进止,并会商向蔡报告在隆昌一带的战争經過以及今后如何自处的問題。我說,“此次討袁,我們革命党沒有取得一个省为根据地。我們虽在云南首先参加起义,而这又是进步党事先有准备的,如蔡不到昆明,唐还是犹豫不决的,可見我党已經成了附属品,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成功的希望,这次又落空了。我們組成的这点軍队,虽也尽了一些帮助搖旗呐喊的力量,也万不能以此居功,因为沒有滇軍起义,我們自己是不能建立起这支軍队的。我們不知蔡對我們的感想如何,但我們必須先行表示呈請裁遣,自願告退。”熊与各同志均以为然,于是将呈文及表册备好,等待蔡到时熊和我就去請見。当見面时,熊略述經過,将呈文面交后,蔡問現有軍队多少,熊答仍只两个支队。

蔡說，“那好，現在万不能說告退，以四川局勢來看，仰仗的事甚多。”當將呈文退還，并囑跟即到省后再行詳商辦法。我們到省后不久，蔡約熊和我去同羅佩金等面談，并以川東起義的地方勢力甚多，希望熊去整理。蔡先要熊作川軍第一師師長，征求熊的意見。熊在遲疑間，我就說，該師是原十七鎮的底子，兩次討袁時他們都與革命的第五師作戰，這樣做恐不相宜。蔡問，“那用誰好呢？”熊說，以該師歷史來看，是否可找周道剛作師長。蔡說，“好，那末我現在擬保荐你作重慶鎮守使，編師事請以后與鎔軒（羅佩金別號）洽商辦理。”隨即蔡又說，“中央方面原要我入閣辦事，后又要我把川事整理就緒才去。這次因為到省城清查檔案，我感到四川局勢關係西南太大，而今后全國的問題正多，不知如何變化，不如將西南整理好了，可以轉移全國的局勢。因此，我立即要去日本就醫，以便早日回川任職，決心不到中央做事了。川事暫由鎔軒與循若協商整理。錦帆先生，你是四川人，務望特別幫助，川東事務繁重，尤望耐心處理。”

蔡去后，羅約熊和我去面商。他說，“關於四川各軍編師事，已由蔡公電周道剛回川領第一師，第二師仍然是劉存厚，第三師是鍾體道。至於第四師問題，因陳二庵（陳宦別號）獨立時委了楊維為一師師長，盧師絳為第四師師長，這次擬合編成為第四師。至第五師師長就由錦帆兄兼任。可是中央規定四川只允許仍編三個師、一個混成旅，如今已有五個師，將來一定要縮編的。如到川東改編地方部隊時，最好將所有雜槍仍歸還地方；如編多了，縮編時要發生困難。”羅又說，“錦帆兄，你要知道，此次松公最嘉許你的是，經過半年多的戰爭，你仍然是兩個支隊，而且在隆昌還能作戰，認為你是國家人才。今后望你好好干。”熊一一答應，羅即囑如無另外

之事,望早早准备到重庆。不几天,熊的第五师师长就发表了。

八月中旬后,我們应办的事都已办完,行将启程东下时,发生楊維与卢师諦因关于一、四两师合并改編的問題,相持不下,督署来电话,希望熊多留几天,从中調解,同时楊、卢亦以过去同盟会老友的关系,皆請熊向罗督善为說詞。楊以为自己过去有革命历史,此次护国軍起,他在灌县起义后,在省垣附近发动起义軍,因而迫使陈宦独立,并占領了兵工厂,而且为了保护該厂与王陵基作过战,論功該他做师长。卢則以他原是中山先生早就委派的四川革命軍总司令,是真正的革命党人,而且此次护国,他策动王靖澄以一个連在风洞子起义,随后并在省垣附近組織义軍,才迫使陈宦宣布独立,因而认为这个师长非他当不可。此事經熊反复劝解并与督署往返多次商洽,最后以楊过去曾当过四川省巡警总监,此次起义,警务界人員最多,不如仍在警界安置。楊认为只要不編归第四师,而部下又有安置,本人可以退让。罗督亦允对楊另外任用,至于第四师以后如何編制,俟拟訂办法后再行发表。此事費了十多天的工夫,总算告一段落。我們八月底动身下重庆,九月十五日到达。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二日,民国二年討袁失敗,熊正是这一天出走的,以討袁失敗始和討袁胜利終,恰恰滿三年,并且还恢复了第五师的名义。

以上所述,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回忆起来,当然不够全面,錯漏在所难免,而且因为是在病榻上写成的,边想边写,因精力不佳,有一些不关紧要的也就从略了。如有同志們据所知而加以指正,这是笔者所仰望的。

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記于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大楼第五病室第五病床。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 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譯本的来历

王家楨

一九二八年八月，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設总部于沈阳大帅府旧址（后改称东北边防长官公署），我被任为外交秘书主任，襄助他办理对日外交事宜。在总部秘书厅下設立了外交秘书主任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員，除了几个資望較深的秘书如陶尚銘、杜重远、陈曙升、宁恩承等人不按时上班外，尚有二十多个工作人員（秘书、科长、科員、办事員）都懂日文，大多数是留日学生出身。我們的具体工作一方面是办理对日交涉事务，另一方面就是对日本問題的研究和翻譯。我們訂了差不多所有的日本主要报纸和杂志，并和南滿鐵路公司經濟研究所取得联系，可以借閱他們的資料。我們按日按周将有关东北的評論和主要新聞摘要譯出作为参考，或者裁剪报纸杂志材料編些具体資料保存，还选些比較有参考价值的文件，或有宣传价值的小册子譯成单行本，有的公开散发，有的仅供内部参考。記得我在沈阳二年多的工作期間，我們印了这种单行本共二十多种。当然，所有印出的文件或小册子都要由张学良亲自审閱批准。这一道手續有时候他竟拖延很久。因为他当时身体很不好，送給他核閱的文件若是长一点，必須几次三番催他，才能核定。有一次我們全办公室的人費了差不多好几个月的時間，譯出了两大厚本滿鐵經濟研究所内部文件《滿蒙經濟資源調查》，

共百万字以上。这个文件,当时我认为很有价值,因为这些资料全是滿鉄花了很多錢、派了很多入調查得来的原始資料。譯好后我們將原稿裝訂成兩冊,准备經核准后付印,分送各方面参考。我將這兩冊原稿交張學良審閱,并說明它的重要性。他接過去就放在寢室窗台上,許久未動,后来竟把上冊丢失,白費了同事們的多日辛勞。

這年年尾前后,我們的駐東京辦事人(日籍台灣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國觀念很強)分批給我寄來一些文件,另外写信來說:這是絕對秘密的文件,是他的朋友在某政黨干事長的家里當書記抄写得來的,只能分批寄來。原來這個文件,就是由政友會新選出來的總裁田中義一大將在大連召開的東方會議的一部分會議秘密記錄,經整理后以奏摺形式奏呈日本天皇的,我就給它起名為《田中奏摺》。這個文件,大概是分十餘次寄來的,每次的相距時間是兩個星期左右。因為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錯字錯句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易閱讀,而且語氣夸誕,例如開頭就說“要征服全世界,就必須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就必須先征服滿蒙”,等等。但是后来才逐漸覺察到,這個文件不是個尋常的偽制品,因為內容所提到的好些具體事實,以及為了推行它的侵略政策所採取的措施,都是合乎邏輯的發展,特別是關於滿蒙的經濟開發,全是用嚴格的科學方法加以闡述的;對於某某蒙古王爺的密契也全是事實。我這才將寄來的稿件交給辦公室分段先行譯出,然後再將意義不明瞭或是脫字脫句的地方,逐一經過研究,加以添補。稿子全部到齊,經過翻譯整理,訂成為一個完整的文件,已經是一九二九年的春天了。這次我將原稿面呈張學良,說明了它的內容和它的重要性,就請他當時批准了。因為是極密文件,特在官銀錢號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

紙六开大本裝訂，共只印二百本，發給在東北範圍內簡任級有實職的人員每人一本，送給南京國民政府四本（當時共發出一百廿本，其餘存在我家）。

這個秘密文件，內容很多，除了關於政治部分外，關於滿蒙經濟的策劃很值得我們參考；特別是日本對於東北管轄下的盟旗所聯系的王公人名與採取行動的具體方針，都有較詳盡的記載。我們當時將這個文件作為極密文件，只發給東北政治上負責的人員，原來是想叫這些負責人知道日本人的陰謀，好作為採取對策時的參考，根本沒有想拿它作為宣傳材料來激勵人心，更沒有想到拿它作為在國際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有力武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按照我們原來所設想的利用這個文件的効果，倒不那麼大。當然，也不是說一點都沒得到，例如文件所說的與某項陰謀有關的一個蒙古王爺，被我們逮捕後所作的口供，和文件上所說的一樣，因而使這一陰謀未能得逞。可是這個文件後來成了宣傳資料，對於國內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文件最初公開和公眾見面的，是由南京某愛國人士摘要翻印的小冊子。最初的小冊子印得不好，並且將關於經濟部分和具體事例統統略去，反而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好象是我們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野心而故意製造出來似的。再加上龐大的日本宣傳機器千方百計地極力否認，說這個文件是偽造的。西方各國的輿論界，也以他們的主觀看法，不相信日本島國能有如此與它的國力不相適應的侵略野心，認為這是宣傳品。九一八事變後，在日內瓦國際聯盟開會期間，中國代表顏惠慶有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有一名記者問到這個文件時，他也閃爍其辭，不作全稱肯定的答復。招待會後我將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講給他聽，他才解除了疑竇。到了下一次記

者招待会，他就主动地向記者們說明这个文件是如何的真实。他說：“当你去一个小戏院看戏，在入門时，給你一张节目单，节目单上印的有意大利的‘欧貝拉’，俄罗斯的‘芭蕾舞’，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你看了这张节目单，一定发生疑惑，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你觉得这样一个小戏院，怎么可能演出这样的大节目呢？可是，幕拉开了，演出的正是节目单上的第一个項目，那么，你对节目单的以后項目，还能有怀疑的余地嗎？”顏惠庆的这番談話博得了記者們的鼓掌。以后西方的报纸与杂志常常引用这个文件来評論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有时官方的文件也有拿这个文件作論証的。战后日本共产党正式証明了这个文件的真实性。《田中奏摺》被譯成中文的簡單經過，就是这样。

現在再談談与这个文件相匹敌的第二个秘密文件，就是《金谷范三国防論》。这个名字也是我給它起的。原来这是当时日本參謀本部次官金谷范三中将以他个人名义写的一本具有政策性的国防計劃，内容很丰富，計劃很具体。作战的对象是大陆，以陆軍为主，也就是以中国和苏联为主要对象。对于敌情的估計，各种兵种如何配备，单独作战及联合作战的設想，日本最大限度的兵力，以如何比例对付中国，以如何比例对付苏联等等，全有較詳尽的叙述。它是日本參謀本部极端秘密的内部参考文件，不过好象已印成小册子。駐东京办事人寄来这份文件时，虽然也是手抄本，但抄得很清楚，也很少有脫字錯句。我这次很快地就譯成中文，請张学良核准印成单行本，作为一种极秘文件。因为第一，这个文件有条理，有分析，根据具体事实作出具体計劃；第二，金谷范三中将是当时日本軍界有名的战略家，有关世界軍事問題的权威，參謀本部現任的次官。日本參謀本部的总头——參謀总长，全是由亲王担任，当

时參謀总長閑院宮殿下，只不过是一块空招牌，实权完全操在这位次官手里。可以说，金谷范三就是当时日本陆军的灵魂。因此，我一阅读这个文件，就断定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将它译成单行本就是想叫我们的军事家们好好参考参考。所可惜的，这个秘密军事文件，在东北的军界里并未发生什么作用，从来没听到东北军人谈起。当然，也不止是这个文件，任何我们办公室所出的小册子或文件，全没有引起当时东北有权有责的人们注意过，或是争论过。恐怕收到这些文件的人们，十人中有一人能仔细看一看，就算很不错了。记得当《田中奏摺》密件印出分送了很久的时候，我问秘书长王树翰的意见，王说：“我那有时间看这些‘闲书’呀！”南京方面当时对于《金谷范三国防论》倒很重视，据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做参謀次长的东北高级军人鲍文樾告诉我说：蒋介石非常重视这本小册子，鲍已令参謀部翻印发给各军事负责长官，作为秘密参考文件，并且问我东北买到这样的秘密文件花了多少钱。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有一位军人朋友向我说：“日寇侵略军的侵华战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金谷范三国防论》的范围之外。”由于这两个具体例子来看，我们可以说，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对于我国对日军事的研究方面也曾起过一定的参考作用的。

## 北京同仁堂的回顧与展望

樂 松 生

北京同仁堂創辦于清康熙七年己酉(公元一六六九年),到現在已經有二百九十一年的历史了。众所周知,同仁堂藥舖是乐姓創辦的,并且世代相传,故又称为乐家老舖。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乐姓的后代子孙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開設分号。为了保存同仁堂这块独一无二的老招牌,我家各房共議:“開設分号时,不准用同仁堂的名义,但可以用乐家老舖的招牌。”这样,乐家老舖的分号就遍布于全国各大城市了。

同仁堂是在封建皇朝长期統治下成长的,后来它虽然經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統治时代,但一直到解放以前,它还是保存了古老的封建性企业的特色,主要是家店不分;而乐家老舖的分号如达仁堂,則走上了資本主义經營方式的道路。

两百多年来,同仁堂繼承了祖国几千年来的医药文化遗产,积累了制藥工人丰富的經驗,因此,它所生产的丸、散、膏、丹,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信誉。解放后,特別在公私合营后,在党的关于繼承和发揚祖国医药文化遗产政策的照耀下,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經過全体职工的努力,同仁堂的事业在各方面已經有了根本的变化和很大的发展。如中藥提炼厂的設立,就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它在中西結合的方針指导下,为中藥西制开辟了一条新

的道路。这不但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以便更加广泛地为人民的保健事业服务，而且制出的成品既便于服用、保存和携带，又能保持原效或提高原效。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后还有待于进一步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吸取各地经验，在各地医药工作者的协助下，使中药的提炼工作得到不断的改进。

我现在分为三部分来略述同仁堂的梗概，即同仁堂的沿革，同仁堂的丸散膏丹，和同仁堂的改造与发展前途。由于时代隔得太久远，许多事情已经搞不太清楚，我只能从家人的口述中，同仁堂保存的一部分文献中，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有兴趣研究这样一个封建性企业的人们提供一些资料，以备参考。

## （一）同仁堂的沿革

### 同仁堂的创办

我们乐姓原籍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人，明永乐年间移居北京。我家原以串铃走方医为业。清初，四世祖乐尊育（一六三〇年——一六八八年）当了太医院吏目，五世祖乐梧岡（一六六一年——一七四二年）因乡试落第，乃继承先人遗志，开设了同仁堂药室。在同仁堂药目中有五世祖乐梧岡在康熙四十四年丙戌（一七〇六年）撰写的一篇序言，对此有所说明：

“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先君号尊育，为太医院吏目，秉性朴诚，居躬简约，喜阅方书，辨药味地道疑似。尝语人曰：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平日汲汲济世，兢兢小心，凡所有丸散，无不依方炮制，取效有年。每庭训余，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又曰：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予业举子碌碌三十余年，先君之训，几忘之矣。壬

午乡比后，闲居无事，追忆昔年遺訓，翻然勃然鼓舞而为之，遂立同仁堂藥室焉。汲汲济世，兢兢小心，虽不能承先人万一，而至于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貴，必不敢減物力。可以质鬼神，可以应病症，庶无忝先君之志也。”

关于同仁堂創办的年代，根据藥目叙中說，是康熙四十年壬午（一七〇二年）。我們为什么說是康熙七年己酉（一六六九年）呢？那是根据現在正阳門外大柵栏同仁堂門市部悬挂的一块康熙己酉年的老匾而来的。这块老匾在清光緒庚子年（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义，火烧前門外时，由柜上的管貨員张翊亭从火中救出，存放在后院，才沒有被烧毁。因此，我們一向是以那块老匾的年代为准的。那块老匾很可能是四世祖乐尊育立的，并且在那时已开始制藥济世。五世祖乐梧岡在三十三年后，才繼承先人遺志，在正阳門外大柵栏正式開設了同仁堂藥室。因此，藥目叙言中的年代和老匾的年代有所不同。

### 供奉御藥房

同仁堂開設以后，由于名气很大，在清朝雍正年間（一七二三年左右）就开始供奉御藥房了。應該說，同仁堂由于供奉御藥房而享受了封建特权，这是同仁堂所以几百年来罔替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同仁堂文獻所載，雍正年間曾奏請預領官銀四万两，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曾奏請增添三分之一藥价，每年預領过官銀三千两。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又复呈請調剂藥价，預領官銀，每次得預支官銀一千两。这些零星的材料，可以說明同仁堂在經濟方面曾經得到封建皇朝的支持。当然預領官銀必須交办官用藥料，但在同仁堂內部資金的周轉方面是有好处的。更重要



的是在政治方面的支持。这里举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乐张氏(六世祖乐礼之妻)的一个呈文为例来说明问题。

“身夫乐礼,原承先业开设同仁堂药铺,承办官药有年。缘身夫在日所欠官项债负颇多,以致铺务难支,具呈告退官药。蒙皇恩准着都院出示招商,并无承办之人。复蒙和硕和亲王奏准增价,仍着身夫办理,特派内务府官员监办官银官药,弹压一应私债,不得搅扰,已经数年。不期夫故,官项客账铺务家计实难措办。蒙监办关老爷借给本银五千两入铺,分发官银客账。长子以正立有券押,议定在铺抽还。未及一半,惨遭上年四月间忽被天灾,铺业烧毁,长子继亡,将家产入官归偿资生库。一门孤寡(尚有幼子以中),坐守待毙。复蒙天恩垂怜,将所焚铺基并堆房残货,仍赏身养活孤孀,复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办。官药客账私债准着十年后带销。今虽有商人接办,每日给制钱一千文,尚不敷房租日用。虽议二成分息,但铺初开,盈虚难必,客账私债,实难指许。容待年余,如果获利,将二股分息多寡均同分偿。天理良心,岂敢隐负。为此乞求大人鉴怜,恤念孤孀,俯赐宽限,合家感德,顶祝上呈。”

在这个呈文中说明,乐姓在乾隆十八年因遭天灾人祸之变,已到山穷水尽之地,由于封建皇朝的需要,才又将同仁堂这块招牌承继下去。那时招商承办同仁堂的人是乐姓的世交张世基。张姓自出资本修理开设之后,也得到官府的很大支持。后来张姓又将自己的一部分股本陆续出卖与他姓,他自己专门供奉御药房,承办官药。这已是乾隆、嘉庆年间的事了。这样同仁堂的外股就越来越多。在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的一张废合同上,股东二十一人,入本银四万三千八百两,每股一千二百两,尚有同仁堂的管事人员及众伙友的人力股十股,共为四十六股五厘,系合股经营

方式,那时乐姓只剩有半股,典价为四万七千七百两。到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同仁堂又典与朱姓经营,价银六万两。总之,从乾隆十八年到先曾祖乐印川在道光年间恢复祖业为止的百余年中,同仁堂迭经变故,只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同仁堂这块招牌始终属于乐姓,因此,乐姓称为同仁堂铺东。张姓从乾隆十八年供奉御药房后,也是世代相传,并得到乐姓的支持,称为同仁堂药商。民国成立后,“商人张”的称号才改为职员在同仁堂内管账。

关于供奉御药房,家人还有一个传说:雍正年间,由于皇朝亲兄弟之间的暗害残杀,硬说吃错了同仁堂的药,而将乐姓某人梟首于菜市口。有的说,因为是徒弟拿错了药,所以后来同仁堂不用徒弟。

同仁堂是在封建皇朝长期统治之下成长的,又有着供奉御药房的关系,享受到一定的封建特权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对于乐姓来说,是祸是福,各有不同的看法。上面家人中的那个传说,是认为一种祸害的反映。特别自清光绪年后清皇朝还欠了同仁堂一大笔账,计自光绪元年起至民国元年止,年例四季奏销款,以及自光绪二十七年回鑾后起至民国元年止垫办长春、储秀、乾清三宫和颐和园药价,除已领外,共欠领药价实银十八万七千三百八十七两五钱七分二厘,和制钱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三十四吊二百文。但那时候我家已经很富裕,不愿再出头去找麻烦要账了。

### 乐印川起家

先曾祖乐印川(一八一〇年——一八八〇年),名平泉,字清安,印川是他的号。为了说明他恢复祖业的经过,这里需要略述我的家世。

在清初,我家开设同仁堂药铺的同时,或者更早些,还开设了

万全堂药铺。这是现在崇文门外的万全堂药铺也称为乐家老铺的原因。创办同仁堂药铺的五世祖乐梧岡(名凤鸣)有兄弟四人;其中凤仪应该是开设万全堂药铺的人。因为在同仁堂文献中保存了一套在乾隆年间由凤仪之孙将万全堂出卖倒租与他姓的契约,在嘉庆年间又有凤仪的第四代析产分家卖绝的字据。印川是凤仪的第五代。凤仪之孙,即印川之曾祖乐毓秀有兄弟六人,他本人是乾隆年间的名士,著有槐亭古文存往集诗稿,娶满族贵族女紐祜祿氏为妻。凤仪的第四代,即印川之父乐嵩年有兄弟八人,他本人是嘉庆庚午年的举人,他在中举之年即行病故,印川是他的遗腹子。我所以不憚煩瑣地叙述我的家世,主要想说明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人口多反而不是好事,大家不事生产,竟想走上仕宦之途。以万全堂为例,结果是把祖业卖绝了。相反的,创办同仁堂的凤鸣这一支,几乎几代都是单传,并且常常陷于孤儿寡妇的境地,他们为了维持生活,紧紧地保持了同仁堂这块招牌,守住了祖业。因此,我认为单传是同仁堂几百年来罔替不衰的又一原因。

乐印川是在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继承凤鸣的第四代乐百龄名下为嗣的。那时乐百龄已死,只遗一女。百龄之母将印川继承为孙后,于第二年亦去世。印川本可独得同仁堂产业,但他还是与凤仪的后代——即他的族兄们共立议单一纸,分出同仁堂的租金若干与族兄们,以示手足之意,并免去以后的纠葛。在这张议单上可以看出当时同仁堂的情况与他处理问题的手段。现摘录如下:

“……伏思先祖所遗,别无财产,惟有同仁堂药铺一座,又积累亏空,众东附本銀六万数千余两。另因无力承做,将铺底家具作抵租出,每日淨取字号錢五吊。只此余貲,清安理应承担,以便接續

香烟,修理坟墓。且焚焚子妹,将来嫁资,尤须从厚,始足上慰先灵。年中用度,尚恐不敷,但念族兄等誼属連枝,兼其手素。今清安将每月字号錢分出五十吊文,分給乐洵、乐淑、乐定元三兄各家錢十五吊文,外給侄存仅錢五吊文,以副睦恤宗族之义,并杜后昆季爭竞之端。……其錢每月在同仁堂凭折取用。公同議定,同仁堂药鋪永为清安世业鋪底,家具亏空賠賺,均与族兄三家无干。”

乐印川将家务安排妥当后,就設法恢复祖业。前面說过,道光十一年,同仁堂會典与朱姓。当时书面立典据的是乐百齡之母乐門张氏,朱姓是当时同仁堂的領事人。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朱姓将买卖做賠,逃赴他乡。于是印川与朱姓之子和鋪内人定約,将鋪业收回。但他收回后,仍不自行經營,又典与滿人庆姓名下为业。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他又租与慎有堂张姓及董启泰二人經營。他自己却开设了一个广仁堂药室以与同仁堂相抗衡。經營同仁堂的董启泰在慎有堂张姓于道光十九年病故后,感到独力难支,又受到广仁药室的威胁,經亲友說合,就与乐印川訂約,将广仁药室关闭,全部倒給同仁堂。这个契約上載明:“广仁所存貨物照行价作銀均卖与同仁堂收用,其銀一年内归还。所有广仁向有痧子药、平安丸、臥龙丹、再造丸、涌泉膏、普济丹、万应錠、固本膏、礪砂膏、返魂丹、宁坤丸、瓜子眼药、七厘散等,同众言明,由乐清安自行配合,交付同仁堂永远代卖。以上数药言明不許同仁堂自为添配,言明每月得价一千,交乐清安錢六百,于每月初归交清楚。”

这是先曾祖乐印川在排挤外股、恢复祖业中最利害的一手。在道光十四年朱姓逃走後,他所以不自行經營,那是因为力量还不够。他于是用寄卖丸药的方法,积累了相当的資本,来图謀恢复祖

业。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董启泰终于支持不下去，不得不立推还契约与原业主，由乐清安开张管业。在那个推还契约上曾说明当时同仁堂的资金情况：

“立推还契约董启泰，前于道光十七年十二月间，同慎有堂合租得乐清安祖遗同仁堂药室乐家老铺一座，议明每日乐宅在铺中取租京钱五千文。所有铺内货物，同众结算冲销过，铺中实亏银八万零五百四十两，开列清单各执。嗣因慎有堂张于十九年十一月间病故，遂将合租同仁堂铺事推与董启泰一人自办。因生意萧疎，致有日亏一日，不能支持，情愿推还与原业主乐清安与官商张大铺(张世基之孙)自开。仍邀同各行主公盘公算，物货价值抵销外，实亏欠共银八万四千三百九十六两三钱八分。除原亏银八万零五百四十两外，实新亏市平银三千八百五十六两三钱八分。今董启泰一时不能措偿，情愿立有亲笔欠票一张，交与原业主收存，以便将来陆续归还。”

印川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的人，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之下，终他的一生，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全部清偿，并且营业日有起色，声誉卓著，奠定了同仁堂稳固的基础。现在将他的经营管理和筹措资金的办法，叙述几点如下：

一、确立了一套“自东自掌”的经营管理制度，一切不假手外人，从秤药到配药，都要亲自监督；购买药材也要亲自经手；嫁到乐家的妇女，都要参加包金裹药的工作。从此同仁堂不用徒弟，不用资方代理人，不许子孙经营其他业务如当铺、饭馆等，成为祖训家规。

二、创造了一套对外宣传的办法。清例，北京城内每年要挖城沟一次，每次约需一月时间。他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宣传活

动，在四城門开沟的地方設立沟灯。每当夜晚，同仁堂的紅字大灯籠到处照耀，既便利了行人，也給人很深的印象。遇到会試的时候，他向全国各地来京应試的人們贈送葯品，所送不多，宣传效果則很大。同仁堂的葯也就推銷到了全国各地。他也做了不少慈善事业，如冬設粥厂，夏送暑葯，办义学，施义材等。这样，同仁堂的名字也就深入到貧苦羣众的阶层中去了。此外，他又在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葯王生日”大宴宾客，請名角唱戏，以抬高同仁堂的声价。总之，他的宣传办法，是深入到上中下各阶层，而且遍及于全国各地的。

三、在他筹集資金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得到了当时葯材业的支持。当时北京有四大葯行，名天汇、天成、隆盛、汇丰。由于印川的精明能干，和同仁堂的信誉卓著，四大葯行都乐与之来往。他可以先用貨，后付款，几千两銀子的通融是常有的事情。除了以上四大葯行而外，河南杜盛兴的麝香业对他的支持最大。葯鋪有了充足的葯材来源，問題就解决大半了。

四、他曾兼理錢鋪掌柜，因此，資金活动方面就更有办法。在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的一个文告上說：“外滿洲火器营翼长穆，为知照事，今奉王爷面諭，現在本广通錢鋪中一切事务，著准其广亨錢鋪之掌柜乐印川兼行照管等因，相应知照广亨錢鋪可也。”这說明他同时兼理两个錢鋪的掌柜。在同仁堂的文献中，由印川出名的借据最多，但有借有还，笔笔都有着落。这也可說明他当时在資金活动方面的信誉。

五、他又捐了官銜，以便与官府往来。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乐印川已是四品銜的官职。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他又捐米八十六石四斗，銀票四百三十二两，得到从二品典封。虽然

不是实职,但有了頂带,也就更加声势烜赫,而有利于同仁堂的經營了。

#### 四大房共管

印川有子四人,名孟繁、仲繁、叔繁、季繁,称为四大房。他于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逝世后,由先曾祖母許氏主持家事鋪事达二十余年之久。她出身名門,但一切都能亲自操作。如每日先生們(同仁堂高級职工的称号)的三餐飯都要經她亲自过目,每日先生們前来交賬,她必亲自迎送。在她的主持下,四大房都能相安无事。因此,同仁堂的事业也得到了繼續巩固和发展。

清光緒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八国联軍入侵北京时,她曾率領全家避难太原。当时同仁堂由查柜(高級職員)刘輔庭留京代为照管。大柵栏同仁堂曾被烧去鋪面前庭,打磨厂新开路住宅駐有德軍,家中医书、家具等被毀殆尽。据同仁堂庚子年賬簿中記載,同仁堂曾被迫供应德軍官一应飲食起居。又据刘輔庭日記載:美国兵每日三五成羣,前来同仁堂索取飲酒,必烂醉而归,騷扰不堪。翌年,他率全家回京后,从事整頓工作,同仁堂才恢复了旧观。

曾祖母許氏于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去世后,四大房的矛盾就表現出来了。主要表現在經濟和管理权問題上。

大伯祖早死,在曾祖母許氏管理的后一个时期,二伯祖管外,曾祖母管内。曾祖母逝世后,二伯祖就独攬經濟大权,暗中貪污。例如以同仁堂名义买进的大山参(吉林参),卖出时即全部归入他的私囊。大家发觉后說:“你可以这样做,我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后来四房决定共管制度,每年从同仁堂提四万两銀子平分給四房,每房一万两,分三节支付,不再分紅。各房可以用乐家老鋪的招牌在各地开分号,但不准用共有的同仁堂字号。

四大房虽然議定了共管制度，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先由大房管了一个时期，接着又由三伯祖母(三伯祖已故)管了两年多。三伯祖母被推下台的原因是：她从同仁堂公賬中提取了九万元存入她的私賬。后来还是由大房接管。大房的乐均士(我的六伯)管了不久，又被大房的乐佑申(我的大哥)取而代之。我是属于四房的。我們四房根本没有参加管理。先伯乐达仁看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自帶了五千两銀子去上海開設了达仁堂。先父乐达义在北京警察厅担任了督察长之职。

在乐佑申管理的二十年中，伯叔昆仲之間极尽勾心斗角之能事。大家抄袭先曾祖寄卖丸药排挤外股的办法各自牟利，互相傾軋。四房各自寄卖他們的所謂秘方丸药，例如牛黄清心丸之外又有了加料牛黄清心丸之类。当时同仁堂的門市部真是熱鬧非凡。顧客們一進門就可以看見多少只售貨員的手在为各自的寄卖者兜攬生意。药舖的职工向例是提成薪給制，誰卖的多，誰的提成就大。同仁堂的职工，本来是非亲即故。由于四大房的明爭暗斗，职工也分成了几派，如誰是属于那一房的等。乐佑申当时只有借重先父乐达义在警察厅的职权派警察来看守药庫，以免被家人盜窃。这时我家的人大半过着声色狗馬、吃喝玩乐的生活，也有吸食鴉片的。这个封建大家族經過几十年的安乐享受，已經日趨腐化了。

民国十七八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政治中心南移，乐佑申就要他的亲弟弟乐篤周到南京開設同仁堂分号，所有資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是违反族規的，于是羣起而攻之。乐佑申被攻下台后，寄卖也就停止。这时先父早已卸职在家，于是出面管理，确立四大房的真正共管制度，由四房各出一人，所有銀錢賬目出入都要盖四个圖章。先父开始管理的时候，正遇上“九一



八”事变,北京市面萧条,同仁堂的营业也不象从前发达了。

### 乐家老舖的分号

多年来,由同仁堂滋生的乐家老舖分号共有三十四个,計大房開設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山东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二房開設了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三房開設了济仁堂二个,乐舜記一个,宏德堂一个;四房開設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

四大房開設分号,也是一場勾心斗角的斗争。例如当乐达仁在天津估衣街開設了达仁堂后,乐佑申就在对面開設乐仁堂来竞争。这是大房与四房之間的斗争。又如天津东馬路的西边開設了乐仁堂后,馬路的东边就開設了宏仁堂,这又是大房亲兄弟之間的斗争。再如乐达仁在上海南京路開設了达仁堂后,乐篤周就在对面開設宏仁堂来竞争,四房也紧跟着在对面開設树仁堂来竞争。各房在各自勾心斗角中又互相拉攏。大房和四房比較接近,因为大房的叔伯們曾留学法国,四房的先伯乐达仁和先父乐达义曾留学英国和德国,他們在接受資本主义社会新事物方面比較談得攏,但在利害冲突的时候,彼此斗争得也就更加厉害。

老四房的营业最为发达,大房的乐仁堂,二房的沛仁堂,三房的济仁堂都无法与四房的达仁堂相比。乐篤周于是主张把各地的乐家老舖分号一律改为同仁堂分号,实行大同仁堂主义。但終于因为彼此的利害无法統一,意見不能一致而作罢。

### 采取資本主义經營方式的达仁堂

民国初年,先伯乐达仁拿着五千两銀子到上海,得到宁波人陈子明的帮助,開設了达仁堂。上海的业务最初不好,他于是到青島去開設分号;青島的业务也不好,他又到汉口去開設分号。由于汉

口是南北商业的中枢,业务很快地就搞得很发达。一九一五年,他又到天津开设达仁堂,并设总管理处于天津。天津达仁堂从开张的那一天起,业务就很好。开幕那天曾在广东会馆大宴宾客,请名角演戏,轰动津沽。一九二七年我在中学毕业后,即应先伯之召,在天津达仁堂学习经营管理业务。

乐达仁精明能干,又在国外留学时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因此,达仁堂在经营方式上要比古老的同仁堂进步得多。例如,他在制药厂中修建了新式仓库及工人宿舍,在制药方面用机器动力带动石磨,在切药方面专门聘请精巧的南方刀工等。此外,他又多方设法便利顾客,如汤剂中所需的药引子及需要包裹煎熬的药所用的纱布等,他都事先准备好,与汤剂一并出售。每付汤剂抓好后,他又规定售货员、检查员盖章的制度,以示慎重。那时达仁堂的饮片汤剂,在华北称为第一。

达仁堂在天津设立总管理处后,乐达仁又在各地继续设立分号,除上海、汉口两处外,又在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号,并将青岛的分号迁至大连。在香港设立分号的目的是想向南洋一带发展。当时他在天津办有新学书院,送徒工前往学习英文,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和大哥才把香港的分号收了。他在发展各地分号的同时,又举办了养蜂、养鹿等事业,并且在天津办有铁工厂、渤海化学公司等,有一部分资金得到中国银行的支持。他在宣传推广业务和扩大社会影响方面,又比乐印川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曾经设立了达仁女校,组织了达仁职工乐队等。达仁女校曾著称于时,达仁乐队常被邀请到各处演奏,深受欢迎。

当乐达仁正在雄心勃勃地发展自己事业的时候,德国拜耳药

厂又来商谈合作。起初乐达仁也未尝认为不可以合作，但商谈的结果，因为名称与地址问题各不相下而作罢。乐达仁主张地址设在天津，名称用达仁堂；拜耳药厂主张地址设在青岛，名称须用拜耳。实质上，这是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先伯终以不愿甘居外资控制之下而没有达成协议。

### 古老的同仁堂

同仁堂在一九三一年左右由先父乐达义出面，实行真正的四大房共管制度后，正值废两改元的时候，各房在同仁堂提取的经费，遂由一万两银子改为一万四千元。这时同仁堂的营业，虽然因为政治中心南移，不如过去，但在中药业一行依然是一个“实力派”。同仁堂向来的作风是：第一，自己不出面，暗中操纵；第二，花钱了事。在敌伪时期，就用这种办法渡过了重重难关。这里举两件事来说明：一件是，西鹤年堂的刘一峯想活动药行商会理事长，得到先父的支持后，他便活动成功了。这样，就避免了自己人下水。另一件是，日军部队曾思染指同仁堂，先父找了汉奸王蔭泰，花去许多应酬费，才避了一场灾难。

先父于一九四七年逝世后，我继为同仁堂的负责人之一。那时我兼管平、津两地的业务。因为先伯乐达仁于一九四七年逝世后，我们老四房的兄弟们继承了达仁堂的产业，因此我又为天津达仁堂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达仁堂总管理处的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同仁堂遭受国民党的巧取豪夺，以及金元券的惨痛洗劫，我是亲身经历了的。那时同仁堂有一千一百七十种成药被核准为合格出售，但每月每种成药要交纳五元税款。一九四八年“八·一五”限价时，以茵陈酒为例，限价为每斤一元，很快卖完了，就无法再制。同仁堂一向以资金雄厚，储存药材多，特别是贵重药

材多,为其特点。但是这时能够大量买进的只是一般的药材,舖内所存貴重药材,已经亏损殆尽,无从购买。我不得已,便大量买进黄金、美钞、银元以保存币值,而每天烂掉的金元券还是不計其数。上海达仁堂的负责人还曾以违反限价而被捕。这时,真搞得我焦头烂额。在这币值一日数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职工,虽然以布、粮、煤三种实物价格作为生活津贴,但他们的生活还是艰苦得很。记得一九四八年年终的时候,我们发给职工每人两块银元,才勉强渡过了难关。解放前夕,同仁堂已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了。

## (二) 同仁堂的丸散膏丹

同仁堂一向以丸、散、膏、丹著称于世。它所生产的四百三十七种中药成药中,以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女金丹、再造丸、活络丹、参茸卫生丸、虎骨酒、如意长生酒等产品最为驰名,销售全国各地,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信誉。在民国初年,这些成药就已经畅销于南洋,如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新嘉坡等地,为当地华侨所习用。解放以后,更行销于苏联及其它兄弟国家,受到国际友人的欢迎。现将同仁堂有关收集古方、采购药材、以及尊古炮制三方面的情况略述于后:

### 关于收集古方的情况

同仁堂的配方来自三个方面,家传的、民间的和得自清宫的。在四大房竞相寄卖丸药的时候,曾达一千一百七十种。以后有许多配方已废弃不用。上面所说的四百三十七种,都是疗效较高的成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由于职工的努力钻研,品种又有所增加,曾达六百多种。

关于同仁堂收集古方的经过,在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

重刊的同仁堂藥目叙言中說：

“本堂之有藥目也有由來矣。先四世祖尊育公為太醫院官，喜閱方書，辨藥味地道疑似。嘗曰：古方无不效之理，所慮者修合未工，品味不正耳。爰依古方按法炮制，以之養生，以之濟人，多历年所。五世伯祖梧岡公守其遺訓，于康熙壬午歲在京都正陽門外大柵欄路南設立本堂字號，肆廡之余，博覽羣書。自國初諸名醫循流溯源，上逮岐伯黃帝之屬，凡古方之適用者，无不悉心考究。炮制必依古法，購料不惜重貲，五易寒暑，而丸散膏丹厘然各備。遂別類分門，匯為一書。一時海內流播，各省仕商之至京師者皆枉顧本堂，按目購取，以備除痾延年之用。其對症服食莫不應驗如响。迄今御藥房供奉各珍品，亦必由本堂揀選。所謂門擅桐君之術，家傳葛氏之方者，殆久為舉世所共信矣。嗣是世守先業，遇有奇方，立即修治，及先大夫印川公職司兵曹，情殷濟世，更于公余之暇，廣求活人之方。前此品匯，愈加精煉，所增藥目，殆不下數十百種。如虎骨酒之強壯筋骨，經治風濕、腳氣、氣虛、作喘諸般風痰。安坤贊育丸之調經養血，種子延年，兼治小產滑胎，胎前產後諸般弱症。而益仙救苦金丹之培養血氣，凡虛癆失血等症尤征驗不爽。八寶藥墨之消腫敗毒，凡狂血不止、口舌生瘡、飛絲入目等症，亦效應如神。它如五味檳榔之健脾和胃，消癰止疳。定喘丸之止嗽定喘，助氣安神。參茸酒之能治五癆七傷，痿痺虛弱。如意長生酒之能治氣血兩虧，夜不成寐諸症。凡此等類皆系先大夫印川公虔誠創造，屢奏奇功，實古方所未備，用彌秘而不授人者也。”

藥目叙言中所說的，主要是指家傳的秘方，也包括了民間的來源。另外，由于同仁堂長期供奉御藥房及和太醫院的關係，清宮的秘方流傳到同仁堂來是很有可能。清慈禧當政後，認為同仁堂

的藥好，曾令代制宮內服用的成藥。在此以前，同仁堂只交進生藥。重刊藥目叙言中所說：“迄今御藥房供奉各珍品，亦必由本堂揀選”，就是指慈禧當政後的事。在代制清宮服用的成藥中，就可能採用宮內秘方，因而更豐富了同仁堂的配本。現在清故宮檔案中還藏有同仁堂的配本。

光緒十五年重刊的藥目共分風痰、傷寒、瘟疫、燥火、補益、脾胃、洩痢、眼目、婦科、痰嗽、氣滯、瘡科、小兒、咽喉、口齒及補遺十六門四百九十一種成藥。現在所生產的成藥，基本上還是按照這個藥目來分門別類的，除補遺一門已分類歸入各門外，共十五門。

實際上，中國醫書中所載的古方甚多，同仁堂的配本與眾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選料與劑量方面。解放後，經過科學分析，有幾種丸藥如二母寧嗽丸、銀翹解毒丸、藿香正氣丸等，採用了古醫書中的配方，而不用同仁堂的配方。

### 關於採購藥材的情況

同仁堂因為資本雄厚，名望高，有很長的一個時期內在藥市上佔着壟斷獨占的地位。在過去全國最大的藥市祁州（今安國縣）藥王廟上，每年冬春兩季開市的時候，都要等候同仁堂的人到後才開市。這是因為同仁堂出價大，買得多。例如大黃，我們挑選其中最磁實的買，帶泡的就不要。虎骨、犀角等都要挑最好的才買，下腳貨就不要。我們每次都能買到最好的藥材。有的貴重藥材如大山參、鹿茸等就專程到營口藥市去採購。麝香由河南杜盛興專門供應最上等的貨色。蜜制藥丸所用的蜜也有專門的蜜行供應。有一個時期，上海成為貴重藥材集散之地，因為樂達仁在上海，就由他替同仁堂採購。每次進貨都在二三萬元以上。總之，同仁堂在採購藥材方面，不怕價高，但求貨好，因此，它生產的成藥也就

“貨高价出头”了。這可以說是同仁堂的特點。正因為這一點，從咸豐年間（一八五二年）同治年間（一八六九年）就有假冒同仁堂的名義賣假藥的，曾經遭到官府的取締，但後來仍有不斷假冒同仁堂的名義賣假藥的。他們都以低价可以買到同樣的藥為號召，也有不少人願意前往購買的。殊不知同仁堂的藥所以出名，在選料與劑量上，特別在選用貴重藥品上絲毫不苟，這是別家不能與之相比的。

### 關於尊古炮制方面的情况

同仁堂在尊古炮制方面極其認真，並且不惜工本，正如五世祖樂梧岡在藥目叙中所說的：“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亦如四世祖樂尊育所說的，“古方無不效之理，所慮者修合未工，品味不正耳。”同仁堂在尊古炮制方面，的確按照祖訓辦理，絲毫不苟，在使用貴重藥材方面，以寧缺勿濫為原則。

據家人口述，遠在曾祖母在世的時候，紫血丹的古配方需要用金鍋銀鏟，曾祖母就收集了家中各房的金手飾一百兩，放在鍋裏煮，日夜守候。這可以說明我家在尊古炮制方面認真的情况。

同仁堂所生產的水制丸藥和蜜制丸藥，都依古法炮制。其中炮制手續之繁瑣，如蒸、炒、燉、燙、炙、浸、水飛、霜凍等達四十多種之多，不能一一列舉。在製成成藥後，一般都要存放一兩年再出售。如虎骨酒要在缸內存儲兩年再出售，再造丸和蜜封好後存放一年再出售。這些藥存放的時間越久，燥氣去淨，藥味就越純，藥效也就越高。這是一般藥鋪不易做到的事，因為不但要增加設備，並且還要積壓成本。至於所有貴重藥品，如牛黃、當門子、犀角、羚羊等，同仁堂必依古方放足分量，絕不摻假，這也是普通的藥鋪不易做到的事。

同仁堂的丸散膏丹所以著称于世，大概有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應該說，这是同仁堂几百年来罔替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 （三）同仁堂的改造与发展前途

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陷于无人管理状态。作为一个較大的資本家，我虽然对于蔣介石反动統治集团沒有好感，但受了反动統治階級反共宣传的影响，也害怕共产党。解放前夕，我尽管接到党对于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的文件，但心里总是半信半疑的。同时我又想，我家世代經營工商业，自己又沒有参加过伪政权，共产党也沒有什么可怕的。在这种矛盾心里中，我决定采取观望态度。在京津通車后，我就去天津观望：一来观望政府的政策究竟如何，二来观望职工对資本家的态度又如何。后来同仁堂发生劳資糾紛，我家其他各房負責人都未能很好地与职工进行談判，职工代表指名要我回来談判。我不得已匆匆回京，硬着头皮到同仁堂与职工代表进行談判，出乎意料之外地达成了協議。在劳資双方的联欢会上，职工代表推我为同仁堂經理，使我初步体会到党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是千真万确的。

从此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依靠全体职工的努力与监督，在一九五二年“五反”时，同仁堂被評为完全守法戶。一九五四年申請公私合营时，我家各房兄弟昆季之間又在彼此勾心斗角：第一，申不申請？第二，誰先申請？我决定带头一同前去申請公私合营。感謝共产党結束了我們这个封建大家族彼此之間的明爭暗斗的丑惡一面，并且把同仁堂和所有乐家老鋪的分号引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光明大道。一九五六年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出現了新高潮，同仁堂



和所有乐家老舖的分号,在新高潮中实行了定股定息。

解放后,在私营时期,我家四大房每年依然各自在同仁堂提取經費一万四千元,共为五万六千元。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结束后,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实行四马分肥的原则。由于这时同仁堂的营业额增加,我家四大房每年共分紅十七万一千五百六十一元,每房各得四万二千八百九十元,超过了过去所得的三倍还多。这样的分紅,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定股定息后才改变。

一九五四年批准公私合营后,清产核資时,同仁堂的股金为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元,一九五六年定息为六万一千六百五十七元六角一分。后来将达仁堂一部分在京产业合并于同仁堂,又加上过去未处理的一部分产业,现在同仁堂的股金为一百五十二万六千七百零二元三角八分,定息为七万六千三百三十五元一角。我家四大房每年所得的定息,仍然超过了过去每年各房提取的一万四千元之数。这一方面说明了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英明伟大,一方面也说明了过去同仁堂在经营管理上的特点。这特点就是各房提取规定的經費后不再分紅,而以所有盈余购买药材原料作为再生产之用。我过去把同仁堂資金积累的办法称为“肉烂在鍋里”,实际上心中是无数的。过去各房除了每年提取一万四千元經費之外,又有所謂“平安葯費”的分配。但这个数目毕竟还是有限的。当然,过去对于职工的关系,就是“我們吃肉,他們喝湯”了。但是,由于种种的封建关系,如用人的非亲即故等,同仁堂内部的阶级矛盾似乎还不突出。

同仁堂过去尽管有其经营管理上的特点,但是封建性的生产关系是束縛着生产力的发展的。只要看解放十年来同仁堂发展的情况,不知道超过了过去二百多年的多少倍,就可以清楚了。这些

成就，完全应当归功于党的关于繼承和发揚祖国医药文化遗产的方针的正确，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正确，以及公私合营后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而取得的。现在将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营业情况与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加以对比如下。

一九四八年职工总数为一百九十余人，其中生产工人仅四十余人，其余皆为售货员与管理人員。全年生产总值約計为十六万元，零售总额約計为三十万元。在产品产量方面，虎骨酒年产量約計三万斤，水制丸药約計四千斤，蜜制丸药約計一百四十万丸（粒），飲片約計五千斤。在生产設備方面，生产和銷售共占用房屋二百十七間，沒有机器設備。

一九五九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职工总数为五百四十人，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二·八四倍，其中生产工人為四百六十五人，比一九四八年增加十一·六三倍。全年总产值为一千二百五十一万七千元，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七一·九八倍。产品共有八百零二种，其中丸散膏丹为六百种，药酒六种，片剂四十六种，飲片一百五十种。在产量方面，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的数字，計蜜制丸药增加四九·〇三倍，水制丸药增加七八·四五倍，飲片增加一三三·〇六倍，虎骨酒增加一〇·一七倍。虎骨酒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曾达最高額，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二三·二倍。一九五九年因为原料缺乏，产量就下降了。一九六〇年的产量还要下降些。在生产設備方面，除将新开路住宅全部扩建为制药厂外，又增設中药提炼厂一处及通州区药酒厂一处，并扩建第一門市部，增設第二門市部。此外，全体职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中，創造了装水丸机、升降机、搓扁豆机、装膏子机、粉碎机、攪拌机、篩貨器等等。这种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有許多新

創造发明的机器正在投入生产中。

最令人兴奋的是中药提炼厂的建立。先伯乐达仁过去想和德国拜耳药厂合作，就是想改进中药制造，使它走向科学化的道路。解放后，在党的关怀和鼓励下，这件事很快就实现了。解放初期，彭真市长就鼓励我试办中药提炼厂来改进中药的制造。但那时我总以为没有技术、没有设备而不敢尝试。在彭市长的不断鼓励和督促下，一九五二年我邀请了北大药系郑启栋教授在达仁堂驻京办事处成立了国药改进研究室。当时仅有六人从事这项工作。一九五三年增加工人十人试制银翘解毒丸、香莲片、女金片、黄连上清丸等四种产品成功。一九五四年在德内大街原来的达仁堂北京养鹿场正式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工人增至二十三人，产品又增加舒肝片、万应片、藿香正气片、祛暑片、六味地黄片五种，共生产九种药片。每月产值约三、四千元，装有三节卧式锅炉、压片机、粉碎机等简单设备。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这个原属达仁堂的中药提炼厂与同仁堂合并，称为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我当时所以要在达仁堂试办，就是怕搞不成功而受到家族中人的责备，因为那时同仁堂还是四房共有的产业。

现在的中药提炼厂已经有相当机械化的设备，工人有一百八十四人，产品有十六种。一九五九年总产值一百八十万元，一九六〇年估计可达二百八十万元。银翘解毒片的产值约占总产值的十分之一。因为银翘解毒片最受群众欢迎，现在片剂的生产占百分之八十，丸药只占百分之二十了。其他如女金片、黄连上清片、舒肝片、香莲片、祛暑片、藿香正气片等的销售量也很大。群众的一般反映是：这些药片比丸药便于服用、保存和携带，并且疗效和丸药相等，有的甚而高于丸药。东北的一位矿工来信说，他的多年下

生育的妻子吃了女金片后,生了个孩子。黄连上清片是一种泻药,群众反映说,吃了这种药片不是猛泻,药性缓和,有利于肠胃。一般说来,补益类的药片反应不显著,因此,我们现在只选择疗效显著的配方来提炼制成片剂。

关于提炼的方法,我们完全遵照原配方,不增不减,该炮炙的即如法炮炙。在提炼的时候,尽可能把特殊成分保留下来,只把其中肯定没有疗效的淀粉纤维等去掉。但为了制片的方便,要加一点不影响药效的赋形药,即滑润剂和结合剂。有很多生药,往往要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来提取,即温水浸渍、沸水溶解、酒精渗滤、稀氨水浸渍、水蒸气蒸馏等。但这些提炼所用的溶剂如酒精、氨水等最后都要排除挥发掉。贵重药品如人参、麝香、牛黄等在配方中所占重量极小,对于缩小体无大妨碍者即不提炼。

中药提炼厂除出产四十六种片剂外,现在又试制人造牛黄和人造麝香获得成功。这是在党委领导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三结合的产物。

解放十年来,同仁堂的发展超过了过去二百多年来乐姓经营的成果。我无法形容心中的兴奋与喜悦。中药提炼厂这棵新生的幼苗,我相信在党的培育下也一定会成长壮大的。但现在还不能肯定它就是中药发展的方向,还有待于人民群众的鉴定和医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因为中药是几千年来无数医药工作者在亿万次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的经验总结,我们必须全面继承,并且还应考虑到中药的特点及中医用药的习惯,才能发扬光大。

# 附 載

##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一年的工作报告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政协全国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第四次會議通过)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以下簡稱本会)于去年七月成立,一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密切关怀以及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协助之下,经过本会全体委员和工作同志的努力,已经征集了史料五百五十万字,出版了《文史資料选輯》五輯,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績。现将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本会于去年七月二十日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工作办法和征集文史資料参考題目后,即由本会委员分工负责,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工作。这一年来,我們除了用个别联系的方式向各方面具有丰富经历和見聞的人士进行征稿工作外,还推动、协助某些熟悉各有关方面历史情况的人士組織起来,以集体研究、分工合作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撰写史料。为了更有成效地运用組織力量来推动工作,不久以前我們已經商得民建、工商联两会中央同意,由两会中央設立了一个九人小組負責推动它們的全国各級組織开

展关于資本主义工商业和經濟、金融等方面史料的征集工作。最近民革中央也应本会要求，把征集有关国民党的史料工作作为民革各級組織的一項工作任务，并将在各級組織內成立专管机构負責推动它們的成員和所联系的社会人士撰写史料。

关于与各地方的联系工作，本会于今年三月間曾利用春季視察的机会，委托了一部分到各地方視察的政协委员分別了解了几个省市的史料工作情况。今年政协三屆二次全体會議期間，本会委員曾分別向各地来京參加會議的政协委员和各地党委統战部門負責同志征求意见，并就征稿工作作了初步联系。五月間，本会曾派专人到上海进行重点了解和联系，并且同上海市政协商定了征稿联系办法。今后我們还准备繼續进行這項工作。

截至今年七月底，本会一年来所征集的史料共达五百五十万字，其中除原始資料約五十万字外，各方面人士撰写的稿件有五百七十三篇，共約五百万字。全部史料內容以属于政治、軍事方面的为最多，而属于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較少；今年四月以后，由于本会采取措施的結果，后一方面的来稿开始逐漸增加。如以历史时期来划分，則以属于国民党政权統治时期的史料占大多数；关于清末和北洋政权統治时期的史料，因为发动撰稿比較困难，所征集的稿件都比較少；关于敌伪政权方面的史料也很少。所有撰稿人以在北京的占絕大多数；今年三、四月間我們开始同各地方建立联系后，各地来稿已逐漸增加。

在今年三月以前的九个月中，应征稿件質量較低，其中根据亲身經歷和見聞所写的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的稿件仅占30%。从今年四月起，由于本会加強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征稿工作，同时也由于《文史資料选輯》出版以后所起的推动、提高和示范作用，三个月

来,稿件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大部分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象过去那些得之传闻、抄袭成篇、内容空洞的稿件已经大大减少。

为了更好地保存和积累所征集的史料,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并进一步推动史料撰写工作的开展,本会在去年十月間着手筹备編印《文史資料选輯》,并于今年一月开始出版。截至現在,选輯已經出版了五輯,共五十多万字,預計今年內将出版十至十二輯。因为选輯內容都是关于清末、北洋和国民党統治时期历史的研究素材,不同于一般直接向广大羣众进行教育的历史书刊,因此只在規定范围內作为內部刊物发行。此外,我們还选定了二三种长篇史料稿件,准备作为单行本出版。

本会通过《文史資料选輯》的編輯和发行,同政协委员、部分人大代表、全国各級地方政协、中央和各地方文史工作部門、各个历史研究单位和各大学历史专业以及撰写史料的各方面人士取得了联系,不仅及时地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資料,同时对于推动有关部門的史料征集工作、扩大稿源和提高稿件质量方面,也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年以来,我們取得了如上所述的成績,同时也有以下几点体会和經驗:

第一,文史資料征集工作对于我国近代历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年以来,周恩来主席曾經一再号召具有丰富閱历的老年人士,把他們的亲身經歷和見聞記錄下来,传之后代,这表明党对于史料征集工作是十分重視的。因为从清末到全国解放,我国社会所經歷的变化是极其深刻复杂的,旧政权統治时代各种官书文献和报章杂志的記載不仅极不完备,而且歪曲失实之处很多,远远不足以适应历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們有了各方面人士根据

亲身經歷和見聞所写成的大量史料,就可以补充过去文献之不足,丰富其内容,糾正其謬誤,从而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有利的条件来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刻地闡明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規律。这一工作也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是为在意識形态領域內的階級斗争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这不但是—件我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情,而且在解放以后的建国初期,也是一件不容易作到的工作;只有在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統一战綫日益扩大、各界人士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形势下,这个工作才有了广泛开展的基础和条件。本会一年来所征集的大量史料,其中已有不少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真相作了真实詳尽的叙述。如果把这个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假以时日,坚持下去,必将获得极其丰硕的成果。

第二,史料征集工作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設事业的組成部分,同时也是政协工作的一个新的内容。这一年的工作經驗証明,史料征集工作是充分調动具有丰富經歷的各方面人士的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各方面人士在这一工作上也容易作出貢獻。这一年的經驗也表明政协是开展史料征集工作的一个很适当的机构,因为政协是統一战綫的組織,对于具有丰富經歷的各方面人士有着較多的了解和广泛的联系,具备着开展这一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政协通过这一工作也更加扩大和密切了同各方面人士的联系。不仅如此,我們在征稿和編輯工作过程中同各方面人士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不但可以了解他們的思想进步情况,而且通过史料稿件内容的研究和修改,在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問題上對他們进行了具体的帮助,因而在提高稿件質量的同时,也使他們提高了思想認識。至于在撰稿过程中由于回顧过



去,对比現在,从而更加坚定了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更是許多撰稿人共同的收获。这些事实充分說明,史料征集工作对于密切与各方面人士的联系,对于推动他們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对于加速他們的自我改造,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第三,征集史料必須反复說明政策,解除顧慮,作好思想动員工作。这一年来,在党的号召之下,許多人士对这一工作的意义有了正确的認識,因而能够破除顧慮,踊跃撰稿,大胆揭露过去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他們的这种积极行动受到了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有关方面的重視。但是,也还有不少人士拘于“隱恶揚善”、“为尊者、亲者、賢者諱”等等旧的錯誤的傳統观念,对于这一工作表示淡漠,不愿参加;特别是对于涉及本身在内的某些历史上的阴暗面的揭露,更是顧慮重重,諱莫如深。这是目前开展史料工作的一个主要障碍。

因此,为了充分发动各方面人士积极参加这一工作,首先要作好思想动員工作。必須反复說明党对史料征集工作的政策,使他們明确地認識到,这一工作是党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設事业的一个組成部分,对于祖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把自己过去曾經亲身經歷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如实地纪录下来,以便于历史研究工作者占有更多的真实可靠的材料来闡明我国近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規律,来編写清末、北洋和国民党統治时期的历史,这就对于当前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貢獻。只有对于史料工作树立了正确認識,才能扫清思想障碍,破除顧慮,以积极的态度参加到这一工作的行列中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史料征集工作鋪平道路,具有較高史料价值的稿件才会大量地不断涌現出来。

其次,关于撰写史料的要求,我們曾經提出,撰写者可以不拘

观点，但所写的内容必须真实；这就是说：撰写史料只是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因而除了要求翔实的具体内容之外，并不要求撰稿人对他所写的内容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加以分析和论断。为了便于广泛发动各方面人士撰写史料，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从这一年的工作经验中，深刻体会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对过去的事情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才敢于大胆地揭露过去，才能够实事求是地写得真实而无所夸饰和隐讳，才能够比较深刻地接触到历史事实的本质而不至流于浮光掠影。为了进一步帮助撰写史料的各方面人士提高认识，写好史料，在阐明关于不拘观点的征稿方针的同时，向他们指出这一条经验，我们认为是有好处的。

第四，必须广征博采，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征稿工作。根据这一阶段的工作经验，凡是内容较好、史料价值较高的稿件，大多数是经过我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深入发掘的成果；同时，因为历史事件的内容和演变过程一般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仅凭某一方面当事人的经历，往往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必须广征博采，从各方面的当事人来进行了解，加以综合研究，才能弄清一个历史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内容。所以除了适宜于个别联系进行组稿的以外，还应该充分运用各种组织方式有计划地来推动组稿和撰稿。对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或者采取向各方面当事人分别组稿的方式，让他们从各自所了解的角度分别撰写，所写的事实如互有出入，还可以展开争论；或者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集体研究，分工撰写。至于有丰富经历而不能执笔的人士，也可以同能执笔的人士结合起来，组成互助小组，进行工作。我们对于撰稿人也要主动地同他们搞好协作，以积极热情的态度给以必要的帮助；对于他们所写的史料，只

要有一点一滴可采之处，都应该认为是珍贵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内容而没有写得深透的稿件，更要耐心地帮助撰稿人反复修改；这样，往往可以把一些不成熟的稿件加工提炼成为有价值的史料。此外，与各省（区）、市文史资料工作部门加强联系，交流经验，发扬协作精神，使征稿范围更加扩大，使各地潜在力量能够更广泛地动员起来，共同做好这一工作，也是今后应该努力去做。至于运用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力量，也将成为今后征稿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五，《文史资料选辑》的出版，除了保存和积累史料，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研究参考以外，对于史料征集工作的不断开展，也具有重要作用。选辑的出版使我们同全国各地政协组织以及其他文史工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起着介绍情况、交流经验和推动工作的作用。选辑的出版也使我们同撰写史料的各方面人士保持了联系，以具体的范例来向他们指出了撰稿的要求和方法——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从而对于不断扩大稿源和提高稿件质量具有促进的作用。最近几个月来，应征稿件不仅数量逐渐增多，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这一进展显然是与选辑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通过选辑的出版，我们得以及时地向各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征询意见，接受各有关方面的批评和监督。同时，选辑的出版也督促着我们努力发掘稿源，严格注意稿件内容，力求在编辑工作上避免错误，保证质量。这样，选辑的出版不仅对于我们本身的工作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和督促，而且成为带动全部史料工作不断开展和提高的一个中心环节。

此外，我们出版选辑，主要是为了提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和其他各有关方面研究参考之用，它不是面向广大群众的公开刊物，因此发行面不宜过宽。这也是值得提出的一条经验。

本會一年的工作雖然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還有一些缺點。我們的缺點主要是：一、宣傳動員工作還作得不够普遍深入，許多潛力還沒有發動起來；特別是對於某些曾經參加過重大歷史事件、具有豐富經歷的高齡人士，我們沒有能够及時幫助他們，寫出他們所知道的史料；二、我們在選輯的編輯工作上雖然謹慎將事，嚴格注意到稿件內容的真實性，但是因為我們的業務知識和經驗不足，以致所選稿件仍然有少數質量不高、內容失實等等情況；三、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嚴密完備的處理資料的制度，除了登入選輯的稿件以外，還有很多有價值的稿件沒有能很好地利用起來，發揮應有的參考作用。

根據這一年的工作成績、經驗和缺點，我們對於今後的工作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一、在征稿工作方面，繼續貫徹標準從寬（即不拘觀點、不論體裁、不求完整）、範圍要廣（包括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精神，採取多種多樣的方式，特別是要運用各黨派、團體的組織力量並有重點地加強同各地方政協的聯繫，更有組織、有計劃地來推動各有關方面的史料撰寫工作。

二、為了更好地發揮《文史資料選輯》對於研究工作的參考作用以及對於史料工作的推動和提高作用，今後要貫徹質量並重、質為第一、寧缺毋濫的精神，在編輯工作上力求避免政治性的錯誤，並注意核對史實，力求真實，以不斷提高它的質量。

三、在資料的處理工作方面，要建立一套完備的制度，把沒有在選輯發表的全部資料分別加以整理，以方便於充分利用。

四、充分發揮本會委員的力量，健全工作機構，提高工作人員的政治思想和業務水平，以便更好地開展工作。